

新一百一合一传一记一文一丛

# 力阻狂轮

D. Bonhoeffer

秉持信仰良知 · 发出暮鼓晨钟  
朋霍费尔传

BSOP LIBRARY



00035252

[德] 蕾娜特·温德博士 / 著  
陈惠雅 / 译  
王贞文 / 审校

四川出版集团 · 四川人民出版社

在一个价值观纷乱的时代，要保持清明的心智和不动摇的信心，是非常困难的事。而力抗潮流，所要付出的代价，高到令人心痛和惋惜的地步。

德国神学家朋霍费尔为了他的原则，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成为20世纪少有的殉道者。他的事迹与他的信仰，影响了许多默默地对抗趋势潮流的个体生命。

本书的标题“力阻狂轮”，便是朋霍费尔用来形容他自己在上个世纪那个纷乱时代的角色：他期待自己能够阻住一个疯狂滚动着、带来死亡的时代巨轮。在这个世界上，暴力与战争仍魅惑着人，但是像朋霍费尔这样的生命史，仍低声地在说起一种不惜一切力阻巨轮的精神，说起族群和大地生命的延续的可能性。这是一个值得一再传述的生命故事。



*D. Bonhoeffer*

建议上架：传记类

ISBN 978-7-220-07296-3



9 787220 072963 >

ISBN 978-7-220-07296-3

定价：20.00元

CH  
BX  
427.857

W12

2n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力阻狂轮：朋霍费尔传 / (德) 温德 (Wind, R.) 著.  
陈惠雅译. —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 11

书名原文：Dem Rad in die Speichen fallen—Die  
Lebensgeschichte des Dietrich Bonhoeffer

ISBN 978-7-220-07296-3

I. 力... II. ①温... ②陈... III. 朋霍费尔—传记  
IV. B979.95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38366 号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German under the title: Dem Rad in die Speichen fallen—Die  
Lebensgeschichte des Dietrich Bonhoeffer by Renate Wind. ©1990, 2006 Beltz & Gel-  
berg in der Verlagsgruppe Beltz, Weinheim und Basel. Chinese Edition (simplified char-  
acters) is arranged by permission through Enoch Communications Inc. Copyright ©2006  
Enoch. The translation Text is used by permission through Christian Arts Press.

LIZU KUANGLUN; PENGHUOFEIERZHUAN

力阻狂轮：朋霍费尔传

〔德〕温德 (Wind, R.) 著 / 陈惠雅译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出版发行

网 址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照 排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插 页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汪 瀟

奇文云海视觉传达

杨 潮

叶 勇

丁 青 李 进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槐树街 2 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http://www.scpph.com

http://www.booksss.com.cn

E-mail: scrmcbf@mail.sc.cninfo.net

(028) 86259459 86259455

(028) 86259524

成都华宇电子制印有限公司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140mm×202mm

6.875

3

121 千字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

ISBN 978-7-220-07296-3

20.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028) 86259624

力  
阻  
狂  
轮  
—  
朋  
霍  
费  
尔  
传

目  
录

中译本序

何光沪 / 1

第一章 在世上占有一席之地

1906—1914 / 1

第二章 梦想美好的死亡

1914—1918 / 15

第三章 知道自己的立场

1919—1923 / 22

第四章 了解什么是教会

1923—1924 / 29

第五章 圣徒的团契

1925—1927 / 38

第六章 大地仍是我们的母亲

1928—1930 / 48

第七章 谁还想无知自在地进入应许之地?

1930—1931 / 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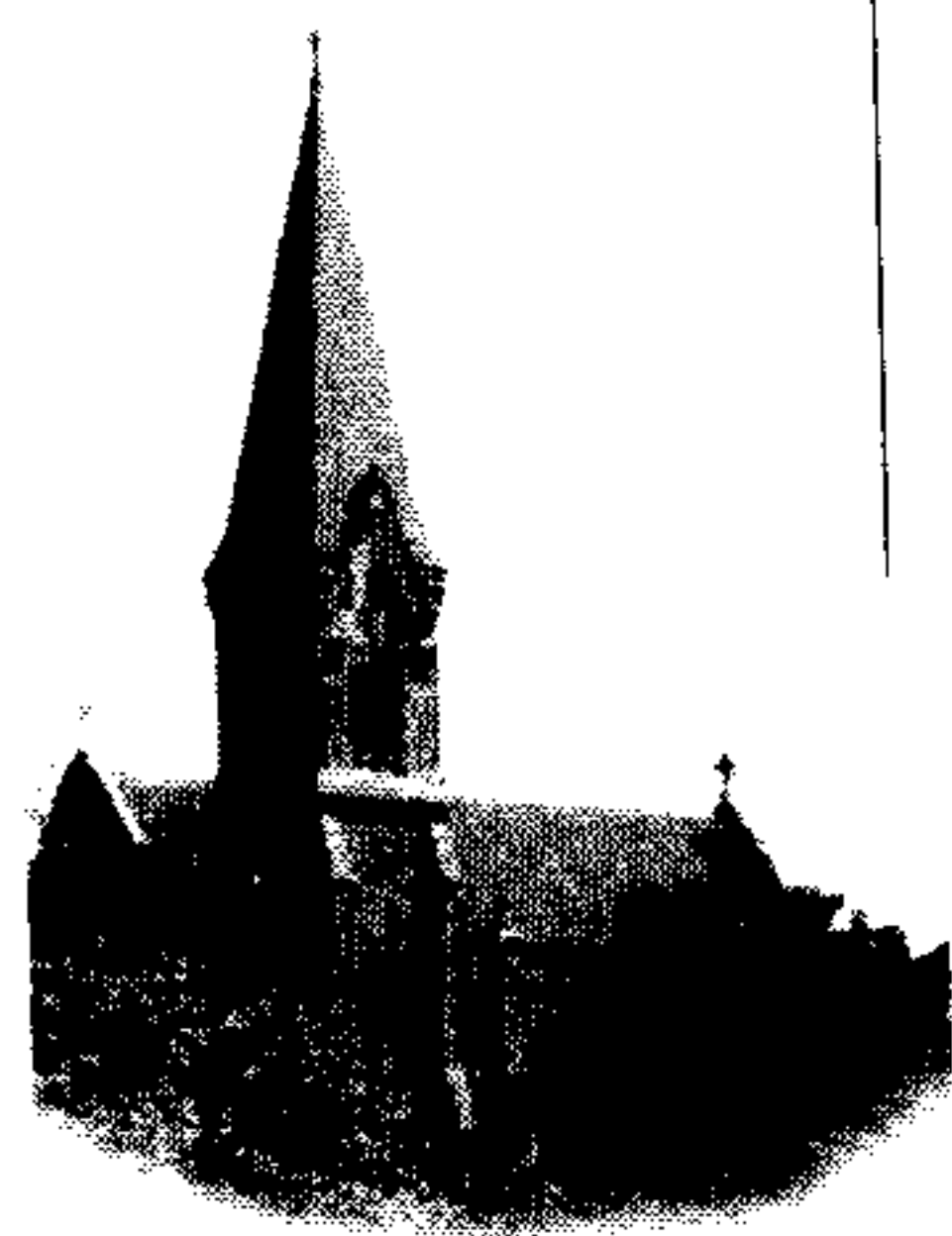
第八章 教会当尽世上的责任

1931—1932 / 66



# 目 录

第九章	力阻狂轮 1933	/ 76
第十章	当为哑巴开口！ 1933—1934	/ 90
第十一章	阻止战争 1934—1935	/ 103
第十二章	蓄意脱离认信教会即脱离 拯救！1935—1936	/ 114
第十三章	为犹太人出声者，才可高 唱圣歌！1936—1938	/ 129
第十四章	趁冬天未到时前来！ 1939	/ 146
第十五章	邪恶的假面舞会 1940—1943	/ 158
第十六章	在这端的这端学习信仰 1943—1944	/ 177
第十七章	结束乃是开端 1944—1945	/ 198
	年表	/ 209



## 中译本序

何光沪

距今不过 73 年前，在我们居住的欧亚大陆的西部，在这几天正吸引着无数球迷的德国，出现了一个无比巨大的“车轮”。这个巨轮疯狂地运转，压碎了那个诞生过埃克哈特和路德、丢勒和荷尔拜因、康德和黑格尔、施莱尔马赫和利奇尔、歌德和海涅、巴赫和贝多芬、舒曼和勃拉姆斯、开普勒和爱因斯坦、马克思和韦伯、荷尔德林和里尔克等的民族的自由，又疯狂地碾向国内国外、左邻右舍的犹太人、奥地利人、捷克人、波兰人、法国人、比利时人、丹麦人、挪威人、希腊人、塞尔维亚人、英国人、俄国人等各民族人民的自由。这个巨轮所到之处，都有千百万人的躯体被它碾碎，还有千百万人的心灵被它扭曲……众所周知，这个“狂轮”，就是



一个由所谓“领袖”即希特勒及其一伙所构建，由所谓“纳粹”即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所领导的国家的政治制度，就是一个已跻身于世界经济强国而又有严密政治组织的国家的军事工业集团，就是一个其实力、机制和心态使邻国不安、害怕，使一些外国要人不得不“绥靖”、讨好，已经从软弱地位复兴而强大起来的国家的宣传和暴力机器。

距今整整100年前，在当时一片和平景象的德国名城布列斯劳，一个大学教授的家里诞生了第六个孩子，也是家里最小的男孩。这个家庭来自两支显赫的家族——这个男孩的先辈中有著名的教授、律师、医生、艺术家、史学家和神学家，他的外祖父甚至做过皇帝的御前牧师。这个家庭生活富足、富有教养；孩子们有自己的房间，有丰富的书籍和玩具，有巨大的花园和乡间别墅；许多有地位、有见识而观点各异的亲友访客时常出入门庭，高谈阔论；更主要的是，孩子们享有父母良好互补的教育和宽严有度的关爱，个个都聪明有成。这个小弟弟也不但早慧，而且德智体美兼优，7岁半就进入人文中学，17岁就进入著名的图宾根大学攻读神学，18岁转入柏林大学，得到该校名师，也是世界级神学大师哈纳克高度评价；在别人尚未开始博士阶段学习的年纪，即21岁时，他已完成了博士论文；在别人尚未完成学业的年纪，即24岁时，他已经登上了柏林大学的

讲坛，教授系统神学；他还在美国留过学，在西班牙和英国当过牧师；他深受学生的喜爱，发表了不少的著作，其中一些（例如30岁发表的《作门徒的代价》）使他成了相关学术界的新星……

距今恰好67年前，1939年7月7日，这个33岁的青年学者，这个才华横溢、前途无量的神学家，经过长时间的内心挣扎，终于启程，自愿离开那远离战云密布的旧大陆的安全而自由的美国，离开繁华的纽约市内那座城堡庭园中幽雅的著名神学院，离开了为他在德国的安全担心而接他来美的朋友们安顿客座讲师的舒适小屋（后被称为“先知屋”），登上远航的轮船，返回黑暗的祖国，投身到那个巨大凶恶的“狂轮”之中——怀着一个坚定的目的：力阻狂轮！

这样的一介书生，尽管是一个纯粹的人，仍然是一个软弱的人（也许正因为纯粹才软弱），再加上那“极少数人”，尽管志同道合，却还是极少数，怎么能够阻挡那个狂暴的巨轮呢？结局是可想而知的：他和他的伙伴，全都被压死在那个巨轮之下！而那个巨轮最终被阻挡、被粉碎，是由运转方向相反，却仍然是钢铁铸成的同盟国的巨轮所完成的。

那么，这样的“力阻狂轮”，不是毫无意义，成了“无谓的牺牲”吗？

这会是无数人的想法，会被认为是“正常”的想





法，尤其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会有的想法。我想，这种想法正是当今社会的心理病根之所在，正是妨碍我们的社会改良的一大“心魔”。为什么？

用这本书的主人翁，上面所说的这个“男孩”朋霍费尔的话来说：一个疯子在人群中驾驶汽车横冲直撞，我们应该做的，绝不仅仅是救助死伤者，还应该有人冲上去，制止那个疯子。后面这个行动当然有极高的风险，可能丧命，可能失败，即可能牺牲而无功，但却绝不是“无谓”的。试想，一个巨大的人群中竟然没有一个人采取后一行动，其后果不仅会是所有的人最终都被压死，而且必然还向世人传达着这样一个信息：这个人群已经丧失了同邪恶抗争的精神（这种精神是需要有人，即使只是“极少数人”来体现的），在这个人群中，正义是退缩无力的，不义是畅通无阻的。极言之，这种局面所“意味”的东西，向天地昭告的东西就是：在这里已经“正不压邪”，因为正义已经死亡。于是，这样一个人群是否还是“人”的群体，就已成了疑问，在这里生活是否还有人的“意义”，就已成了疑问！

反言之，朋霍费尔和他的伙伴们为“力阻狂轮”而牺牲，是“有谓”的——它意味着：这个民族中还有那么一些人，在那个本民族至上的社会氛围中，还能够超越民族观念而生活，即首先作为“人”而生活，尽管这样做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内心痛苦的代价，甚至牺牲

生命的代价！这个“有谓”是巨大的——它意味着：这个民族还有可能获救，就像《旧约圣经》说到所多玛城得救的条件时所说：只要那城里还有十个义人，就可以不遭毁灭。对这个宗教象征，我们也许可以做这样的解释：当一个民族或国家还保留着正义的精神——其最低要求，是要制止对人（任何民族、阶层、种族、职业、年龄、性别、国籍、信仰的人）的非人对待——的时候，它也就还未丧失人性，还未变成“非人”的群体，还未走到万劫不复的地步。即使它已向着正义死亡、人性死亡的深渊方向走了很远，也还有一点走回来的可能。

这种精神，需要具有这种精神的“义人”来体现。因此，像朋霍费尔这样的人，才会有这么巨大的榜样力量——有人甚至认为，上帝因之而保佑德国在战后从废墟上迅速复兴。（我们确实看到，世界上有一些民族或国家，是在从战乱走向战乱，从灾难走向灾难，尽管我不相信那里没有“义人”，但是谁也不知道那里的义人有多少。）至少，像朋霍费尔这样的人，会用他们的生命，给后人提供深刻的教益。

这是我第三次为与朋霍费尔有关的书写序（前两次是1991年为《狱中书简》中译本和2000年为《作门徒的代价》中译本写序），但却丝毫不觉得轻松。

我想，这是因为，面对这样一个生命，人都不免会





激动。只要了解到这个生命是真正“为他人而活”的，是真正为了阻挡那压扁无数生灵的暴政“狂轮”而心甘情愿献出的，只要了解到这一点，任何一个良知未泯的人，怎么能不激动，怎么能不深深地甚至痛苦地反躬自省呢？

读者手中这本小书，是我国出版的第一本朋霍费尔传记，曾在德国获得青少年文学奖。我曾经在《作门徒的代价》中译本序中，把朋霍费尔的人格比喻为人们“可以畅游其中又敬畏其深”的深海，把他的精神比喻为人们“可以漫步其上又仰慕其高”的高山。读毕此书，读者可以发现，这本传记所表现的他的生命，体现出这种人格和精神的生命的生命，可以为我们证实这一点。

2006年7月7日至14日于北京

## 第一章

# 在世上占有一席之地

1906 — 1914

1906年2月4日，迪特里希·朋霍费尔诞生于布列斯劳（Breslau），当时的世界还井然有序。他的童年是人们所颂扬的“美好旧时代”。1899年，巴黎的世界博览会揭开了新世纪的序幕。在博览会的目录中这样写着：“世界博览会是整个世纪最伟大的成绩，也是本世纪最大的结算，在这个发明上有丰硕成就、在科学上有惊人发现的世纪……它走向终点，但也同时揭开了人类历史的新的一页。”这一令人动容的乐观陈述，表达了当时的时代精神，它所受到的质疑也远远少于博览会之前建成的埃菲尔铁塔。

迪特里希在家里的八个孩子当中排行第六。他的父亲卡尔·朋霍费尔（Karl Bonhoeffer）是精神病学教授，也是布列斯劳医院的院长。他的母亲葆拉（Paula），本姓





朋霍费尔的父母卡尔和葆拉，1930年

是有声望的市民。卡尔·朋霍费尔家的人以其市民阶级的身份而自豪，母亲葆拉家的贵族亲戚反而被疏远，她自己也早就脱离了贵族圈。葆拉没有找门当户对的婚姻对象，却去参加教师资格鉴定考试，最后还嫁给了一个市民阶级的人。

在20世纪初，人们就已经感受到，未来是属于市民阶级的。虽然当时的德国还是君主政体，贵族与军人也还是社会支柱，但是，工厂、贸易公司、研究实验室和大学教职……长期以来都属于市民阶级。他们确保了

冯·哈塞（von Hase），其外祖父是神学教授，曾任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御前牧师。迪特里希的家庭是德意志帝国的知识精英之家。朋霍费尔一家住在宽敞、有花园的房子里，楼梯间的墙上挂着画在细麻布上的家谱，其先祖可追溯到16世纪。父系的祖先

经济成长和科学进步，因此也使他们赢得了自信。

卡尔·朋霍费尔是典型的19世纪末的科学家。他确信，世界可以被研究和理解的。他对一切抽象推论，不管是宗教或科学，评价都不高。因此，他也不相信来自维也纳的同事弗洛伊德（S. Freud）。弗洛伊德曾说：“人类受制于下意识的冲动与情欲的本能。”这对卡尔·朋霍费尔来说是可怕的。这样的观念违反了他的思考和生活方式。对他而言，科学是对可验证的对象进行的实证研究和理性解释。他的生活哲学是：明辨现实，并用理性加以克制。他也是以这样的态度来教养儿女的。

迪特里希是家中最小的一个男孩。在1910年的照片中，可以看到那个4岁



卡尔·朋霍费尔（右）和他的儿子们（最上者为朋霍费尔），1910年







的小男孩和他的父亲及三个哥哥：卡尔-弗里德里克 (Karl-Friedrich)、沃尔特 (Walter)、克劳斯 (Klaus)。迪特里希是个漂亮的小男孩，拥有一头长长的金发及温柔如女孩的脸庞。他看起来完全不像家中其他的男人。他哥哥们的模样有父亲的遗传：男人味十足、身材修长、机警好问。他们也都继承了父亲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因此他们与父亲很有共同语言。

迪特里希这个爱做梦的小男孩却很难与哥哥们对抗，他得用尽心思争取父亲的认同，但是父亲的处世风格与哥哥们比较接近。即使在成年后，他还是辛苦地渴望得到父亲的接纳。这并不是说他曾与父亲公开讨论过此事，父亲无疑太权威了，不容丝毫讨论。但是后来他曾表示，苦涩的父子关系，一方面激励着他，另一方面又使他不安。在充满危机的日子里，他曾记述过他童年生活的回忆，包括自我批判与反省，从中我们可略知小迪特里希的困苦与冲突：

从15岁起，他就常常想象自己临终时躺在床上的样子，被所有爱他的人围绕着，向他们说最后告别的话。他常常悄悄地想着，在那一刻他要说什么。<sup>①</sup>

<sup>①</sup> 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慕尼黑，1986年第6版，第63页。

这是一个很难有机会站在父母与兄弟姐妹面前宣告自己想法的孩子的幻想，他渴望能有一次能成为整个家庭关注的中心。

在迪特里希的孩提时代，他的父母忙着照顾五个接连进入青春期的孩子——三个哥哥及两个姐姐，几乎喘不过气来。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加在他们身上。迪特



葆拉和她的八个小孩，前排左二为朋霍费尔，1911—1912年





里希属于在旁边跟着哥哥姐姐跑的那拨孩子——就是家中三个幼龄孩子：迪特里希、双胞胎妹妹莎宾娜（Sabine）及最小的苏珊娜（Susanne）。只有在小妹妹们跟前，他才可以当英雄。在这样的家庭结构里，迪特里希形成了反抗权威、要求尊重的信念。

迪特里希6岁时，他们全家搬迁到柏林。卡尔·朋霍费尔得到当时精神病学和神经医学的重要教职，并被聘为柏林大学仁爱医院的主管。他还当上了枢密顾问，拥有进入最高领导阶层的通行证。他成为德国精神病学的硕彦，并得到国际上的肯定，国内外的患者都来求问他的权威诊断。尽管如此，他仍体现了普鲁士知识精英的美德：有责任感、谦虚为怀、含蓄而不好表现。在这一点和其他的文化生活上，朋霍费尔家族都是具有启蒙自由精神的保守市民的典型。从所有的宽容原则来看，这个家庭基本上还是很父权的。父亲是学界中的大人物，即使在家中，他也不完全属于家人。他在家中有个工作室，那是孩子们的禁地。对所有的家务事，父亲都有最后的决定权，但是，只有真的发生了严重的事，才可以去麻烦他。

这并不是说卡尔·朋霍费尔不关心自己的家庭。相反的，每个孩子都觉得他是个热情的父亲。然而，亲子相处却有一套严格的规则。他们大部分的相处是在吃饭时间。按当时的习惯，小孩在饭桌上若未被问及，不可



朋霍费尔家的晚间聚会，1913年

以主动开口，在朋霍费尔家中也不例外。有时父亲会特别安排一个晚上与大家相聚，通常他会朗读一段席勒（Schiller）、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或是范塔尼（Fontane）的作品。从家庭相簿里的一张照片上可以看出，他确实是这个家庭的中心，整个家庭自然地以他为焦点。这个家庭宛如一个井井有条的完整的世界，即是德国皇帝威廉时代的理想市民家庭的画面。

所有朋霍费尔家的孩子不约而同地描述：父亲是一位有同情心同时又有距离感的人。他自己在回忆录中也写道：“精神科医生的专业训练，不只表现在对他人想





法的理解上，也表现在对自己情感的克制上。”<sup>①</sup>

这不只是针对他的同事弗洛伊德说的，也是他个人下判断与作决定的原则。从这种态度出发，能言善道或煽动情感他都不在行。卡尔·朋霍费尔也用这样的态度教育孩子，他告诉他们：没有人骗得了他。孩子们因此得以养成客观和诚实的态度。迪特里希的双胞胎妹妹之一莎宾娜回忆说：“父亲对华丽词藻的排斥，曾造成我们的寡言与不安，但也让我们对当代流行的俗话、闲扯瞎掰、夸张的话语不感兴趣。”<sup>②</sup> 这只是父亲的一面。另一方面，有几个孩子深受与父亲的疏离之苦。最小的女儿苏珊娜就记得，有一次去医院拜访父亲，看到他送玩具给医院的病童，她感受到一个亲近病童胜过于自己的孩子的父亲。病童甚至还可以摸他！“当我们要告别时，对父亲的爱油然而起，我好想像那些病童那样抚摸他，但是我不敢。”<sup>③</sup>

抚摸、表达情感、主动对别人倾诉，这些都无法从父亲那里学到。但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在那个高尚的市民阶层圈子里，保持距离是一种礼貌，自我约束是一种美德，人们很看重这样一些事。卡尔·朋霍费尔自幼

<sup>①</sup> 《卡尔·朋霍费尔的生活回忆》，载《卡尔·朋霍费尔百岁生日纪念》，柏林、海德堡、纽约，1969年，第76页。

<sup>②</sup> 莎宾娜·莱布贺兹·朋霍费尔：《过去、获救与克服——朋霍费尔家族的命运》，居特斯洛，1985年，第24页。

<sup>③</sup> 《苏珊娜·德雷斯的回忆录》。

深受这样的熏陶，他自然也会这样传承下去，这当中被压抑的情绪是不受重视的。

勇于表达情感，并依情感的需求而活，被认为是女人的特权。女性应当在理性的男性身边，负责其情绪的部分。这种传统的男女分工方式，也出现在朋霍费尔家族里。但是对母亲葆拉来说，勇于表达情感是自主权的表达。她在少女时期就不让人管束，即使当了卡尔·朋霍费尔的太太之后，她还是保持着自己的独特性格。她毫不拘束地流露感情，亲切而自然，卡尔·朋霍费尔也能接受她的方式。她清楚地活出了感情与理性并存的人生。

孩子们的小学教育，葆拉都自己一手包办。她不信任普鲁士式的学校教育。她常说德国人一生会有两次被整得很惨：一次在学校里，一次在军队里。孩子们很喜欢她上的课，因为她上课生动有趣，并且鼓励大家思考和发现。她教出来的孩子在学校里常感到无聊，甚至还会被那些以安静秩序为公民第一要务和最高教育目标的老师们吓得不行。

哥哥克劳斯就曾因为在美术课上把写生用的“静物”樱桃吃掉，而在家庭联络簿上被记上了一笔：“朋霍费尔吃掉了美术课模型。”老朋霍费尔夫妇对这样的事不动声色。只有不诚实或缺乏助人的精神，才会被当成严重的事。葆拉没有忘记年轻时对自由的渴望，她





给孩子一片自由的成长空间，这在当时算是很不寻常的了。她负责孩子们的社会和情感教育多年。她讲故事，也念《圣经》，孩子们从她那里学会了歌唱和吟诵诗词。当孩子们的生活处境出现问题时，她是他们的加油站。

在所有的孩子当中，迪特里希与她最为亲近。他爱好音乐、重视感觉，对他人和他人的故事都很感兴趣。在所有的男孩当中，迪特里希最具有女性特质。对年幼的他来说，要接受这样的事实，有难以想象的痛苦。小迪特里希渴望和父兄一样成为“真正的男人”。无论如何，他后来常说父亲对他有决定性的影响。显然，他一生都在不断尝试，要把从母亲那里传承的心理特质，与由父亲那接受的规范，加以平衡地控制。他有时夸张地与人疏离，据后来一些人的观察，这可能与他另外完全不同的一面有关。虽然父母对迪特里希都有决定性的影响，但童年时他并不黏在父母身边。这是因为，当时的市民家庭，与我们现在习惯的小家庭很不相同。那时虽然家庭也是个人成长中的基准和重点，但是家庭的成员却不只有亲近的亲属。

当时的市民阶级家庭包括厨师、女佣、车夫以及一位通常未婚而与孩子们亲如家人的女家庭教师。而迪特里希和兄弟姐妹所处的家庭，还包括寄居的未婚或守寡的姑姑、阿姨，或是在柏林大学念书的堂兄弟们，以及80岁才来依亲的老祖母。这个家庭很大，欢迎所有的客

人。叔叔与堂兄弟常来拜访，父亲的学生也常受邀请，渐渐地，邻居、朋友、哥哥姐姐们的追求者或未婚妻、未婚夫都在这个家庭出入。在一个所有讨论都可展开的家庭里，以及所有影响都被容许的氛围中，一个聪明的孩子会学到比他自己的期望多得多的东西。

在如此庞大的亲友群中，当然不会总是意见一致。在父亲的市民阶级家庭中，有君主政体的护卫者，也有支持共和政体的自由派人士；在母亲的贵族亲戚中，也不乏另类人物，她的一位亲戚就因参与1848年共和政体的革命，而被关进监狱里。

朋霍费尔家的孩子们很早就懂得，人们可以对帝制和德国社会持不同的意见。他们的家庭与一般市民阶级的家庭不大一样的是：他们不会偷偷羡慕贵族或霍亨索伦王朝（Hohen zollern）的光荣。他们嘲笑以漂亮制服闻名的皇家海军军装，也取笑那位对王室忠心耿耿的家庭老师。大哥卡尔-弗里德里克教导妹妹：“贵族只不过是一派胡言。”<sup>①</sup>他们看不惯一般人所羡慕的豪华排场、多愁善感的日耳曼神圣论以及强势的皇帝嘉言。他们对隐藏在皇家自我吹嘘的瑰丽布景后面的危险也略有感觉。但他们觉得这只是正常运转的世界里的小小缺憾。他们的内在世界与外在社会看起来都很平安，没有受到什么威胁。这个新世纪看起来还是十分的富庶、进步、

<sup>①</sup> 《苏珊娜·德雷斯的回忆录》。





位于柏林 Marienburge Allee 街 43 号朋霍费尔的家  
理性和安定。只有很少人在这时就看出传统的根基已经无法支撑，在美好旧时光的表象下，政治与社会的冲突正在发酵。人们只是致力于建立自己的社会地位，然后很有责任感地完成这个地位所附带的使命。

所以迪特里希小时候的世界是安宁的，他自己也曾说过，父母的家使他远离生活的黑暗面。他不用为衣食发愁，有足够的玩具和书籍，有空间与朋友玩耍，有自己的房间、花园以及哈茨山上的度假别墅。但是，真正使他与工人社区的孩子有所区别的，并不是这些因素。后来在提格监狱中，他写了一个未完成的戏剧残篇，其中，无产者海因里希（Heinrich）对出身中产阶级的克里斯托夫（Christoph）说：“你们有基础，你们在经济

上有保障，你们在世上占有一席之地……”<sup>①</sup>

这就是迪特里希占优势的地方，他知道他来自何处，也知道他是谁。他拥有具有地位的父母和足以自豪的家族史。古今名人在他的家中曾留下过踪迹。别人只能在百科全书里查到的名字，却出现在他家的访客登记簿或家族编年史中。

在这样的环境成长的人，生活显然比别人轻松多了。他从一开始就发展出有别于他人的自我意识。当一个人属于能参与世界大事的精英时，也就意味着他对这个家族传统负有责任。他必须是最优秀的，也必须证明他与其他人不一样。这样的责任意识在朋霍费尔家族中自然地传承着，同样自然的是，这个家族也为他们提供了履行责任的安全保障。

无论如何，这样的责任要求并没有给迪特里希造成困扰。他的学习又快又好，他不但是富有想象力的孩子，也是优秀的运动员。7岁半时他就有资格进入人文中学（一般是11岁才可以入学）。他非常适应学校的环境，既不好钻营，也不是书呆子。课余时间，就像普通的7岁孩子一样，爱读冒险小说，爱掘洞穴，玩音乐，还踢球。他的愿望也和其他的小男孩一样：获得有木塞的手枪和锡兵<sup>②</sup>。

① 迪特里希·朋霍费尔：《提格残篇》，慕尼黑，1978年，第63页。

② 安徒生童话《坚定的锡兵》中的主人公，其形象被西方国家做成玩具出售，甚至当今还有有关小锡兵的游戏。——编者





战争游戏在帝制时期的德国很受欢迎。军队检阅和军事演习皆五彩缤纷且浮华夸张，既是权力的示威，也是大众的娱乐。欧洲强国间的关系不时紧张，军事行动一触即发，德国皇帝有好用武力的狼藉名声。但是人们相信各国间的军事平衡可以保证和平，也相信所有的人（包括德国皇帝）基本上都是爱好和平的。将军们对新式武器跃跃欲试，工业巨子想要重新分配市场和原料来源，这些事实在当时都还隐晦不明。

迪特里希 8 岁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关于“美好旧时代”的内在和外在谎言终于被拆穿。欧洲的光明已逝，表面看来光明的世界已经四分五裂，再也不会返回到旧秩序去了。卡尔与葆拉·朋霍费尔的家也面临着重大变局。

## 第二章

# 梦想美好的死亡

1914 — 1918

1914 年 8 月 1 日，德国宣布总动员。街道上充斥着民族自决的气氛，朋霍费尔家的小孩也受到这种气氛的感染。迪特里希的大姐厄休拉（Ursula）从街上冲回家，大喊：“乌拉！战争爆发了！”——之后得到一个耳光。战争是一件严重的事情。

德国的知识精英都不希望战争，但他们也相信那无法避免。根据官方的分析，攻击是避免轴心国被封锁的最佳防御。轴心国为阻止竞争力越来越强的德国有“出头”的机会，想逼迫其出战。没有人愿意在这种情况下弃祖国于不顾。即使是社会民主党的人也不愿变成“没有祖国的小子”。8 月 4 日他们批准战争贷款，反对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的决定及卡尔·李卜克内希（Karl Liebkrecht）的领导。德国皇帝宣告：“我不





认识任何政党，我只认识德国！”教会的牧师们祷告：“上帝与我们同在！”士兵们在军队前线写着：“一颗子弹，一个俄国鬼子！一次射击，一个法国佬！”并且挥旗示意，好像是去参加民俗射击比赛一样。



9岁时的朋霍费尔

对于这种热衷战争的态度，朋霍费尔一家敬谢不敏。但他们确信德国战争的目的是合宜的，并愿履行“对祖国的义务”。战争公债发行时，卡尔·朋霍费尔就像上千名教授一样，签署了这份宣言：“我们感到愤怒，因为德国的敌人想在德意志的科学精神与所谓普鲁士的军国主义精神之间制造对立。德国军队除了德意志民族情操以外别无其他精神。军队的职役使我们的青年干练地使用所有和平工具，因为他们受教为尽忠职责而放弃自我，并且被赋予真正自由男人的自我意识和荣誉感，自愿为大局而

卑屈自己。我们相信整个欧洲文化的拯救，系于具有军纪、忠心及和谐一致的德意志牺牲勇气的军人身上，而他们将夺得胜利。”<sup>①</sup>

德国的儿童和青少年被灌输以这样一种精神：“世界应该依据德意志的本质而被医治。”这种意识将经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广泛传播出去。虽然官方声称欧洲文化的拯救系于此价值，但渐渐地，连迪特里希也对这种价值观感到怀疑。

日复一日，他在学校与同学画出了最新的战线走向。每一个教室都挂着画有欧洲各国的地图，在图上德军行进的方向都会以黑、白、红小旗加以标示。后来前线真的停住不动了，接着人们听到有关技术装备战、阵地战及毒气战的传闻。朋霍费尔家庞大的亲属阵容中，传来第一个战争阵亡者的消息。

堂兄的死亡使迪特里希和他的双胞胎妹妹莎宾娜思考到深夜。“我们到夜晚还很清醒地躺在床上，尝试着想象死亡和永恒生命的意义。我们尽力每天晚上多接近永恒一些，我们以为只要一直想着‘永恒’这个字眼就行了……但永恒却是那么久远又那么神秘。”<sup>②</sup>

这两个10岁的小孩并非唯一努力思考存在问题的人。其实这个不愿结束的战争，已把死亡带进群众的意

<sup>①</sup> 《我们的世纪图像》，居特斯洛，1964年，第192页。

<sup>②</sup> 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慕尼黑，1986年第6版，第62页以下。





识里。此时，教会肩负着增强坚忍意志的任务。1917年，《路德会全览报》（Die Allgemeine Lutherische Kirchzeitung）摘录了后来成为迪特里希的博士指导教授的神学家莱因霍尔德·西伯格（Reinhold Seeberg）的一段话：“继续战斗下去，继续坚持下去，四处为德意志的



朋霍费尔与他双胞胎妹妹莎宾娜

和平做见证！我们信任德意志民族的健全性格，我们信任军队及其领导者，我们信任德国皇帝——德意志之心，我们信任上帝。德意志的和平就是获胜的文化的和平。这样的和平是上帝赐给我们的！”<sup>①</sup>

这个谈话发表在一次群众集会中，他们反对以现存的疆界为基础缔结和平协约。德意志的和平乃是为德意志夺得土地。

对死亡的浪漫化随着“坚持到底”的口号而出现。

<sup>①</sup> 君特·布拉克曼：《1917年时期德国的新教教会》，维滕，1974年，第103页。

爱国歌曲和明信片夸张地颂扬着士兵的死亡。赫拉兹（Horaz）则说：“为祖国而死是甜蜜而光荣的。”人道主义教育家对此进行了谴责。奥古斯堡的中学生贝托特·布雷希特（Bertolt Brecht）当时写了一篇嘲弄赫拉兹的作文，其中提到：如果发生紧急状况，这个宫廷小丑将是“溜得最快的那个人”，为此他差点被开除学籍。<sup>①</sup>

与布雷希特相反，迪特里希的感觉和思想，看来是比较偏向为祖国牺牲的。他满怀热情，读了许多为美好目标而牺牲生命的故事。对这个敏感且富想象力的男孩而言，死亡一度是他经常讨论的主题。迪特里希感到着迷的问题是：“死亡如何存在？”在上面提到的那篇1932年的“自我剖析”中，他曾描述过当时他心中最想做的事：“我多么乐意死去或早点死去，那将是一个美丽而敬虔的死亡。其他人将看到并知道，死亡对相信上帝的人而言并不困难，反倒是庄严美好的。”<sup>②</sup>

然而，这个“美好之死”的想象也有隐晦的一面。迪特里希渴望死亡，但同时也害怕死亡，因为他还是很愿意活着。有时候他是如此强烈而尽情地享受生活，甚至连家人也感到诧异。到了战争末期，连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都发生了家计供给的问题，但迪特里希却在日常用品的安排上，具有出人意料的能力。他其实很好吃，

<sup>①</sup> 维纳·贺希特、汉斯·约阿希姆·布恩格、凯特·吕里克·魏乐：《贝托特·布雷希特——他的生活及作品》，柏林，1969年，第13页。

<sup>②</sup> 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63页。







算是一个美食家。

这种生性活泼、乐观的一面，正好与渴求死亡的另一面形成对比。迪特里希还记得：“有些夜晚，当他疲惫地爬上床时，他会以为就是现在，死亡的时间到了。然后不知所措地向上帝嘶喊，要求他延缓时间。这种经验让他有些迷惑。原来他显然还不愿意死，原来他很胆小很窝囊……但他真的已准备好赴死，只是动物本能作祟，才让他一再地轻视自己，也使他对自己产生疑虑。”<sup>①</sup>

迪特里希在成年之后还会想起这段情景，这绝不是偶然的。如同许多敏感且朝气蓬勃的人一样，这个内在的矛盾伴随了他的一生。迪特里希曾一再尝试，把自己内在的两端联合起来：乐于助人和贪图舒适生活，自愿放弃和享受生活，渴望死亡和热爱生命。

然而，那个“美好之死”的天真幻想，随着被真实死亡压迫的现实生活渐渐逝去。1917年，哥哥们被征召入伍。原本通过父亲的关系，他们都可以远离直接的危险，可是他们却报名参加了步兵部队，“因为那儿最需要他们”<sup>②</sup>。

1918年4月，沃尔特·朋霍费尔身受重伤。死前的三个小时，他请人帮他写下口述家书：“我那种‘不去

<sup>①</sup> 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63页以下。

<sup>②</sup> 《苏珊娜·德雷斯的回忆录》。

想它’的忍痛技巧，在这里必定也要被嘲笑了。世界上的确还有很多比我的受伤更有趣的事情。开麦山(Kemmel-berg)之役的消息，和今天据报我军已攻下伊盆(Ypern)，给了我们许多希望……”<sup>①</sup>

从这段话中，可以窥见朋霍费尔家庭教育所形成的影响：感情收敛，尽责到底。所以卡尔·朋霍费尔没有让人觉察到他的痛苦，这也是合乎逻辑的事。但他的痛苦有多么深刻，后来才显现在一个事实上——有10年之久，他无法继续在传统的家族日志上动笔。

他将感情上无法承载的伤痛，完全交托给了他的妻子，这对葆拉来说几乎成为重负。葆拉·朋霍费尔因丧子之痛而来的强烈哀伤，甚至让整个家庭感到毛骨悚然。有几个星期之久，她被安置在一个友好的邻居家中。

迪特里希因为哥哥的死亡及母亲的悲痛欲绝，感到了深切的痛苦。战争终结了一个表面安宁的世界，那个“美好旧时代”的画像已无法再度恢复。迪特里希准备迎接一个动荡世界的危机和冲突，但他始终无法停止对逝去的世界的完整秩序的渴望。

<sup>①</sup> 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50页。





### 第三章

## 知道自己的立场

1919 — 1923

1922年6月24日，葛林瓦德（Grune wald）中学的学生听到附近皇家大道上传来枪击声。不久他们获知，威玛共和国的外交部长华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被极右派组织“领事”（consul）射杀。在听到这一消息的中学生里，其中一个就是16岁的迪特里希。关于他的反应，一位当年的同学回忆说：“我仍然记得我的朋友朋霍费尔当初爆发的激烈的愤怒。我记得他问道：‘当德国人把他们最好的领导者谋杀后，德国到底该往哪里去？’我记得这些，因为我很钦佩一个人可以这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立场。”<sup>①</sup>

知道自己的立场，在1922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sup>①</sup> 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57页。



朋霍费尔（二排右二）在柏林中学教室里，1920年

1919年的革命将德国皇帝赶走，产生了威玛共和国。但在当时大部分人的感受中，德国第一次自己产生的民主是没有秩序的。事实上，威玛共和国的确不稳定。军队、行政及司法仍被君主政体的拥护者霸占，他们想勾结新的极右派团体，把历史的巨轮往回推。街道上和工厂里的工人运动，则要求推动已迟缓的社会改革。在往后移和向前挤的两股力量中，社会民主主义者及资产阶级的党派只能大呼吃力。在这场社会角力中，他们把偏右的军队投入反左的战争里。卡尔·李卜克内希和罗莎·卢森堡被帝国军团（Reichscorp）的人所谋杀。这桩谋杀案至今仍未受到惩罚，司法机关的右眼睛瞎了。

其他的冲突原因来自外部。《凡尔赛和约》强迫德国接受的条件，令德国人民甚感不公平，认为这个和约





对德国极具毁灭性。外交部长拉特瑙是接受和约的政治家之一。他是一个务实主义者，考虑的是欧洲的平衡与和解，但对复仇心强烈的右派而言，这就是“绥靖主义的政客”，必须予以铲除。

朋霍费尔一家也和和大家一样拒绝《凡尔赛和约》。他们当然尊重新的民主秩序，对1919年的讨论也已在家族团体中举行过。卡尔-弗里德里克和克劳斯在当兵时，经历到他们家庭结构之外的社会性变革，因而带着新的经历及观点回到家中。卡尔-弗里德里克变成一个社会主义者，“他希望无论如何都能尽量参与其中，但是妈妈和爸爸并不完全赞同”<sup>①</sup>。迪特里希在1919年写给祖母的信中这么提到。但是妈妈和爸爸对他们的谅解，甚至足以为他们当中的“左倾分子”和在波罗的海的亲戚辩护。在波罗的海，舅舅鲁迪格·冯·戈尔茨伯爵（Rudiger Graf Von der Goltz）带领以前在波罗的海的海军分队，投入到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右派阵营中。后来，当迪特里希从事反抗国家的活动时，这个极端保守的“共产主义者克星”的名字变成了战争的代名词。迪特里希在1942年写给流亡到英国的妹妹莎宾娜的信中就曾提到：“鲁迪格舅舅觉得好一些了，但我觉得他不会继续这样太久。”<sup>②</sup>

① 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54页。

② 《1942年4月17日书信》，摘自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84页。



朋霍费尔的三哥克劳斯·朋霍费尔 但是当我想这些时就会作呕。最近格茨（Goetz）教授以民主主义为基础，讲述有关‘大学生与新时代’的关系。当时那些学生怪声大叫，不满地用力跺脚并辱骂他。大家都清楚地看出我的惊怒。总而言之，我和我的后台——一个愚蠢的退休老古板少尉——被他们邀去决斗。真是令人沮丧，当你看到这些被托付未来的人只会发牢骚，且不断回溯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与帝国建立）的旧事，自己却只会装腔作势……汉斯，想想看，以后我们还得跟这班兄弟继续来往……”<sup>①</sup> 汉斯和克劳斯都在1945年成为纳粹司法下的牺牲者。

① 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58页。

克劳斯在20年代初开始当法律系学生，他是一个活动力很强的民主主义者。1922年他在写给他的朋友，也就是后来成为他妹夫的汉斯·冯·杜南义（Hans von Dohnanyi）的信中，曾提到他在海德堡的大学同学们：“我现在已在政治方面认识他们，





迪特里希的兄长及其朋友——其中有些变成姐夫和妹夫——在家庭讨论中提出一个重要的观念：不可以把德国的发展交在反民主的力量手中。一个新国家仍需要旧式教育精英，而朋霍费尔一家也很乐意接受新生事物，他们订阅新发行的报纸，并支持民主主义，一直到他们自己也成为支持民主的重要领导角色。无疑地，在那个共和政体时代，他们知道的社会地位和责任。迪特里希的兄长们在事业上飞黄腾达，所有兄弟姐妹也都完成门当户对的婚姻，而他自己是所有里最保守的，一个非常守秩序的人，这个人在拉特瑙被杀之后写道：“一群右派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猪猡。只因为一个纨绔子弟、一个蠢蛋不喜欢他，他就要被杀。”<sup>①</sup>

迪特里希有很单纯的政治世界图景。对那时的他来说，布尔什维克主义就是无秩序、街道势力、由下往上的反叛。而在民主主义内有“最好的领袖”，他们来自他所属及所信任的世界。迪特里希——这个直到求学时代结束都还很少走出柏林南部高级住宅区的青年——无法理解北部贫民区、威丁区（Wedding）及普伦茨劳山区（Prenzlauer Berg）的人为何要走上街头，并要求改变环境。

他知道自己的立场吗？看来他似乎知道自己出身何

<sup>①</sup> 《1922年6月25日书信》，摘自迪特里希·朋霍费尔《青年时期和大学学习——1918~1927年》，慕尼黑，1983年，第63页以下。

处，以及他对其出身负有何种责任。他不像哥哥们那么具有批判性，他接受了父亲的保守态度，认为有领导能力的精英是必要的。卡尔·朋霍费尔——可以在化妆舞会扮演临时雇工而不被人认出来，并且同时又是共和政权的枢密顾问——对于那个比其他人更加努力想要获得父亲认同的小儿子而言，毫无疑问是个很好的模范。

迪特里希尽其所能地努力着。在父亲的影响下，他循行“放弃词藻堆砌、讲求现实的指示”<sup>①</sup>，在假期中他给父母写了一封信：“校长又给我们一个很愚蠢的作文题目：树木这样告诉我。他当然是想要听到一堆可怕的华丽词藻，我干脆请姐姐克瑞斯苔尔（Christel）帮忙，写了一篇非常科学的树木解剖学与生理学论文。”<sup>②</sup>

这完全像他父亲的风格。因此很难说迪特里希在成长中，压抑了多少自己的想象力和感情。另一方面，这些能力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失去，迪特里希尝试为自己找出一条新的道路及表现方式。其中一条出路是音乐，另一条则是宗教。在这两个方向上，他都想过在职业上的发展的可能性，但迪特里希很早就做出决定，他要成为一个神学家。他在1923年以最高的分数通过了中学会考，在成绩证明中只记着一个缺点：字体不够漂亮！

<sup>①</sup> 克里斯蒂安·格雷默斯、汉斯·普法伊弗尔：《神学与传记——以迪特里希·朋霍费尔为例》，慕尼黑，1983年，第18页。

<sup>②</sup> 《1920年11月1日书信》，摘自朋霍费尔《青年时期和大学学习》第30页。





在最后一个学年，这些未来的中学毕业生都会被问及将来希望从事的职业。迪特里希把这一幕记了下来：“在毕业班那年，有一天他轻声地回答老师‘我要读神学’时，整个脸都红了。这个年轻人在当下深深吸了一口气。这件事看起来很不寻常，他深深地享受这个不寻常，但同时又有一种羞耻感……现在他已经跟大家说了，现在生命里的那个谜必须向他解开。现在他喜悦地站在神面前，站在全班面前，现在他是全部的焦点。他现在看起来是不是如同他所希望严肃而果决的样子？他再度觉得羞愧，因为他知道自己有着可笑的虚荣心。”<sup>①</sup>

这一幕透露出他准备献身神学的决定，那是在与家人（特别是父亲）的期望的斗争中做出的。迪特里希找到了一条出路：一条有点属于个人又有点特别的路。但最重要的是他要迈出第一步，将自己脱离出父亲的世界，去寻找自己的立足点，以便在某个时候能确切清楚知道自己站在哪里。

<sup>①</sup> 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65页。

## 第四章 了解什么是教会 1923 — 1924

每种食物值10亿。面包花了我60亿。人造奶油值200亿。除此之外我要付350亿的大学学费。衣服更是贵得可怕。一件浆过的衬衫在几天前索价150亿。<sup>①</sup>

1923年，迪特里希开始研读神学。虽然通货膨胀严重，但父母支付了他在图宾根（Tübingen）两学期的学费。他父亲也曾在那里就读过，所有儿子都应从那里开始大学的学习生活。迪特里希非常认真地追随父亲的足迹。如果他已经表现出应有的与众不同，那么至少在生活方式上他要脱离父亲的模式。他与父亲之间的关系很

<sup>①</sup> 《1923年10月27日及同年11月3日书信》，摘自朋霍费尔《青年时期和大学学习》第60页以下。



疏远，哥哥们与父亲的关系都超过他。

迪特里希完全是一副出身优越家庭的模样，他是一个“优雅的社交高手”，并且具有“敏感的精神世界”，兄弟会联盟这样报道说。他不需要为食物及换洗衣物烦恼，他永远不需要学习这些！

但是那个十分特别、能找出自我认同和生命之谜的解答，也就是他期待于神学的东西，如今又是如何呢？为何人们可以在任何地方想到他——唯独不在教会里？

迪特里希虽然是人们所谓的虔诚的人，然而他的方式并不属于任何一种既定模式。他缺乏大部分神学学生所特有的气质：教会式的社会化。虽然他的亲戚中有人当牧师，但朋霍费尔家的人与教会的关系并非特别密切。卡尔·朋霍费尔的理性与葆拉·朋霍费尔的活泼，使他们无法接受那种“牧师教袍发出千年霉味”的古板教会，而老实验主义者卡尔·朋霍费尔也多少刻意把宗教搁置起来。“关于这方面我了解得不多”，他大概常常带着这种令人无法忽略的讽刺的口吻说着。宗教就像无法确定的感觉世界一样，是属于女人的。

葆拉·朋霍费尔是一位很虔诚的女人，但是这个倔强的牧师之女，却不送孩子们到教会去，而是自己承担起宗教教育的工作。利用拿撒勒画派施诺尔·冯·卡罗斯费德斯（Nazarenerstil Schnorr von Carolsfelds）所绘的具有浪漫风格的图画《圣经》，她使孩子知道《圣经》

故事里变化多端的生命。这些故事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对迪特里希。在睡前，他还自愿继续读点《圣经》，而卡尔却把冒险故事偷偷夹在《圣经》里。家庭女教师来自虔敬的莫拉维亚兄弟会，她不会禁止人们睡前阅读《圣经》。

迪特里希的虔敬很重视感觉。他有“红色诗歌”与“黑色诗歌”的分别。《人生道路上，耶稣走在前！》是红色诗歌，《现在，感谢上帝所赐一切》是黑色诗歌。黑色诗歌是教导和教会，红色诗歌是生活和信仰。

父亲对迪特里希攻读神学的决定不太高兴。后来他透露：其实他觉得，迪特里希的才智不应只限于神学领域。神学在柏林的学术圈并不享有盛名。神学适合已有成就的人，或那些不想在科学或政治上发展事业的人。连哥哥们也发出批判性的评论。对他们而言，教会只是一个小事业，或一个退化的团体。“我正是要改革教会！”迪特里希可能会这样回应他们。

当就读神学的第一学期，迪特里希想做的似乎太多了。神学学生迪特里希·朋霍费尔一开始是个地道的门外汉，他并不熟悉教会的世界。然而，在他自己出身的那个世界里，他也是站在边缘上。如同最了解他的朋友艾伯哈特·贝特格（Eberhard Bethge）在回顾过去时所言：“因为他孤独，所以变成神学家；然而，也因为他





是神学家，所以他孤独。”<sup>①</sup>他并没有真正地融入这个世界，在寻求自己的定位时，他游离于两个世界之间。

在图宾根的前两个学期，他在这方面似乎没有什么进展，神学与他想探索的“存在问题”只有间接的关系。神学系提供的是宗教史、教会史和哲学课程。迪特里希依其出身以一个受教育市民的心态来学习：科学和文化是重点，尽量打下广博的基础并达到较高的水准。“存在问题”现已遁入潜意识里。

在一次溜冰时，他发生了意外，这个意外很可能就是其内在危机的表现。由于担心迪特里希后来会常常发生昏厥，他父母来到图宾根探望他。他们希望儿子到罗马游学，放松一下。

当1924年2月初与克劳斯一起出发时，他已经把整本旅游手册背熟。在布伦纳（Brenner）时，迪特里希在旅游日记上写道：“想象开始变成事实。”<sup>②</sup>

迪特里希通常不写日记。但在旅行那段时间，他常常把重要的印象记录下来，所以现在才有机会回溯他在旅行时所做的事。罗马的经历把他向前带进了一大步。

刚开始，这像是一趟教育和冒险之旅。“我们住在品奇欧（Pincio）附近的一家干净旅店……旅店里的

① 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62页。

② 《意大利的日记》，摘自朋霍费尔《青年时期和大学学习》第81页。

只说意大利语，这对我来说正好合适。”在几天之后，“回到家时发现账单已经寄到，我非常高兴，因为比我所想的还要少三分之一……我跟克劳斯满怀欣喜地到冯塔那·特雷维（Fontana Trevi）旁的一家餐馆，喝了一瓶非常棒的白葡萄酒，并享用乡村乳酪。然后再到广场，在残败的柱廊下，我沉浸在一种庄严美好的梦境中，达一个小时之久。望着三根卡斯托及保罗斯神庙（Castor-und Polluxtempels）的柱廊，再加上一瓶美好香醇的土产葡萄酒下肚，这一切都助长着这极美的一个小时，我完全沉浸在古希腊罗马的世界里……已经到了十一点半，我和克劳斯又喝掉四分之一瓶的葡萄酒——明天一早在圣彼得教堂的弥撒，我充满了期待。”<sup>①</sup>

之后，迪特里希写下他在棕树节的经历：“今天早上在圣彼得教堂的弥撒，由一位红衣主教带领……在坛前除了红衣主教之外，还有许多高层的神职人员、神学院学员及僧侣。教会的普世性显得缤纷多彩，白色、黑色、黄色，所有宗教的传统服装都融合在教会里，看起来还真和谐。在这排壮观的宗教仪式行列下，棕榈叶被祝福：那些硕大、黄色、被编织的枝条……合唱团的‘信经’唱得多么美好啊！……”

“星期日下午在三一堂的礼拜，几乎无法形容。六点时出现40位见习修女，她们以一种庄严隆重的姿态

① 《意大利的日记》，摘自朋霍费尔《青年时期和大学学习》第86页以下。



走进来。当管风琴响起时，她们用一种难以想象的朴素与优雅姿态，认真严肃地唱着晚祷歌曲……这一切营造出一种深沉的虔敬，那是我闻所未闻也从未见过的。半小时之后大门被再度开启，人们看到夕阳之下的罗马圆形穹顶这一最为庄严优美的风景。我又到品奇欧附近散步。这神圣庄严的一天，是我领悟到天主教部分真实性的第一天……我想，我开始了解‘教会’的意义了。”<sup>①</sup>

在罗马的日子里，对迪特里希而言，一些过去被分开的东西都得到复合：教会与信仰，教义与生活。他经历了一种虔敬，那是不会将意义抛掉或摆脱的虔敬。他也认识了一种教会，它是普世的，并同时给予个人信仰以一个联结的秩序和一个看得见的形式。

这样的认识持续给予迪特里希以帮助。同时他也在思索新教教会所缺乏的东西：“它（教会）充当未受教育者的启蒙运动的留宿所太久了”，如同一个让市民人心振奋、让国家为之欢呼的协会。迪特里希现在必定无法再适应教会的限制了。

后来，他就是从这个角度，开始草拟对教会的批判。他先以自由和开放的态度接受新的经验。他与爱冒险的克劳斯一起到西西里岛（Sizilien），他们很自在地利用了一次机会，横渡到非洲并停留了十天。

迪特里希在日记里记录下这段期间的感悟：以实际

<sup>①</sup> 《意大利的日记》，摘自朋霍费尔《青年时期和大学学习》第88页。

的体验取代想象，对于世界观的建立是多么重要。

“人们可以随自己的意愿阅读有关国家的一切。所有的想象如同色彩鲜艳的画，这画是构图在祖国的画布上的；现在如果少了祖国的背景，鲜艳的色彩将不如往昔。这种情况同样发生于当人们站在东方，却将对祖国的成见用在某些截然不同、用我们的标准无法测量的事物上时……”<sup>①</sup> 在的黎波里（Tripolis），这样的眼界扩展变得十分危险。“非洲的情况是这样的：大量的沉重物质被丢进这个空荡荡的容器里，这个容器的基底并不够坚固，如果不赶快得到支撑，就有穿破的可能性。以后一定要通过确实的研读和思考，才能挽救这个危机，因为在那里我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如此的惊人且难以理解。”<sup>②</sup>

迪特里希——这个一直尝试着保持有秩序的固定世界的人——感觉到那个用学习标准“无法测量”的东西已经脱轨了，并使他感到压抑。虽然他不愿意离开意大利，但当时的情况逼着他返回柏林，回到他自己信任的那片土地，在这块土地上，他必须重新整理自己的经验。

父母很难料想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当他旅行结束从罗马回家时，他写道：“过去的几个星期发生了好多令

<sup>①</sup> 《意大利的日记》，摘自朋霍费尔《青年时期和大学学习》第97页。

<sup>②</sup> 《意大利的日记》，摘自朋霍费尔《青年时期和大学学习》第101页。







我注意的事，这些事是我还想再广泛了解的，然而在那里，我恐怕无法达成这个目标，因此我很高兴可以再回到柏林。”<sup>①</sup>

他回来的时间正好赶上 1924 年夏季学期的注册。显然，只有通过工作，他才有办法承受在旅行中被激起及释放的经验。但是，他的学习现在有一个远景，他将不再会去摆脱这个问题：什么才是真正的且有生命的教会？

<sup>①</sup> 《1924 年 5 月 27 日书信》，摘自朋霍费尔《青年时期和大学学习》第 134 页。

## 第五章

# 圣徒的团契

1925 — 1927

20 年代的柏林并非一个安稳的环境，迪特里希在回到柏林之后，马上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旧的秩序已被打破，传统的价值观念受到质疑。人们争论着一切事物：共和政体的未来、女人的超短新发型及裸体主义的价值。关于没收诸侯的财产、布莱希特的新作品及反战小说《西线无战事》(Im Westen nichts Neues)，在民间都有对立的两极意见。在柏林大学的神学系里，人们辩论着：神学和教会的存在权在哪里？这在不久前还是十分清楚的事。

1923 年，《基督的世界》杂志刊登了一篇标题为“十五个问题致神学家中轻视以科学方法做神学者”的文章。阿道夫·冯·哈纳克 (Adolf von Harnack)，这位曾参与起草威玛共和国宪法、柏林神学院的大人物及





著名的教会历史学家，在著述中叹息神学家不再重视理性：“如果说所有未知的、靠感觉的、神圣的（Numinose）、令人神魂颠倒的（Fascinose）东西，存在于人类之中这么久，却仍无法被理性所捕捉、理解和澄清，那么人们如何能责骂理性，甚至还想剔除它呢？究竟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神学，与科学的关系也如此紧密相连且情同手足呢？”<sup>①</sup>

这与当时新一代神学家的狂飙运动（Sturm-und-Drang-Bewegung）理念相违背。这些年轻的神学家把他们的神学方法称为“辩证神学”（dialektische Theologie），其先驱是卡尔·巴特（Karl Barth）。巴特觉得有责任为自己及所属团体，与哈纳克论战：

如果神学再度获得实事求是的勇气，即为上帝的话语启示、审判和爱作见证之勇气，那么实际的情况就更有可能是，“科学”寻找与神学有“紧密相连且情同手足”的关系，而不是反过来的情况。<sup>②</sup>

迪特里希全身心地参与了这场讨论。在巴特与哈纳克的争论之间，他自己处于两难境地。哈纳克是他父亲每周三的教授圈子内的人，属市民阶级，人文科学知识

① 艾伯哈特·贝特格、蕾娜特·贝特格、克里斯蒂安·格雷默斯编：《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生活画像》，慕尼黑，1986年，第59页。

② 同上书，第59页。

丰富，主张神学与实证科学的协调一致；巴特则属于瑞士的工人团体，支持社会民主党，对基督教信仰的存在存有疑问，他为神学划定了界限，具有教会和知识分子式的市民阶级思想。迪特里希一方面想要使父亲及兄长了解他学术的严肃性，另一方面又想经由神学寻找一个属于自己且能捕捉现实的特殊方式。

但这些牵涉到的不只是迪特里希的神学认同，根本的问题是：教会为了成为教会做了些什么？

卡尔·巴特在哥廷根（Göttingen）当教授期间，借着这个问题惊醒了德国的神学家。这位来自巴塞尔的牧师，曾每周为了是否在礼拜日能有一些真正重要的东西传讲，而感到苦恼万分，直到他醒悟到：唯有神“完全不同的话”才可以拯救教会。巴特说：“教会已经作了



辩证神学的先驱卡尔·巴特





太多错误的妥协。”为了使上帝的话语变成适合上流社会的清谈，教会毫无批判地接受了主流文化及社会秩序，并由此提高其宗教性。这个“文化基督新教”（Kulturprotestantismus）没有能力避免战争和提出社会的问题。它代表的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所言“人为了自己需求而发明的宗教”。一个教会若与国家的权力精英之间的批判性距离这么小，到最后也会失去自己大部分的身份认同。唯一重新开始的机会，就是去思索神在他的话语里的心意——与人的权力及秩序观念相反的心意。

德国年轻的神学家渴望拥抱巴特的想法，其原因是令人惊奇的。因为他父亲和祖父的教会的信誉，已经彻底破产。自从“受上帝恩典”的皇帝保证维持旧有秩序的安全以来，教会就不必为它的存在权而担忧了。因为以国家教会的身份，它已成为统治机器的一部分，即使它长久以来已经失去对大部分民众的影响力，特别是对工人和具批判能力的知识分子的影响力。教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革命之后，才注意到自己失去了多少现实性。教会特权失落，大量信徒流失，但大家面对这一危机的反应不一。大部分教会领袖渴望恢复君主政权制度，并且选择了德意志国家主义；另一小部分人希望在新的宪法与民主政治上确立教会的地位，以便确保它的社会责任。辩证神学家则认为，这两个努力的方向，在

对待教会与国家的关系上都不正确，他们并不希望教会脱离政治，但是希望能解开国家对教会的束缚，让教会在面对国家时，有独立行动的自由。

迪特里希还是一直忙于寻找自己的定位，并深受“教会本质”问题的折腾，但他却被巴特的想法吸引。这个20岁不到的神学学生已经有足够的自信，为支持巴特而与哈纳克辩论。

“当时一位年轻的金发学生，一再反驳那位受人尊敬的博学家冯·哈纳克。我现在不是很记得当初讨论的主题——应是以卡尔·巴特为话题，但是我还记得那种隐约存在的激动，我感觉到一种在神学里自由、批判及独立的思考。”<sup>①</sup>一位当时的同学这么回忆道。

显然地，支持辩证神学的立场并不是这么容易决定的。因为迪特里希处在一个正尝试提出质疑的世界里。他在精神上和感情上与他家庭有深刻的联系，无法轻易地将朋霍费尔家的市民阶级世界观抛下。他需要距离，但也愿意结识朋友；他希望离开，但同时又想留下。一直到很久之后，迪特里希才能把这个矛盾用来丰富自己的神学。但在此之前，他处于这两个世界之间并被来回撕裂，一个是他出身的世界，另一个则是要终结市民阶级安定感的神学实在。

最初他尝试用妥协的方式来处理这个矛盾。正好当

<sup>①</sup> 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96页。





时莱因霍尔德·西伯格教授还在柏林大学，他是学院里极少数既支持文化基督教，同时又参与右派保守主义“不神圣同盟”（die unheilige Allianz）的代表。迪特里希选择他当论文指导教授。迪特里希在1925—1926年的冬季学期初，登记了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圣徒的团契（Sanctorum Communio）——一种教会社会学的教义研究”。

“圣徒的团契”指的是圣徒共同生活的团体。古老教会的教义一直强调基督徒的与众不同，即他作为上帝选民的意义——生活在这个世界里，但不依这个世界的规则而生活。因为这个古老的基督教要求，卡尔·巴特又再度引起教会的注意。连迪特里希也接受了这个想法，但他考虑的是另外一个方面：即使教会的起源不在这个世界，它还是有一个属于世界的社会形象。他确信教会是由上帝创立的，并且如同其他团体一样，是属于经验性的团契，<sup>①</sup>在其中，“基督以团体的样式存在”而继续活着。教会必须与这个世界保持距离，同时也要在这个世界里并向世界负起责任。

年轻的神学家常常会用一种天才式的“第三条路”来解决教义上长久存在的矛盾。迪特里希在1927年被学院认可的博士论文，也属于这一类型。但是在迪特里

<sup>①</sup> 迪特里希·朋霍费尔：《圣徒的团契——一种教会社会学的教义研究》，慕尼黑，1969年，第27页。

希的观点里，辩证神学家和经验科学家，虔诚的出走者和顺从的市民儿子，两边会互相和解。无论如何，这一切在当时只有他自己感兴趣。他花费了许多精力，才找到出版社帮他出版论文。然而，在神学圈子里，他又再度落空而回。他的表兄弟汉斯-克里斯托夫·冯·哈塞（Hans-Christoph von Hase）是马堡（Marburg）的神学学生，曾写信给他：“你的东西很难被接受。巴特的追随者不接受它，是因为里面的社会学；社会学家不接受它，是因为其中的巴特神学。”<sup>①</sup>

对于迪特里希而言，这无所谓。那并不是他最后一次将神学与“寻找自我认同”和“个人存在问题”联结在一起。这是“实践中的神学”，后来的人这么叫它。神学家迪特里希·朋霍费尔想的是对生命的实际掌握。因此，他也从不说那些自己无法在生活中实践出来的高言大智。

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的求学生活到底如何呢？这样一个早熟的跳级生——当别人在他这个年龄，才正要开始学习，他已经在第三个学年里，完成了八份研究报告及一本博士论文，并且还参加了国家考试——他究竟是怎么生活的呢？

一整天我都在工作、练习、读书并散步。昨天我和

<sup>①</sup> 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113页。





祖母及苏珊去听歌剧《蝙蝠》……目前我有一个很有趣的作业：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宗教社会学……在韦伯之后还要读特勒尔奇（Troeltsch）基督教伦理的社会教义，然后还要把胡塞尔（Husserl）的部分继续完成。如果最后还有时间的话，我基本上还想读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大体而言，这无论如何将是一个很美好的假期。<sup>①</sup>

事实上，迪特里希的学习生活几乎只有神学研究，外加一些文化活动和运动，还有几天和同学一起漫游森林，“为了让我符合姐妹们的审美标准，要多跑步使自己变瘦，因为长时间坐在书桌前，真的会让人变得肥胖”<sup>②</sup>。

除此之外，就是发展自我的生活风格，接受家庭外的新关系，讨论政治问题、文化议题及从事社会实验。但是很奇怪，这些事并没有触及他的内心。当时，柏林聚集着许多尝试新路子的人，他们寻找各种新的可能性，并尝试新的生活方式，连朋霍费尔家也很难不感受到时间和风俗都变了。莎宾娜嫁给了出身犹太家庭的男友格哈德·莱布贺兹（Gerhald Leibholz），她父母对此

<sup>①</sup> 《1924年8月5日书信》，摘自朋霍费尔《年轻时期和大学学习》第141页。

<sup>②</sup> 《1924年8月5日书信》，摘自朋霍费尔《年轻时期和大学学习》第142页。

毫无保留的接受，使那些保守的亲戚着实吓得不轻。莎宾娜补充说：“即使他们不接受，我也已经怀了莱布贺兹的孩子，父母拿我一点办法也没有。”

母亲最小的弟弟贝尼迪克特（Benedikt）在慕尼黑，与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女画家住在一起。“他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进入房间时，父母停止谈话的原因。”<sup>①</sup> 苏珊娜这么说。爱冒险的小妹苏珊娜曾拖着兄长去参加派对，在那里，人们铺着垫子坐在地板上，抽着香烟，聊着上帝与世界。但是，迪特里希觉得家里的宴会比较舒服，宴会前仆人会先捆扎花束，并在舞会开始前献给女士们。

“他是一个很好的舞伴和出色的聊天对象”，亲戚朋友异口同声地说。有时他会突然在纷乱中退回自己的房间而不再出现。很多人被他吸引而想与他做朋友，但这位亲切的迪特里希不会让人太接近他。除了家人以外，他不与任何人用 du<sup>②</sup> 相称。他没有走得很近的朋友，当然也没有女朋友。

后来有一次，他才隐隐约约写出了他在沮丧和孤单时所受的苦。但是公开透露痛苦和沮丧，在朋霍费尔家被认为是不适当的，所以迪特里希必须独自对付自己的沉重忧郁，并以全身心投入工作中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sup>①</sup> 《苏珊娜·德雷斯的回忆录》。

<sup>②</sup> 只用于亲密朋友的称呼。——译者





对他而言，在那几年间还有另一个机会，使他可以克服距离感并且允许他人接近，即使是通过介绍的方式。他开始带领儿童主日学校团体和青年团契，而且很有成就，孩子们总是团团围住他。当他在学习结束要离开柏林转到巴塞罗纳当助理牧师时，他在日记上这么写道：“最近离开教会职务的告别式让我感到很愉快……莫伊曼（Meumann）牧师在一般性祷告中提到我。对我而言，团契祷告一直是一件令我发寒战栗的事，但是当那群孩子——我在他们当中待了两年之久——为我走进来的时候，一切变得无与伦比的美好。”<sup>①</sup>

对一个喜欢与人保持距离且很少表达感情的人而言，这是多么不平常的语调。“圣徒的团契”是否也是让迪特里希暂时不感到孤独的地方？

无论如何，他决定在大学结业之余，还要额外参加教会的国家考试。也就是除了平常的报告外，他还要准备一个国家考试的讲道。他的讲道不易受到青睐。迪特里希终其一生都深受讲道之苦，因为他希望对每一句话负责。最后，他的证书上写着：“作者必定是一个追随强烈渴望的人，他精通他的题材，接受推荐，并勤于研读大师的讲道，如狄扬达（Dryander）、康拉德（Conrad）和阿尔特豪斯（Althaus）等人的讲道，并提防自己陷于被强迫或被寻找的思路当中，其拟文取最重要

<sup>①</sup> 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126页。

者，并以简洁高尚的纯真笔调润饰……”<sup>①</sup>

他父亲把证书寄到巴塞罗纳给他之后，这位不可知论的老者终于忍不住发表了下列傲慢的评论：“我们对红衣主教评鉴的基本内容感到高兴。但要学会教会官方式的语调，你还有很多实证性的讲道要读。这跟我当初的情形不大相同，那时韦尼克（Wernicke）对我说：拜托！请您千万不要阅读精神病学的文学作品，那种东西只会让人变笨！”<sup>②</sup>

<sup>①</sup> 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122页。

<sup>②</sup> 《1928年3月13日书信》，摘自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





## 第六章

## 大地仍是我们的母亲

1928 — 1930

1928年初，迪特里希从巴塞罗纳寄了一张卡片，卡片上是一个骄傲的西班牙斗牛士，正与一只同样骄傲的公牛决斗，只是那名斗牛士看起来非常像德国人。那是迪特里希站在一座立墙后面照的相片，并有题签：“胜利者的祝福！”就像典型的西班牙游客一样。同时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实际上我不能说被这个东西吓坏了，就像许多人认为这有愧于中世纪欧洲的文明一样……但从整体来说，从人群中发泄出的巨大热情，在斗牛场里任何人都会感受到……眼前就是那无可限制的热情生命的残余。”<sup>①</sup>

<sup>①</sup> 《1928年4月11日书信》，摘自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136页。



22岁的朋霍费尔

迪特里希介绍给了巴塞罗纳的德国教会团体认识。

1928年2月15日，他抵达那里，并且在两个贫穷的德国女士那里租了一个房间。“迪特里希在那里安顿得很好，虽然所有东西都原始地可怕。厕所是唯一可以盥洗的地方，除了不会摇晃以外，看起来与火车厕所没有多大差别。”<sup>①</sup> 克劳斯于复活节前去拜访弟弟，回家后就就是这么形容的。

<sup>①</sup> 《1928年4月11日书信》，摘自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132页。





西班牙在宣告成立共和国前3年及内战爆发之前5年，仍是一个半处在中古世纪的国家。封建主义在社会和文化上都不受到压抑，天主教会依然很明显地是旧秩序的护卫者，迪特里希甚至注意到：“在这里，愚民政策的愚蠢口号，的确曾通过宗教而产生力量。”<sup>①</sup>

巴塞罗纳是以前亲法的省份卡塔拉尼亚（Katalanien）的首府，在这种背景下，它几乎是一个西欧化的大都会。在那里的德国教会团体，大部分是由商人和他们的家人组成，他们对“教会、体育活动、德意志民族”抱着相同的正面态度。当中的一位牧师曾说：“享受一杯好葡萄酒和抽一支好香烟，远胜于一次不精彩的讲道。”<sup>②</sup>

一个不可避免的实习震荡，正等待着迪特里希。这里的团契工作很少涉及神学讨论和教会生活，而是办社交活动以满足宗教需求，这些正是当时为巴特的门徒所大加声讨的。

这位实习的助理牧师尝试修正一下那里的风格，他开始从儿童主日学校着手，并举行团契演讲。但是那里的团契当然不是如他在《圣徒的团契》里所想象的样子。虽然他的工作没有获得很好的反应，但是迪特里希

<sup>①</sup> 《1928年4月11日书信》，摘自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134页。

<sup>②</sup> 《1928年4月11日书信》，摘自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139页。

还算有些收获，这得益于他在成年之后，仍未失去对人们及他们的故事感兴趣的天性，以及他对新事物和其他世界不持成见的开放态度。他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在他独特、友善、冷漠的自我保护下，他涉入团契成员的生命故事里，并且倾听所有向“德国救助协会”寻求帮助之人的心声。“游历世界的人、流浪汉、逃犯、外籍军团成员、在西班牙巡回演出的驯兽师、在本地杂耍剧院的德国舞娘、被追踪的德国政治谋杀犯——这些人会向迪特里希详尽地报告生命中发生的故事。”<sup>①</sup>

此外，这一切也将他从辩证神学的天堂重新带回人间。在一个团契演讲中，他说：“想要离开这个世界的人，想要从当前困难中逃离的人和失去力量的人，这些人会通过永恒、神秘的力量得到支持。这个世界仍是我们的母亲，就像神仍是我们的父亲一样……”<sup>②</sup>

但是，这种对尘世的回顾思索也有其难处。迪特里希的大半时间都在思考教会的问题，对于政治及社会伦理很少关心。因此，在《一个基督教伦理的基本问题》演讲里，他仍持有一个还很路德教派式的观点：这个世界有自己的法则，该法则是教会必须注意的，即使它们与福音不相匹配。对此，人们以马丁·路德为依据。中

<sup>①</sup> 《1928年7月7日书信》，摘自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141页。

<sup>②</sup> 艾伯哈特·贝特格、蕾娜特·贝特格、克里斯蒂安·格雷默斯编：《朋霍费尔》，第68页。







世纪时，他在教义里提出了两个国度和两个统治的观点，并反对教会和国家的权力混在一起。世界的权力——法律、政治、经济——不可为了教会的利益被误用，而教会的权力——讲道、团契、圣礼——也不可以被误用来在世界图利。这在当时是很先进的见解，因为它包含了信仰和良心自由，以及让俗世政权归于俗世的要求。路德的精辟教义表现在德国教会的实践上，简单地说就是：教会该做的是宣扬福音，不要搅进政治事务中。

这个广被接纳的观点，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个结果：不要去触碰所谓世界本身的自我规律性。例如，强势者在政治及经济上拥有权力，或认为战争虽是罪恶却无法避免。迪特里希当时也是持这种看法，不过他后来有了完全不同的见解。如果那时巴特听了这场演讲，大概会气得咬牙切齿。因为巴特虽然也拒绝教会与国家的混杂，但他得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结论。他认为：如果神想要建立的“不是宗教史，而是成为我们生命的主”<sup>①</sup>，那么就没有一个生命被排除在这个统治权之外，连政治也是如此。然而，基督的统治权却不用在政治的权力工具上，而应是作为人类统治权的批判性元素。

迪特里希在那时还无法像卡尔·巴特一样想得这么远。这可能是因为他的兴趣一直与个人的权责有关，也

① 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107页。

就是限于自己的信仰及自我认同范围内。

1929年2月17日，迪特里希又回到柏林。对于大学教师资格鉴定题目，他已经胸有成竹，他的题目是：“行动与存有——系统神学内的先验哲学与本体论”。

一年之后，他向神学院提交的论文，还是牵涉到同样的问题，那个“完全不一样”且无法接近的神，如何在信仰里被捕捉，并且被纳入人类的历史中？“神并非因人类而自由，乃是为人类而自由。基督就是神的自由的代名词。‘神的存在’意味着的并非在一种永恒的不具体里面，而是……可以拥有、可以理解的，存在于教会里他的话语中。”<sup>①</sup> 迪特里希在这里坚持的，还是一个具体的教会——虽然他与教会之间的关系，一直都维持着相当的距离。

他刚到柏林就开始筹划，利用大学教师资格鉴定，免去助理牧师必须参加的大教堂教牧人员进修会。在那之前他已提醒母亲：“在那里，人似乎会被扭曲，不把大门钥匙交给他们，不让他们参加其他的讨论课，好像他们自己就可以提供智能……”<sup>②</sup> 教区牧师迪斯特在这里又帮了一个大忙，他很清楚，如果把迪特里希塞进那个既狭隘又乌烟瘴气的教会，他将损失一个最好的牧师。所以，迪特里希可以再次不被打扰地在自己所出身的环

① 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169页。

② 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155页。





境里活动。

当然，后来他也觉得这样并不好。事实上，他又再度不顾一切地埋进他的神学与神学自觉里。并非偶然地，他发现自己很少研读当代文学作品，比如格奥尔格斯·贝尔纳诺斯（Georges Bernanos）的短篇小说。《恶魔的天空下》及《背叛者》，都是描述教士及圣徒陷在宗教的自傲和绝望的怀疑里而筋疲力尽的故事，这对迪特里希而言并不陌生。他的神学认知指出：对神的认识并不是人的功劳，而是神的恩典。这与他那年轻学者的骄傲、能力和虚荣心相冲突。

他曾这样描写过这一段时间：“我整个人用一种非常不基督化且不谦虚的方式全力投入工作。那是一种疯狂的虚荣心，我自己也注意到，这使生活变得非常沉重，并且夺走了周遭朋友的爱和信任。那时，我是很可怕地孤独一人，并且放任自己如此下去……我知道，那时我从耶稣基督的事上得了很多好处，也使我无可救药地羡慕虚荣……”<sup>①</sup> 同样的批判也表达在他对当时政治发展的“漠不关心”上，并且在回顾过去时感到当时“真是荒唐”<sup>②</sup>。

1929年的政治事件，显然没有引起迪特里希的注

<sup>①</sup> 《1936年1月27日书信》，摘自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248、249页。

<sup>②</sup> 《1932年12月25日书信》，摘自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162页。

意。纽约股市的崩盘引起的世界经济危机，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就像他在柏林也没有注意到纳粹党（NSDAP）指派帝国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上任。他并不是很热衷于政治，既不属于右派，也不偏向左派。虽然如此，迪特里希也不是对政治完全不了解的人，在比较私人的场合，他也会表达他在政治上的好恶。他结交的第一个好友是弗兰茨·希尔德布兰特（Franz Hildebrandt），这位神学学生在“雅利安条款”（Arierparagraph）下，因“半个犹太人”（Halbjude）的身份在教会里牺牲。人们现在很难想象，当某人与政治有关时，这种友谊关系在1933年意味着什么。然而，想法保守的迪特里希却越来越脱离右派的圈子，他也曾表态性地参加了由牧师君特·德恩（Gunter Dehn）在莫阿比特（Moabit）所带领的主日崇拜，正是这个人，因为其和平主义和宗教的社会主义的主张而被整个右派联盟敌视。

到底在政治和教会里要扮演什么角色，他自己并不清楚。他再一次感到失去了目标和方向——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这个问题用学术反省（即现实的另一边）是无法解决的。

1930年7月31日，迪特里希在柏林大学首次讲课。他现在是最年轻的编制外神学讲师，只有24岁。在第二次国家考试时只给他“相当好”（rechtgut）的评价的





教会认为，让他接受牧师的就职仪式实在太早了。25岁是法定上最小的年龄，在国家机构里没有例外！

对迪特里希而言，得到纽约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的奖学金，是一个真正的祝福。就像几年前在罗马一样，借着与不同的世界和教会的接触，他得到决定性冲击的机会。

## 第七章

# 谁还想无知自在地进入应许之地？

1930 — 1931

1930年9月5日，迪特里希乘船到美国去。“我的船舱坐落在船腹深处……我尽可能地享受这趟航行。”<sup>①</sup>他在写给祖母的信上这样描述道。他祖母常常赞助他旅行津贴。

就像所有初来乍到的人一样，迪特里希对美国的第一印象就是曼哈顿林立的高楼大厦。当他看过摩天大楼和水泥丛林之后，第二个惊讶迎面而来。协和神学院是一座英国哥特式风格的建筑，而旁边就是哈莱姆（Harlem）黑人社区。

协和神学院到今天还很受人敬重，那里的气氛显得

<sup>①</sup> 《1930年9月6日书信》，摘自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183页。





十分轻松。社会伦理学教授房间的门一直是开着的，学生在那里进进出出，咖啡由雷利·拉施姆森（Larry Rasmussen）教授亲自为访客调煮，这一直是协和的风格。雷利·拉施姆森教授是接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教授职位的人。迪特里希现在是尼布尔最有名的“学生”，他首先必须适应那些开放的门，而且不只是这样。

在协和神学院，中午的主日崇拜由不同国家的学生带领。解放神学在协和神学院继续维持“社会福音”（social gospel）的传统。很明显，福音有其社会的形象，不只是在教会本身，而且也在政治和社会的实践里。“迪特里希·朋霍费尔那时认为这并不是真正的神学，但是他却已经把社会福音的神学悟出来了。”<sup>①</sup>拉施姆森教授这么说。

事实上，迪特里希刚开始在纽约学习时曾写道：“这里根本没有神学！”<sup>②</sup>当时他正投入于高傲的学院式神学。在学年结束时，他却从扫罗变成了保罗。“我从今日社会福音的代表中所得到的印象，将会对我有长远的决定性的影响。”<sup>③</sup>

① 1989年3月29日，作者访谈雷利·拉施姆森教授。

② 艾伯哈特·贝特格、蕾娜特·贝特格、克里斯蒂安·格雷默斯编：《朋霍费尔》，第74页。

③ 艾伯哈特·贝特格、蕾娜特·贝特格、克里斯蒂安·格雷默斯编：《朋霍费尔》，第74页。

这当中发生了什么事呢？在美国，迪特里希第一次从市民教育的玻璃罩中走了出来，在这里，他遇见了许多能体现社会和政治理念的基督徒。

刚开始，他对美国的印象的确很矛盾。在美国，并没有统一的全民教会，而有着无数自由的个别教派，它们不倚赖国家，只靠成员自由捐献维持财务。迪特里希被介绍参与这类团体，并且在那里必须以一个德国人的观点来谈论有关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他发现，美国的白人中产阶级，通过他们的意识和钱包改革自己的教会。美国社会里严厉的种族隔离更使他惊讶，但这种情形却被广大的白人教会毫无批判地接受了。他的兄长卡尔—弗里德里克在结束哈佛的聘任协商和客座演讲后，曾写信给迪特里希谈论“黑人问题”，他写道：“对这件事我的印象是，对于有良心的人而言，它的确是一个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使我不愿意完全接纳哈佛的教席而移民美国。因为我既不会接受这种遗产，也不想把它传给我的孩子……我们的犹太问题与此相比，像是个小事。在这里，只有少数犹太人感到被压迫，至少比不上在法兰克福！”<sup>①</sup>

在协和神学院，人们同意迪特里希的批判。同学保罗·雷曼（Paul Lehmann）及其太太玛丽昂（Marion）

① 《1931年1月27日书信》，摘自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187页。





带迪特里希见识了另一个美国，他们和迪特里希保持了稳定的友谊。那些处在下层和经济萧条中的贫穷教会，总是在政治和社会活动中，用“给穷人的福音”这样一个非理论而直接的描述，将《圣经》与现实连接在一起。这种现象多少在后来的民权运动里再度出现，它的开端起源于消除种族隔离。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推荐学生阅读美国黑人文学，迪特里希对这些读物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他也在德国教育学生和同事认识美国黑人文学和音乐。

首先，他结识一个来自哈莱姆区的黑人同学法兰克·费希尔（Frank Fisher），这种友谊在当时的协和神学院并不普遍。通过他，迪特里希更进一步地认识了黑人社区。那个在贫民区的商店，到今天还是主日崇拜的地方，同时也是一个社区中心。之后不久，他每个星期天都待在第138街的阿贝西尼恩浸礼教会（Abessynian Baptist Church）。他说：“我在黑人教会听到福音的传讲。”<sup>①</sup>

人们在哈莱姆或南布隆克斯（South Bronx），比在华尔街（Wall Street）和华尔道夫大饭店（Waldorf Astoria），更容易明白解放和拯救的福音。放眼看去，那些处在垃圾和毒品之间，排除在冰冷华丽的银行与商业中心之外，努力在失业、疾病和犯罪中求生存的人，他

<sup>①</sup> 艾伯哈特·贝特格、蕾娜特·贝特格、克里斯蒂安·格雷默斯编：《朋霍费尔》，第76页。

们听到解放奴隶的感觉，当然与住在第五大道上的人不一样。当布隆克斯圣彼得教堂的复活节主日崇拜在庆祝耶稣复活的同时，人们不只是祈求个人的得救，也祈求那置人于死地的社会结构能被消灭。

在哈莱姆的教会，迪特里希才明白，原来脑海中的“圣徒的团契”是如此的局限在自己的阶级之内。而他也预料到，这个具有社会爆炸力的福音对市民的虔诚提出的质疑，与辩证神学的提问完全不同。对此，虽然迪特里希不是宗教社会主义者，也不会变成解放神学者。但是对他而言，一个新的研究开始了，对此，他后来有一次略有提及：“首先我会寻求《圣经》的解释……我曾常常祷告，我曾在教会看得很多、谈论很多，也写了很多这方面的东西，但我仍然没有变成基督徒，我仍是非常野蛮和不被驯服的……即使在所有孤寂来袭时，我还是那么自满骄傲。《圣经》把我从这些情绪中解放出来，尤其是耶稣在山上对门徒的教训……”<sup>①</sup>

这次感受不只发生在迪特里希的头脑里。如同当时在罗马一样，纽约的气氛也帮助这个脑袋里塞了很多东西的25岁年轻人，得到了个人的突破。

在黑人团契的主日崇拜里，所有人不分阶级地在一起唱歌、祷告、呼喊、哭泣、欢笑，然后又一起歌唱，

<sup>①</sup> 《1936年1月27日书信》，摘自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249页。





迪特里希小时候的“红色诗歌”突然间又出现了。信仰在这里不只有社会的方面，而且还有感情和肉体的方面。对迪特里希这种受教要控制自己感情和肉体的人而言，那样的方式让他既觉得释放同时又感到迷惘。无论如何，他恳求朋友保罗·雷曼不要跟任何人透露他曾说过的话：连平常想去一些没去过的地方郊游，都不是去纽约的名胜风景区，而是去参加有“红色诗歌”的祷告或唱诗聚会。

迪特里希·朋霍费尔后来的政治神学还有第二个根基，也起源于那时。

在协和神学院，迪特里希的课程里还有另一个参加者，叫让·拉谢勒（Jean Lasserre），他是一个来自法国的年轻牧师。迪特里希将那种祖国思想中的德国市民阶级的反法仇恨，全部投射在让身上，却一无所获。因为让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一点都没有“光荣祖国”的思想。他说：“一个人无法同时是基督徒和国家主义者……我们所信仰的难道不是神圣和普世的教会吗？或者我们信仰的是法国的永恒使命？”<sup>①</sup>

这对迪特里希而言实在难以忍受。对他如此重要的圣徒团契，竟然也包括有法国人！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他还无法适应过来。到目前为止，和平主义对他来

<sup>①</sup> 让·拉谢勒撰：《战争与福音》，摘自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191页。

说还很遥远，但现在他却从“世仇”中领悟到和平主义，而且在神学理论上有很好的根据——登山宝训。

登山宝训教导“带来和平的人有福了”及“要爱仇敌”，迪特里希当然也知道，这是出自《马可福音》。可是丝毫不主张和平主义的德国新教教会，历代的神学家都忙于削弱登山宝训的教导。他们的看法是：登山宝训指示的并不是世界的重组，而是暗示出要拯救世界的贫困，只有通过神，这正如教会在福音里所宣告的。这刚好完全符合在此所提到的与世界的固有规律性脱离——福音是为个人的拯救而存在的，而这也是迪特里希当时的想法。让·拉谢勒却让这些意义都失效了；他坚持，要成为一个基督徒相当简单，那就是听从耶稣的戒律，并且跨越所有限制，在基督徒的团契里确实实行起来。

迪特里希深受此想法的影响，这可以从一封信中看出，这封信是他几年以后写给他哥哥的。“我相信，只有当我知道应真正开始严肃实行登山宝训的指示时，我的内心才真正变得清楚和坦率……的确，有一种东西值得我们为它拒绝与任何事物妥协。我觉得所谓的和平与社会正义，或者说基督信仰，应该就是这个东西。”<sup>①</sup>

当后来他的国家洗劫世界、为世界蒙上战争的阴影时，迪特里希是少数仍坚持不妥协的人。

<sup>①</sup> 迪特里希·朋霍费尔：《文集汇编Ⅲ》，慕尼黑，1958—1974年，第24—25页。





刚开始他还保持着来美国前既有的“好德国人”形象，即看起来颇符合一般人对典型德国人的想象，而且在某些时候他的确是这样的人。保罗·雷曼后来这么描述道，特别是当他在追求某个东西时，一定要把所有事情做得尽善尽美。他有一种贵族的气质，却没有丝毫骄纵的气息。让·拉谢勒清楚地记得他们怎么开始友谊的——当德国反战片《西线无战事》在美国上映时。当时美国观众的反应非但与政治无关，反而还深受感动，他们甚至还认同旧时敌人的看法：当法国军人被杀时，人们会欢呼和鼓掌。迪特里希非常惊愕，他在这件事背后所能提供的安慰和友谊竟是这么少，当然让也不是不带目的地邀他去看这部电影。

在学习结束时，这两个好友开着一部老爷车，穿过美国往墨西哥的内地开去。在这一时期的一个圣诞节时，迪特里希同他的第四个纽约朋友瑞士人埃尔温·苏茨（Erwin Sutz）一起在古巴的德国教会里。在那里他作了一篇关于摩西的讲道：摩西看到“应许之地”，但是自己不得进入。“成群的失业者在我们眼前，世界上有百万儿童处于不幸中，在中国有受饥饿之苦的人们，在印度及我们不幸的国家里有受压迫的人们……还有谁能无知、自在地进入那应许之地——当他想到这些时？”<sup>①</sup>

<sup>①</sup> 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克·朋霍费尔》，第188页。

迪特里希将带着这个问题和新的政治意识回到家乡。1931年6月他回到柏林，在那里，系统神学系的助教席位，以及科技大学的学生牧师职位正在等着他。

在1930年9月的国会选举中，纳粹党的席位从12席提高到107席，然而却没有人提到该怎样结束威玛共和国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克劳斯在美国写给弟弟的信上说：“人们迷上了法西斯主义。我担心，如果这一股极端的浪潮袭击受教育的人、诗人和思想家，那么这群人就糟了。”<sup>①</sup>

<sup>①</sup> 《1930年11月3日书信》，摘自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克·朋霍费尔》第206页。





## 第八章

## 教会当尽世上的责任

1931 — 1932

在1932年夏季学期，迪特里希·朋霍费尔开了一堂有关“教会本质”的课。当时还没有多少学生参加这个不出名的年轻的编外讲师的课。

“首先他指明，现在的人常问：我们到底还需不需要神？但是这样的提问是错误的。我们应该问自己：我们是否想被需要？因为神需要我们。一开始吸引我对这个人感兴趣的，是他看待事物的态度，以及如何将事物‘反过来’看。”沃尔夫·迪特·齐默尔曼（Walf-Dieter Zimmermann）回忆说。他也是战后受朋霍费尔神学影响的教会领袖之一。“在讲台上的朋霍费尔表现得非常专注，完全没有热情，几乎不动感情，但思路清晰，有一点理性的冷漠感——就像新闻记者一样。”迪特里希准时开始上课，注重纪律，只有一次让他的学生等候

了。当他在迟到20分钟后准备开始讲课时，他简短地说：“我有一个‘小伙子’生命垂危，我想再和他说一些话，这是不得已的。”<sup>①</sup>

从那时起，大部分学生都知道迪特里希的“小伙子”是哪些人。秋天时，他接受了上级教会机关的指示，带领一班在普伦茨劳山工人区里要受坚信礼的野孩子。

“那大概是柏林社会及政治情况最糟的地区。刚开始，那些年轻人的举动有如疯狂……”但是，迪特里希知道如何与孩子相处。他让那些孩子先喧闹几分钟，然后开始轻声述说哈莱姆区的故事。当气氛变得很安静时，他就准备结束，然后承诺下一次讲另一个故事。迪特里希给他们讲《圣经》故事，而且相当精彩。“现在他们变得非常安静，这些年轻人会关心这些事……对他们而言，这些东西完全是新的。原来除了《教义问答手册》的学习之外，还有别的东西。我用团契的构想来安排整个课程……”<sup>②</sup>

迪特里希的“新团契”打破了资产阶级教会的社会界限。他第一次搬出葛林瓦德别墅区，向一个面包师傅租了房子，位于亚历山大广场北边奥德贝尔格街61号。

<sup>①</sup> 沃尔夫·迪特·齐默尔曼编：《与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相遇》，慕尼黑，1964年，第46页。

<sup>②</sup> 《1931年12月25日和1932年2月26日书信》，摘自《文集汇编I》第25页。







朋霍费尔（最前者）在哈茨与坚信礼班的孩子在一起，1932年那些坚信礼班的孩子可以无预约地去拜访他。他们学习下国际象棋和英语。迪特里希同他们一起去郊游，并且以足球员的模样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那时看起来很像运动员，而不像牧师或学者。人们回忆起，在坚信礼之前，他同他的“小伙子”们一起剪裁所需要的布料，同时一起准备崇拜。

迪特里希在这里想要尝试的，正是后来他所设想的“非宗教的基督信仰”的初步阶段，因为他并不想把那些远离教会的孩子哄回教会，而是以一种非教会化、非宗教化的方式，与他们一同成为教会成员。这样的教会已经不再具有过去那种固定的宗教形式，而是散布在各地，只要有人彼此团结一致地生活在一起，那就是教

会。

在坚信礼的讲道中他这样说：“没有人可以拿走你们的信仰，上帝也为你们准备了白昼、太阳和早晨的曙光（可以想见，那时迪特里希知道普伦茨劳人的歌：《迎向太阳，迎向自由的弟兄》及《面对早晨的曙光，战友们》），而且他希望让我们看见受称颂的国度，那里充满正义、和平与自由，因为基督掌管那里……”<sup>①</sup>

坚信礼的那个星期天是1932年2月13日，那一天刚好是德国总统选举的日子。49%的人支持兴登堡（Hindenburg），30%的人支持希特勒（Hitler），而13%的人支持德国共产党（KPD）的台尔曼（Thalman）。资产阶级的党派和社会民主党皆支持兴登堡，因为他们认为他是最有可能反抗极右派成功的折中候选人。但极“左”派的人警告说：“选择兴登堡就是选择希特勒，选择希特勒的人就是选择战争！”迪特里希坚信礼班学生的父母都选择了台尔曼，他自己却完全不考虑德国共产党的候选人。共产主义对他而言，不是另外一条可行之道，即使在这个选举期间，他头一次体会到社会主义的理想，并且有一定的好感。

在那段时间里，其他一些来自“良好家庭”的年轻人也都像他一样，对左派运动不知该肯定还是否定。资本主义的黑暗面在1932年已显而易见，也与人道主义

<sup>①</sup> 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275页。





理想背道而驰。人们该怎样看待这样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呢？面对德国 600 万的失业者、无数忍饥受冻的人群，谁可以为了哄抬物价，而将咖啡倾入海里，或将谷物焚烧？

当报纸报道这些事件时，布雷希特与汉斯·艾斯勒（Hanns Eisler）写下《抛掷袋子者的叙事诗》；恩斯特·布许（Ernst Busch）这位“街坊的卡罗素<sup>①</sup>”——唱红了这样的名句：“他们把小麦丢进火里，他们把咖啡抛进海里，那些抛掷袋子的人何时会偷偷丢下肥胖的土匪呢？”

这种激进的论调不适合迪特里希，“柏林东区社会工作联盟”比较适合他。设立者是基督教和解联盟（Versöhnungsbund）的创立者西格蒙·舒尔茨（Sieg-mund Schultze）。他们的典范是美国的“和解运动”（Settlement Bewegung）：愿意承担义务的年轻人，在社会的重点区设立小分部，以便和当地人一起生活和工作。在这个原则下，秋天时，“夏洛藤堡青少年之家”（Charlottenburger Jugendstube）成立了，参加的苏珊娜·朋霍费尔的朋友，安内莉泽·施努曼（Anneliese Schnurmann），她基本上负担了整个财务，另外还有迪特里希和他几个学生。青少年之家的任务是把街上没有

<sup>①</sup> 卡罗素（Enrico Caruso，1873—1921年），19世纪末20世纪初意大利最负盛名的歌剧界高音歌唱家，他的名字几乎是同时代歌剧的代名词。——编者

工作的青少年带回来，给他们一个空间可以聚会、聊天和学习。这个计划不完全由教会协助，而是由基督徒、犹太人及社会主义者一起工作、讨论和庆祝——只要他们有时间。

青少年之家设立半年后面临关闭，因为纳粹冲锋队（SA）的巡逻队渗透到街上。安内莉泽·施努曼是犹太人，她必须离开德国。那些信仰共产主义的青少年，则暂时隐藏在城市边缘的一个棚屋里，这是迪特里希的父母以前“捐给”青少年的，迪特里希尝试全力帮助这些被迫害的朋友。

这种实务经验对迪特里希的学术论文产生了影响，这是不足为奇的。他在大学里并不是典型人物，因为大部分的神学教授都持有德意志国家主义思想，多数学生——包括神学学生——都会穿着学校的制服或节日的礼服、带着旗帜出现在大学主日崇拜里。“我的神学出身在这里渐渐受到怀疑，而且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好像自己在胸中养大了一条蛇。”<sup>①</sup> 迪特里希在写给埃尔温·苏茨（Erwin Sutz）的信中提到。他很快就被当做社会主义者及和平主义者，连他的学术性举动也使人感到奇怪。

这位讲师实验一些新奇的且不为人熟悉的“社会实习”形式。他与学生一同骑车到乡下，并邀请他们参加

<sup>①</sup> 《1931年12月25日书信》，摘自《文集汇编I》第24页。





“开放的晚会”——一个朋霍费尔圈子在这里形成。他不只讲神学，也讲美国的种族冲突，以及筹备下一个青少年之家的计划。显然，对迪特里希而言，那些针对基督信仰、实践和联盟的问题，比他的学术事业更为重要。他不想回到纯学术的象牙塔里，而且他寻找可以合作并能理论联系实际的人。他的圈子里约有三分之一是女学生，在那个只有30%的神学学生是女性的时代里，这具有特别的意义。那些女生很有可能要向学习和生活作特别的妥协，她们是否可以让男同学和讲师了解：男人也可以有好厨艺，就像女人也可以从事神学？<sup>①</sup>

尽管如此，迪特里希还是很难改变原来的他。他给学生的感觉是“既近又远，既骄傲疏离又坦率开放”。他理所当然地再度成为了“领导”。他知道这有多么危险，但他也知道他很喜欢为自己建立一个当“明星”的圈子。“罪恶的灵将人从神的灵和最亲近的人身边夺去，现在这个灵不断地绕着自己盘旋。现在他是世界的王，但这只是指向自我中心的世界，并且他在那个封闭自我且暴力的世界里臆造了一个王。他视周遭的人如凡物，并把上帝看做满足宗教需求的对象。”<sup>①</sup>迪特里希在讲课时这么说。对他来说，绝对的顺服基督乃是对自恋的不断挑战，并从自我中心的世界里解放出来。

<sup>①</sup> 《1930年7月31日大学讲课》，摘自格雷默斯、普法伊弗尔《神学与传记》第43页。

无论如何，这个想法现在也带有政治意味。很久以来，迪特里希就不再停留在“寻找自我认同”的问题上。当1932年新成立的政府宣布将以基督的世界观拯救德国时，他说道：“‘奉神之名，阿门’，这是不是又意味着宗教将再度被重视……相信我们真的会被‘奉神之名，阿门’吸引住吗？我们的行为会被这个名称影响吗？我们会借由‘奉神之名，阿门’而不分贫富、国籍联合在一起吗？或者隐藏在这个宗教趋势背后的，正是我们难以驾驭的独裁欲望——以神之名做我们想做的事，以基督的世界观之名，利用并煽动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相争斗，然后从中牟利？”<sup>①</sup>

一年之前，教会友好世界联盟<sup>②</sup>的年会在剑桥举行。迪特里希以德国青少年代表团的会员身份参加了会议，并且是三名被选为欧洲青少年书记中的一名。

1931年9月1日会议开幕当天，在所有德国右派的报纸杂志首页，出现了两个著名的德国神学教授所发表的声明。一个是保罗·阿尔陶斯（Paul Althaus），另一个是伊曼纽尔·赫希（Emmanuel Hirsch），标题叫做“福音教会和民族谅解”。“德国在世界大战中的仇敌，假借和平的外衣，继续制造与德意志民族的战争……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认为，德国与战胜国之间不可能有

<sup>①</sup> 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283页。

<sup>②</sup> 即普世教会协会的前身。——译者





任何达成谅解的办法，除了向战胜国表明在他们与我们持续对立的战争期间谅解是不可能的而外……”<sup>①</sup>

这些句子强烈复述着德国福音教会的声音，德国福音教会的代表还指责世界联盟是国际主义者及和平主义者。迪特里希在世界联盟里很快就加入了“实践基督信仰的建议”（生活与工作）的工作行列，但这更加深了他作为政治和教会的“圈外人”的名声。

单纯的和平幸福离他相当遥远。他在普世会议发表的演说中，完全不否定实际上存在的冲突，他同时指



朋霍费尔（二排右二）和他的学生，1932年

① 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238页。

明：这个冲突必须由基督徒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因为他们在基督里是一个团体。之前他提出的“基督以团契的方式存在”又重新被具体说明：“任何战役及战争准备，都是基督徒不允许的……爱绝对不可能拿剑对准一个基督徒，因为这样做，同时是在谋杀基督。”<sup>①</sup>

1932年，迪特里希又打破团契思想的界限。就像以前打破社会与教会之间的界限一样，现在他又打破了福音与政治之间的界限。“你们要努力尽一切该尽的责任！因为今天要决定很多事情：基督徒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向世界证明，我们不是爱做白日梦或踩在云端的人。对于世上的一切，我们不能放任自流，我们的信仰不是鸦片（让我们在不公义的世界里感到满足）。反之，正因为我们努力在尽世上所有的责任，我们才会目标更确切地坚持提出抗议。”<sup>②</sup>

① 格雷默斯、普法伊弗尔：《神学与传记》，第43页。

② 朋霍费尔：《文集汇编IV》，第70、71页。





## 第九章 力阻狂轮

1933

1933年2月1日，迪特里希在广播中演讲“年轻一代的领袖与个人”。演讲内容早在希特勒执政前就写好了，而现在——那位“领袖”获胜之后两天，似乎是媒体播放的最佳时间。迪特里希——这个长期以来还无法放开已养成的权威和秩序思想的人——尝试重新解释权威的意义，并且对权威加以限制。在这篇演讲中，也可瞥见他对自己角色的理解：“团队是领袖的生产者。团队赋予他一切，包括权威……团队期待从他们而出的领袖能落实团体的理想，个人则知道自己有义务要完全服从领袖。”<sup>①</sup>

这些话听起来与希特勒在他1933年的畅销书《我

<sup>①</sup> 格雷默斯、普法伊弗尔：《神学与传记》，第47页。

的奋斗》里的论调很类似：“我们的运动的基本原则是：支持绝对的、负最高责任的领袖权威。”而且，不是很快地就有千百万德国人只要有机会就高喊：“领袖命令，我们遵循！”

迪特里希并不反对权威和服从，只要它们是用在好的事情上，以及使人“对于生活的秩序，对于父亲、老师、法官和国家等秩序，养成自我的责任感”；“所有人，特别是年轻人，当他们觉得自己还不够成熟、强壮、负责到他可以达成伴随这个权威的要求时，都会有将自己的权威交给领导者的需求。领导者必须知道他有责任对自己的权威划定清楚的界限。如果他对自己功能的了解与现实的限制不同，或者他没有一再给予跟随者有关他的任务的界限和责任；又如果他被跟随者迷惑，并想成为他们的偶像……这个领导者的形象就会沉沦，成为魅惑者。”<sup>①</sup>

迪特里希突然在这里描述了刚开始的群众激情，以及民众为逃避责任的领袖崇拜现象。因为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和月份里，不只是全国大部分人，甚至连全部的福音教会，都向这位元首点头哈腰了。

着手工作！年轻德国勇于更新！

<sup>①</sup> 《1932年12月25日书信》，摘自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47页。





德国，在患难与死亡的旷野中哀嚎。

领袖一喊，大家就欢呼：忠诚，更忠诚！

那一天就在我们面前了！上帝是我们的堡垒。<sup>①</sup>

莱茵区的牧师保罗·胡布尔格（Paul Humburg），以著名的纳粹国歌旋律写下了这样的诗。

在这种气氛下，迪特里希关于“领导者成为魅惑者”的字句，便带有强大的政治爆炸力，以至于他的演讲还没结束，就被广播电台切断——官方说法是因为超时。第二天，迪特里希愤怒地写了一份通知给所有朋友和同事，告诉他们：“转播突然在一个完全不恰当、会导致误解的地方被切断……这篇演讲文将发表在一个日报上。”<sup>②</sup>

那篇演讲还真是一字不删地发表在德国报纸上。不过这件事很快就过去了。

1933年2月27日，帝国国会大厦起火。在事发当地，一名显得非常惊慌失措的荷兰年轻人被捕，他是共产党的成员，这将被用来证明共产主义是阴谋集团。这种说法很快就失去了可信度，因为这场议会火灾实在太符合纳粹的心意。隔天，“保卫民族和国家”的“紧急条例”就出现了，里面是“合法规定个人自由的限制：

① 汉斯·普洛林侯伊尔：《简明政治教会史》，科隆，1984年，第56页。

② 艾伯哈特·贝特格、蕾娜特·贝特格、克里斯蒂安·格雷默斯编：《朋霍费尔》，第10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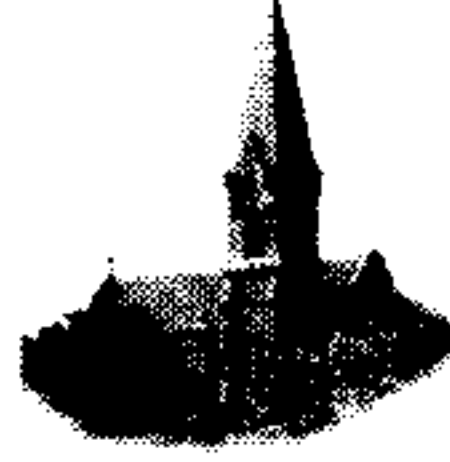
自由发言权的限制，包括新闻自由的限制，书信、邮件、电报和电话秘密的干预；住宅搜查及没收的规定；以及财产的限制，包括不在此被确定的限制范围”。这个条例维持了十二年，它成为刚刚起步的纳粹暴政的合法根据。

刚开始时，纳粹似乎只针对左派阵营的人。4000名共产主义干部被抓，其中很多在纳粹冲锋队的地下室被打死，或者在逃亡中被射杀身亡。

对福音教会而言，这却不是暴政，而是秩序的重建及在“重大危险中”得到拯救。在“宁愿成褐（纳粹主义），不愿成红（共产主义）”的口号下，他们赞成消灭工人运动，以及追缉那些过去一直是他们的眼中钉的人。“当国家以职权来对付破坏国家秩序基础的人，特别是那些用苛刻或粗野言词破坏婚姻、蔑视信仰和辱骂为祖国牺牲的人，就是以上帝之名行使职权！”<sup>①</sup>

这段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说这些话的人是柏林总教区牧师——后来的柏林主教奥托·迪贝利乌斯（Otto Dibelius）。1933年3月21日，他主持国会重新开幕的礼拜，被德国所有的电台转播，并且完全没有剪辑！他在那里大言不惭地为国家暴政辩护，还引用了一些神学根据来安慰所有福音教会的良知：“当事情涉及国家存亡时，国家的公权力就必须被彻底地和强有力地执行，

① 普洛林侯伊尔：《简明政治教会史》，第53页。





不管对外或对内。我们已经从马丁·路德博士那里学得‘忌讳’，若是国家在行使被交托的使命，就不可拦阻合法的国家公权力。即使国家公权力变得粗暴无情，也不可加以反对。”<sup>①</sup>

三个星期后，迪特里希在一个柏林的牧师圈里发表演讲。坐在那里的听众，大部分对国家如何“执行职权”根本不感兴趣。但他们是规规矩矩的路德会信徒，因此迪特里希首先小心翼翼地“教会与国家”的主题进入：教会没有权力将国家的力量占为己有；但是，当国家将基本人权置于法律之外时，教会也不可置身于政治之外。对此，迪特里希举了三种可能与国家对立的教会行为：“第一，向国家质询问题时，要针对其行为是否合乎法定的国家特质，也就是人民委负于国家的责任；第二，对于为国牺牲者绝对怀有责任，即使他们不属于基督徒团契，也要一视同仁；第三，不只与陷在轮下的牺牲者团结，而且还要力阻狂轮……”<sup>②</sup>

演讲到最后，迪特里希几乎是对着空无一人的礼堂。他要求教会必须准备好与政权相对立的论述，但这一要求伤害了听众所具有的德国新教的心灵。因为这样的观点，迪特里希在教会内是孤独的，唯一赞同他的是宗教社会主义者，而这些人本身也属于被迫害的群体。

① 普洛林侯伊尔：《简明政治教会史》，第53页。

② 《文集汇编Ⅱ》，第48页。

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是一位神学教授和宗教社会主义者，他在1932年写道：“一个新教教会若向纳粹主义敞开胸襟，而将社会主义抛掷于外，就会再度背叛她对世界的使命。‘上帝的国不在世界上’听起来似乎很顺服上帝，显示的却是……顺服获胜的政权及其魔力。”<sup>①</sup> 保罗·蒂利希也是第一个以“雅利安人”身份被解雇的教授，他于1933年流亡到美国。

他的“非雅利安人”同事在这期间，则广泛地因“公职人员重建法”而牺牲。这个1933年4月7日颁布的法令，是针对犹太籍和信仰共产主义的公务人员下达的即刻的职业禁令。迪特里希在演讲“面对犹太问题的教会”时，也曾提及这个禁令，当时他的听众是柏林的牧师。当剥夺和迫害犹太人的国家公权力开始行使后不久，迪特里希毫不犹豫地决定，要彻底拒绝和反对纳粹政权，因为这个新情势已危及他最亲近的亲友，特别是妹妹莎宾娜和她的丈夫（哥廷根大学的国家法教授），在1933年4月的夏季学期，他们开始受到困扰。莎宾娜记得：

双脚叉开，站得像典型的纳粹冲锋队的学生穿着制服，踩着他们的高统皮靴，挡在大学讲堂之前不让任何

① 艾伯哈特·罗姆、约格·梯尔费德编：《在十字架与卐字号之间的福音教会》，斯图加特，1983年第3版，第19页。





人进去。“莱布贺兹不可以讲课，他是犹太人。这节课取消。”于是学生们乖乖地回家去……在哥廷根很多人尝试随波逐流。无法继续高升的客座教授现在看到他们有了机会……感谢神，在这些教授中还是有正直的人。我特别记得神学家沃尔特·鲍尔（Walter Bauer）。在街道上遇到他时，他不会走到另一边——很多人都会这么做——而是走向我先生，然后大骂希特勒和纳粹。因为他耳朵不好，声音显得又洪亮又清楚，以致我担心地向左右投以“德国式的眼光”（眼光向后，超过肩膀）。还有那个老欧特曼（Ortmann），他是民法教授。当我先生丢掉工作时，他跑过来拜访我们，并说：“同事先生，我以当一个德国人为耻。”<sup>①</sup>

但是这些团结和礼貌的表示都是例外，连在福音教会里也一样。1933年4月1日，整个“帝国”的犹太商店全部都被封锁，犹太同胞也在马路当中被辱骂和虐待。一个来自莱茵区的助理牧师愤怒地表示，他的教会也对这件不公义的事鼓掌叫好。他的上司，莱茵区的总教区牧师史托藤霍夫（Stoltenhoff）回答他说：“对此我倒有所谅解。那些长年积压下来的合理怒气，来自于对控制着新闻、股市、戏院的犹太人的行为表现。现在大

<sup>①</sup> 莱布贺兹·朋霍费尔：《过去》，第19页。

大发泄一下很合理。”<sup>①</sup>

希特勒完全不用担心福音教会的人会反抗。福音教会完全支持“国家改革”。最明显的就是1932年成立的新团体，他们将基督教信仰与国家主义联结在一起，自称为“德国基督徒”，并且在他们的基本原则中为德国提出一个非常特殊、“合于种族需求”的基督信仰，具有“德国的路德精神和英雄般的虔诚”。这个基督信仰含有完全的纳粹意识形态，“德国基督徒”信仰运动的口号是：“打倒反宗教与反民族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同路人！”

1945年以后，知名的“德国基督徒”代表宣称，他们当初之所以这样做，乃是为了抗拒在纳粹运动中的异教徒信仰，以及为了不要错过向广大民众宣教的机会。只有用这种方式，教会才可能再度从远离教会的群众中赢得威望。

迪特里希对这种举动记忆犹新，在1944年他写道：“教会只有在为他人存在时，才是真正的教会……我们的教会特别必须面对亵渎神的罪恶力量和嫉妒，以及幻觉主义（Illusionismus）的崇拜。”<sup>②</sup>

他没有机会在战后目睹到：“德国基督徒”并不觉得自己对集中营、无痛苦致死术及民族谋杀等事件有同

<sup>①</sup> 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322页。

<sup>②</sup> 迪特里希·朋霍费尔：《反抗与顺服——狱中书简》，艾伯哈特·贝特格编，居特斯洛，1983年第3版，第183页。







谋之罪，而且这些人在纳粹政权结束之后仍身居要职。

1933年，“德国基督徒”最重要的时刻终于首次来临。他们的牌出得正确，其他的福音教会多少也会跟着做。因为希特勒知道如何揪住他们的痛处：就是在1919年革命之后，那个令教会永难忘怀的丧失权力和功能之痛。他派遣全体的冲锋队去拜访教会——当然是穿着制服，而且他在1933年3月23日的演讲中保证：“政府视两个主要基督教派为维护民族精神的最重要要素。”

教会终于又可扮演重要角色了！教会终于又可坐满人了！而且希特勒不是也在1933年2月21日新帝国政府建立的“波茨坦日”，在腓特烈大帝的坟墓旁，乖乖地向“老迈的帝国总统”，也就是受所有德国新教徒尊敬的陆军元帅兴登堡鞠躬了吗？所有教会的钟都被敲响了，在那一刻，没有一个德国新教徒的眼睛还是干的。

7月23日，福音教会举行选举，选举结果将决定谁坐上教会领导人的位置，以及来年的教会政策的蓝图。

“德国基督徒”是此次选举中的大党派。它是以这个口号开始的：“在阿道夫·希特勒的新国家里建一座新教会！”所有离教会和纳粹国家一体化思想太远的人，则团结成“福音和教会”派，其中很多人并非排斥希特勒的政治，而是拒绝“德国基督徒”明显的错误教义。“我们对国家表示服从和爱意。对我们而言，这场选举

是教会内部的事。”<sup>①</sup>在这场选举中落败的“反对派”，在接下来的几年不断重复这段话。

迪特里希对这种行为感到愤怒，他说：“这是教会向政治投降！”<sup>②</sup>尽管如此，“福音和教会”派的名单是唯一的选择，迪特里希的朋友弗兰茨·希尔德布兰特及其学生，则投入一场几乎没有胜算的选举战。写传单、印传单，选前更是紧锣密鼓地工作，因为帝国政府强烈地干预选举战。迪特里希第一次接触到“国家秘密警察”。在回答西格蒙·舒尔茨忧心的询问（西格蒙因和平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身份早已离开德国）时，迪特里希写道：“无论如何，集中营我从未去过，尽管我也曾经在教会选举的机会下，被最高的警察单位通知要和一个兄弟一起去见识那个地方。”<sup>③</sup>

选举前夕，希特勒在广播里发表演讲：期待明天将选出“在‘德国基督徒’当中且其心里清楚地知道要站在国家主义领土上的人。”

“德国基督徒”得到70%的选票，因此占据了所有的教会要职。

从迪特里希在这天的讲道中，可以看出他在这个星期的激动情绪。他声音沙哑地向教会团契呼喊：“这就叫做决定，这就叫做精神上的分道扬镳。来吧！你们这

① 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322页。

② 齐默尔曼编：《与朋霍费尔相遇》，第47页。

③ 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348页。



些被孤单撇在一边的人，你们已经失去教会。让我们再度回到《圣经》上，让我们一起去寻找教会……教会啊！请你保留应有的样子，认罪、认罪、认罪！”<sup>①</sup>

迪特里希也把自己算在失去教会的人之内。由帝国主教（Reichsbischof）穆勒（Muller）领导和建立在“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元首、一个教会”口号下的教会，已经不是迪特里希心中“圣徒的团契”的教会。迪特里希认同的教会越来越少，加上1933年9月初在威丁堡的“褐色教会会议”（die Braunen Synode）中，他的邦教会除了一体化措施之外，还接纳了针对福



德国帝国教会首脑路德维希·穆勒主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向阿道夫·希特勒致意，朋霍费尔对此提出抗议

<sup>①</sup> 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348页。

音教会的国家雅利安人条款——当然备有阿尔陶斯及赫希教授的神学评鉴，他们将民族和种族解释成被上帝放在“创造的秩序里”。新的教会秩序是：“不具有雅利安血统的人，或与非雅利安人结婚的人，都不可在一般教会的管理机构担任神职人员及公职人员……”

这项法令和其他新法令条款带来的结果，是无数犹太基督徒的出局，这些人原本是牧师、教会法学家、救济机构女职员及幼儿园女教师。其中也包括弗兰茨·希尔德布兰特，他本来想跟迪特里希一起去接任柏林东区的牧师职位。迪特里希也因此拒绝了 this 职位，他不想在这种教会里当牧师。

既然不在国家教会工作，这对难兄难弟便计划对国家教会会议（Nationalsynode）采取传单行动，该会议当于9月底在威丁堡针对新的教会法令做出最后决定。

“在新的教会统治机构保持缄默中，各项法令顺利在邦教会会议通过并生效，这些法令与《圣经》和教会的信仰互相矛盾。这里所指的尤其是关于雅利安人条款……”<sup>①</sup> 这篇呼吁强调“顺服神多于顺服人”和取消“褐色”决定，共有2000多位牧师签名，当然也包括迪特里希和弗兰茨·希尔德布兰特。

这篇呼吁的另一个作者是马丁·尼默勒（Martin

<sup>①</sup> 艾伯哈特·贝特格、蕾娜特·贝特格、克里斯蒂安·格雷默斯编：《朋霍费尔》，第114页。



Niemoller), 他是老德意志国家主义者和退役的潜水艇指挥官, 曾在 1933 年选择纳粹德国工人党, 现在却成立“牧师紧急联盟”以抗议雅利安人条款在教会里运用。在短期之内, 竟也有几千名牧师赞同紧急联盟的义务——抗议关于雅利安人的条款伤害了基督信仰。

即便如此, 国家教会会议仍完全不为所动, 也不受在街上散发、贴在树上或住家墙上的传单所影响。在结束礼拜时, “德国基督徒”的“帝国主教”(Reichsleiter) 霍森费尔德 (Hossenfelder) 爬上讲台, 在路德的墓碑上呼喊: “我的帝国主教, 恭喜您!” 弗兰茨则低声告诉迪特里希, 他相信路德的骨骸在坟墓里会气得翻过身来。<sup>①</sup>

迪特里希在这段时间里相当迷惑, 因为对他而言, 教会是基督在世上的可见形象, 所以他无法待在一个背叛基督的教会里。他打算加入自由教会, 不过那里看来也好不到哪里去。因此他尝试在自己的教会里反攻为守, 并且建议所有拒绝雅利安人条款的牧师都放弃职务。这个行动 10 年后才有成绩——在挪威! 因为“牧师罢工”在德国是令人难以想象的。那位极端的年轻神学家——这个曾经明确要求真实教会必须从失常教会分离出来, 要求教会要力阻狂轮的人——现在变成了危险

<sup>①</sup> 艾伯哈特·贝特格、蕾娜特·贝特格、克里斯蒂安·格雷默斯编:《朋霍费尔》, 第 113 页。

人物。对教会而言, 迪特里希对纳粹国家和帝国教会的批判太过尖锐。最后, 马丁·尼默勒只好以“牧师紧急联盟”之名, 用电报向元首表达忠贞服从的誓词, 感谢他将德国从多民族的国家中解救出来。

迪特里希知道, 此刻除了让自己抽身出来以外, 已没有其他道路可走。1933 年 10 月, 他接受了伦敦两个德国团契的外国牧师职务。弗兰茨·希尔德布兰特也会尽快随他而去; 他们两个人打算平分那份工作和薪金。

迪特里希从伦敦写信给卡尔·巴特, 巴特是他在那段时间内私下认识的朋友。“我觉得自己不知不觉地陷入了与极端反对派朋友的敌对状态中, 我看事情的态度已使自己越来越陷入孤立中……我担心自己将变得不再择善固执, 且完全找不出理由证明我对这个局势有更好的见解, 就像一些能干又优秀的牧师一样……所以也许此刻正是让我走进旷野一段时间的时候了。”<sup>①</sup>

10 月初, 迪特里希与他的学生道别: “现在正是在安静中坚持的时候, 并且要在德国基督教会华宅的各个角落, 埋下真理的火种, 好让整栋建筑一同烧尽。”<sup>②</sup>

<sup>①</sup> 《1933 年 10 月 24 日书信》, 摘自《文集汇编 II》, 第 32 页。

<sup>②</sup> 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 第 377 页。



## 第十章

当为哑巴开口<sup>①</sup>！

1933 — 1934

1933年10月17日，迪特里希在伦敦南郊的森林山（Forest Hill）搬进德国团契西德纳姆（Sydenham）的牧师宿舍。“房子很大，破旧且寒冷，因为唯一的暖气来源就是壁炉里的煤气灯，外面的冷湿空气从窗户透进来。因此人们大部分时间只待在房间里，早晨的盥洗也常会简化。”<sup>②</sup> 沃尔夫-迪特·齐默尔曼报道说。他曾拜访过这位以前的老师。

1933年11月12日，迪特里希被团契会议及伦敦东区的圣彼得团契选为牧师。在南区的商人和外交官，以及在东区的手工业行会和店家，都是他要关怀的对象。

① 出自《旧约圣经·箴言》31：8：“你当为哑巴开口，为一切孤独的伸冤。”——编者

② 齐尔默曼编：《与朋霍费尔相遇》，第59页。



朋霍费尔曾在其中担任牧师的伦敦西德纳姆团契教堂



当时牧师的薪金非常少。此外，迪特里希还拒绝让国家教会的外交部决定他的工作，因为那等于是认同国家教会的管理，但这同时也代表他拒绝了领取养老金和退休金的权利。

迪特里希可以将姿态摆得这么清楚，只能归功于一个事实，就是他个人的财产允许他有某种经济上的独立性。“他其实用钱十分大方，而且非常慷慨。”他的朋友和学生说。“我只想要拥有足够的钱，让我不需要去精打细算。”迪特里希这么说。这已经算是相当有钱的人的特权了，迪特里希却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位来自柏林别墅区的教授之子可能已经准备要过一种不稳定且简陋的生活了。但是真正对他重要的东西，在入狱之前他都不需要放弃。

在伦敦的牧师馆里，他过了一段快乐的单身汉生活。有很多人来造访迪特里希和希尔德布兰特。“通常我们大概十一点吃早餐，内容十分丰富。同时一个人去买《泰晤士报》(Times)，我们从报道中讨论最近德国的教会争夺战，然后就各忙各的事。”<sup>①</sup>

他们两位都是钢琴高手，而且迪特里希以拥有一台Bechstein 三角钢琴而自豪。是他让人从柏林把钢琴搬到伦敦来的。

“很多晚上我们都一起在房间里度过……讨论神学、

<sup>①</sup> 齐尔默曼编：《与朋霍费尔相遇》，第60页。

合奏钢琴、讲故事、辩论，这些一直重复更迭着，直到半夜两三点。这一切都伴随巨大的生命力……”<sup>①</sup>这正是迪特里希在经历激动、困难后所需要的喘息机会——拥有距离和时间，让自己与其他人可以整理、澄清过去发生的事，并且思索面对新情况所需的决定。

他们面对的不只是教会已经走进死胡同，连整个家庭都被这个疑问折磨：面对新的统治者，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全家人在拒绝纳粹暴力统治的态度上是一致的，但是现在可做和必须做的是什么呢？

朋霍费尔一家不是属于那种让纳粹“拿走”了所有决定权的家庭。他们既不是左派，也不是犹太人；他们不会被解雇、取消国籍或拘捕；他们也没有写下会被禁止或焚毁的文章。他们不会被唾弃，反而会被献殷勤，因为新的国家需要他们：著名的精神病医生卡尔·朋霍费尔、物理学教授卡尔-弗里德里克·朋霍费尔和德国航空主要法律顾问克劳斯·朋霍费尔；迪特里希的姐夫鲁迪格·施莱歇尔(Rüdiger Schleicher)及汉斯·冯·杜南义也都位居要职。杜南义是交通部的处长及司法部长古特纳的私人秘书，后者是纳粹唯一从威玛共和政府接收过来的部长，以此假装司法独立来蒙骗大众。

他们是否应该放弃这样的地位，包括进入重要的资料来源的机会，以及在管理、经济、科学和司法的关键

<sup>①</sup> 齐尔默曼编：《与朋霍费尔相遇》，第60页



性位置？一个人可以利用他的影响和知识，反对纳粹政权到什么程度？“投机性的配合”和“非心甘情愿的勾结”之间的界限又在哪里？

这个家庭现在正经历着困难的时代巨变。在1933年秋天，卡尔·朋霍费尔必须在几个星期内，完成一份有关马里纳斯·



朋霍费尔的姐夫鲁迪格·施莱歇尔

凡·德·路伯（Marinus van der Lubbe）的精神病学的专家意见，这个男人可能是纵火焚烧帝国国会大厦的人。迪特里希的父亲重视实证和“价值中立”的科学，且是处世得当的人，他提供了一份在医学和科学上完全是无懈可击的专家意见，该评鉴证明，凡·德·路伯在精神上具有对刑事行为负责的能力。这个精神变态的年轻人是否可能是有罪或无罪的纳粹工具，则与本文主题无关，那是政治问题，不在医学家的职权之内。凡·德·路伯在1934年1月10日被处决。

有些人对卡尔·朋霍费尔的行为有其他期待，而他

这个向来对自己的理性世界观如此确定的人，对此恐怕也要首度感到怀疑了。面对最小的儿子，他终于第一次承认：迪特里希看待和掌握世界的方式，并非如他以前所想的那么不重要和无意义。似乎在这一年中，许多科学家都因受到与卡尔·朋霍费尔相同的打击而清醒：原来伦理、罪恶和责任的问题，不是实证科学本身可以解答的。无论如何，迪特里希现在更被父亲和哥哥们视为严肃的谈话对象，因为他可以提供他们现在需要的东西。

迪特里希固定地跟柏林保持电话联系，森林山的邮局则私下给予他“批量使用的话费折扣”。虽然他原本想“走进旷野”，但他也想从亲友那里得知家里的状况。“人总是因靠得太近，使自己不想参与所有的事；却又因走得太远，使自己想要真正积极地参与其中。然而这件事对过去几个星期里的我来说，变得很困难。”<sup>①</sup>他在1934年1月这样写道。

事实上，这种情况在福音教会那里更加明显。在福音教会里，社会冲突也得到真实的反映，因为人们根本就无法禁止它，就像偶尔会有人与不隶属于纳粹的党派、组织、报纸和机构合作一样。虽然德国基督教会统治机构和帝国主教穆勒已经尽力试行一体化，然而“德国基督徒”愈是积极推行这一工作，反对的行动也就愈

<sup>①</sup> 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381页。



发扩大，连那些原本是“第三帝国”里所谓的良民也参与了其中。

不只雅利安人条款使反对派不安。1933年11月13日，“德国基督徒”在柏林体育馆召开大型的告白聚会。主要的演讲者是身为教育参议和区主席的克劳斯（Krause），他呼吁教会“从《旧约》的犹太赏罚道德中解放出来，也就是从贩售家畜和介绍妓女的故事中走出来。”他呼吁舍弃保罗的犹太神学，而信仰一个“英雄般的耶稣”。但接下来的几天，帝国主教几乎被抗议的电报所淹没。“抗议者反对在柏林体育馆示威的耻辱，要求正式中止教会官方机构的成员这类行动，因为这些成员在那里已拒绝捍卫信仰……”<sup>①</sup>

教会基层的气氛开始改变。尤其是积极的教会成员逐渐地理解到，什么是“伟大的全民布道时刻”所附着的代价。一个民族国家加上一个有影响力的福音教会——几近完美！教会成为纳粹冲锋队和帝国文化联盟之外的纳粹下级组织——千万不可！圣诞节来临前不久，帝国主教将福音教会的青年移交给“元首”，所有青少年联盟的成员将被迫成为“希特勒青少年”。有些联盟得知此事后事先解散，以逃脱这项强迫措施。1934年1月4日，“言论限制公告”接着出现，它规定，在教会范围和报纸杂志上，禁止讨论教会统治机关的措施。

<sup>①</sup> 罗姆、梯尔费德编：《在十字架与卍字号之间的福音教会》，第41页。

教会紧急联盟要求其成员不要听从帝国主教的指令。伦敦的五个德国牧师于1月7日电告到柏林：“让我们赞同紧急联盟的声明，并且对帝国主教穆勒投下不信任票……”

迪特里希与德国教会反对派有很多接触，并暗藏在幕后策划，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德国的教会当局对此更是心知肚明。他们派遣最高的教会监理代表赫克尔（Heckel）来到伦敦，这位路德教派的神学家，不久后就被任命为主教和教会外交部门的负责人。

赫克尔要在帝国教会统治机关的控制下，建立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对此，他使用了一种论据，不久后，这就像把用一条线系住的尖刀悬置在反对派人士的头上，所有不受帝国教会统治机关的控制而私自与国外教会接触者，都被假设为有背叛国家的企图。迪特里希也很快接到指示：“从现在起放弃任何普世教会的活动。”<sup>①</sup>但是他却不管这些，相反的，他尝试以各种方法让国外的教会睁开眼睛，看清纳粹政权和帝国教会的本质。

但这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例如，很多英国人就对此感到心安理得，他们以为德国产生了一个“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堡垒”。英国的神职人员还以著名的德国神学家和教会领导者为证人，称赞遍及德国的新秩序。这使得那位身在伦敦的不出名的牧师陷入了困境，而且这

<sup>①</sup> 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423页。



1934年5月3日，这个信息在“巴门宗教会议”（Bamer Synode）举行前三星期得以公布。“认信教会”（Bekennende Kirche）将在此次会议中建立。

在战后新教徒的自我认识中，“认信教会”被匆忙地解释为“反抗的福音教会”，而前纳粹的“德国基督徒”则变成极端的边缘组织。然而，根据同时代人的回忆和教会史家的认识，事实却与此相反。“认信教会”一点都不反对当时的政府，它起初只是反对“德国基督徒”在教会内使用错误教义和暴力措施。“假使希特勒不干预教会，不那么执著于自己的‘上帝预选论’，并偶尔也给教会一个关爱的眼神，那么就不会有‘认信教会’的产生。”<sup>①</sup>柏林教会史家卡尔·库彼徐（Karl Kupisch）宣称。

1934年初，大部分教会反对人士还尝试着与帝国主教穆勒作斗争，而与希特勒达成一致。人们因此把希望寄托在老总统兴登堡身上。

1934年1月25日，希特勒在国务总理办事处接待了所有福音教会的重要人物，包括著名的反对派代表尼默勒牧师。代表们针对这项邀请曾互相通过电话。赫尔曼·戈林的秘密警察负责整个行动。马丁·尼默勒报道说：“戈林在招待会之前到达，腋下夹着红色的秘密文件，他往里面慢步进来，站在希特勒面前，然后说：‘请允许我朗诵一段谈话，这段谈话是在一个半小时前由出

<sup>①</sup> 卡尔·库彼徐：《教会史V》，斯图加特，1975年，第126页。

种困境还不只是在英国。虽然如此，迪特里希却毫不放松，他力图造成世界与帝国教会统治机关的决裂。

1934年4月，他写信给教会联谊工作世界联盟的秘书长：“亲爱的亨里厄德（Heriod），我非常愿意再跟您谈谈目前的形势，因为我渐渐觉得行动缓慢就是不负责任。人必须自己作出决定，不能永远等待上天的预兆……此时，是作出‘现在或永不’（Jetzt oder Nie）的决定的时候了。如果普世教会还无法了解这一点，那么普世教会就不再是教会，而是一个无用的协会，其中只有花言巧语而已……至于决定要走向哪个方向，对此难道还有疑虑吗？忏悔——今日在德国是忏悔，对普世教会而言也是忏悔。远离对这句话的恐惧，就是把基督的事当做儿戏！”<sup>①</sup>

迪特里希赢了这一步，因为他赢得了奇彻斯特大主教（Lorbishop von Chichester）暨实践基督徒世界理事会（Weltrat für Praktisches Christentum）主席乔治·贝尔（George Bell）的支持。他同这位比年长23岁的老普世运动宗教家结下了相当深厚的友谊。乔治·贝尔很喜欢称迪特里希和希尔德布兰特为“我的两个男孩”。他自己对此有所感动，便发布了一封普世主教公告，对帝国教会统治机构与基督信仰不符之处加以谴责，包括领袖原则、残暴措施和种族歧视。

<sup>①</sup> 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427页。



教会主教们联合署名的，即由符藤堡的乌姆（Wurm）、巴伐利亚的麦塞（Meiser）及汉诺威的马拉仁斯（Marahrens）联合署名。从现在起，一切都很清楚，谁要攻击帝国教会的统治机关，就是攻击国家领导。对许多“认信教会”的成员而言，赶快对国家表示忠诚是必要的；对另一群人来说，他们选择了相反的路线，意外地扮演了国家敌人的角色。

巴门的宗教会议正是由这两种人组成。后一种人指责德国基督教会的观念是错误教导，并拟出含有六条论纲的信仰告白，将“认信教会”定义为与“德国基督徒”帝国教会相互对立的教会。“我们谴责这种错误的教义，好像教会除了上帝的话语外，还可以将其他事件、权力、形象和事实当作上帝的启示……好像教会可以将信息和秩序的形象依随自己的喜爱，或领导的世界观和政治观而改变……”说出这些话的不是别人，正是神学家卡尔·巴特。且正是因为这些话，他必须与希特勒的德国告别。

巴门的神学阐述并不含有任何对政治事件的立场声明，在这方面会议未能达成共识。但即使如此，1934年5月31日，138位来自所有邦教会的代表，还是决定以此信仰告白作为新教会的成立基础，不再承认德国福音教会的代表权。

对迪特里希而言，这真是令他松了一口气。他再度

席这个讨论会的牧师尼默勒所说的。’这好似晴天霹雳击在我头上。那时我还完全不知道电话可能被窃听。当然我们的确讨论过……我们该采取什么态度呢？万一我们今天曾经谈到希特勒呢？我一向习惯用粗野的方式谈话……”<sup>①</sup>

其他谈话则以简短的文字记录下来，下面这段话是由伦敦的牧师摘自赫克尔的叙述：“尼默勒在长途电话中说：‘希特勒现在要去见上帝了。经过最后的抹油仪式，尸体洗干净。当他走进前厅时，将接到一份悼文……我们将一切都安排好了。’希特勒说：‘这真是前所未闻。想造反？别想从我的领导权下挣脱。我将采取所有方法对付这个造反团体。’希特勒询问有没有反对帝国主教的意见，教会的领导们都沉默不语。”<sup>②</sup>

两天之后，他们又能说话了。“在那两个重要时刻的压力下，德国基督教会的领袖和总理先生被召集在一起。”他们解释着说：“被召集的教会领袖一致赞同帝国主教的意见，表示愿意按照他的措施和命令去实行，阻止与教会政策相左的反对派，并利用教会有权使用且合乎宪法的一切方式，巩固帝国主教的权威……”<sup>③</sup>

这份服从的公开信是由非“德国基督徒”治理的邦

① 马丁·尼默勒的话，摘自伊雷娜·胡贝娜编：《我们的抗议》，法兰克福/缅甸，1982年，第61页。

② 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405页。

③ 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401页。

## 第十一章

## 阻止战争

1934 — 1935

没有人天生就是英雄，迪特里希也不是。他在伦敦度过的那几个月，对梳理清楚他个人的思绪有很大的帮助：自己是否准备冒险？如何对付反对势力？他是否打算放弃所有中产阶级的安全？

在伦敦停留的初期，他曾写信给莎宾娜和格哈德·莱布贺兹：“我正在准备万灵节的讲道，而我必须一再想到你们和在三月的那些日子。”当时格哈德的父亲死了，就在纳粹机关解除他市议员的身份几天之后。迪特里希理当前往将他安葬，可是他的上司，也就是柏林的总教区牧师，马上劝他不要这么做。当时迪特里希做了让步，可现在他觉得这件事还没真正了结：“这件事直到如今还常常折磨着我，当时我对此事的认识并不明确，所以就听从你们的请求。老实说，我现在一点都不

拥有了“他的”教会，而他会将自己毫无保留地供教会使用，即使他与“认信教会”的其他非政治行动的意见并不相同。“用神学的保守态度来对付国家行动终究必败，这一切只是恐惧的表现。”他在1934年秋天写信给埃尔温·苏茨的信中提到：“‘你当为哑巴开口’——在今天的教会到底还有谁知道，在这个时代这是《圣经》最低的要求？”<sup>①</sup>

迪特里希十分清楚谁是教会该出力帮助的哑哑者。他经历过第一次流亡潮，并尽力尝试照顾流亡者。例如，他曾写信到美国要求提供奖学金和签证给作家阿明·提·维格纳（Armin T. Wegner）——他身心破碎地从德国集中营直接逃往伦敦。

同时，他恳求普世教会中的外国教会，承认“认信教会”为唯一的教会，并拒绝承认帝国教会。但是，他的话很难得到大家的认同，谁会相信一个欧洲文明国家竟会逐渐变成野蛮国家？谁会理解在“认信教会”与“德国基督徒”之间的讨论完全不同于神学上的吹毛求疵？迪特里希特别打听了有关他的家人和朋友的情况，但这些人一样不太相信他。一般人认为，他的说法根本不可信，迪特里希这个“好德国人”则必须一再提出反驳。

<sup>①</sup> 艾伯哈特·贝特格、蕾娜特·贝特格、克里斯蒂安·格雷默斯编：《朋霍费尔》，第127页。

有什么任务和目标等着他。但情况还不是那么明朗。利用那段时间，他取得了对自己的完全谅解，并且为德国真正的教会——即认信教会，向普世教会提出了申请。

这个教会慢慢地具有了形式。认信教会在巴门原则的澄清下，渐渐赢得组织的形象。1934年10月，柏林一达连（Berlin Dahlem）的宗教会议决定成立一个紧急教会执政会（Notkirchenregiment），以与帝国教会统治机构对立，此即所谓“德国基督教会兄弟议会”（Bruderrat der Deutschen Evangelischen Kirche）。该会议提出：“我们要求基督教的团契，即牧师和长老，不要接受目前帝国教会统治机关及其机构的指示，并撤回与他们的合作，今后应顺从于教会执政会。”

这与迪特里希一年前的构想一模一样，于是人们想起了他。帝国主教为了图利于德国基督教会的牧师接班人训练机构，而取消了邦教会的传道讲座，“兄弟会”决定成立一个属于自己的讲座机构。这个不确定且冒险的计划，刚好适合那个年轻的极端神学家——从伦敦积极参与的神学家朋霍费尔。他应该可以在1935年1月1日，就任柏林布兰登堡传道讲座的负责人。

迪特里希答应了，但有一个条件，就是他的工作要延后三个月才开始。他想要用自己的方式为新岗位做准备。

在这之前，他还有很多在团契和普世教会的工作要

了解自己。当时我怎么会那么恐惧和害怕呢？这件事到现在还很可怕地萦绕在我脑海里，因为它正是那种无法重新再做好的事。所以恳求你们原谅我当时的懦弱。我现在确切地知道，我应该将它做得不一样。”<sup>①</sup>

现在，迪特里希并不是突然变成了苦行的道德主义者，或不怕死的世界改革家。他一直保持着原来的样子：逻辑学家、美学家、享乐主义者；对他而言，秩序、和谐和美好的生活胜于冲突和放弃。但是，他现在知道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他不能不忠实于自己。他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他不可能逃避教会与国家的冲突。

卡尔·巴特加强了他的信念。“现在绝对不能当罗腾树下的以利亚或蓖麻下的约拿”——这些先知有一段时间也像迪特里希一样“走在旷野里”——现在该带着“日耳曼英雄的样子”和他的神学真相，尽快回到德国。“您现在必须……只思考一件事：您是德国人，您家乡的教会起火了。您所知道的已经足够了，你所知道的已足以向众人宣告，您可以为他们提供帮助；从根本上说，您必须搭下一班船返回您的岗位上！现在，我们说：搭下一班船！”<sup>②</sup>

迪特里希愿意搭下一班船回去，只要他知道在德国

① 莱布贺兹·朋霍费尔：《过去》，第100—101页。

② 《文集汇编II》，第135页。



做，例如普世青少年会议的准备和执行工作，这个会议预定于1934年8月在法诺（Fano）举行。

为此，迪特里希写信给“教会友好世界联盟”的代表，他表示自己是否参与此项工作，将由一个问题决定：“是否帝国统治机构的代表也参与此次会议……我希望在这点上您能帮助我，请及时表达：在两个教会中，世界联盟承认哪一个？”<sup>①</sup>

对迪特里希而言，这是毫无疑问的，只能有一个“圣徒的团契”。但是世界联盟却无法作出决定把帝国教会排除于普世教会之外，因为帝国教会仍旧是德国官方的教会。世界联盟邀请两边的代表到法诺，他们马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迪特里希安排教会里有能力的人当代表，几个他以前的学生也参与在内。会议的高潮在双方势均力敌情况下对关于德国教会地位的决议进行表决。对“认信教会”而言，如果他们的请求在决议中被采纳，将是一项成就。帝国教会的代表提出反驳以示抗议。“他们反驳‘认信教会’的看法——好像意味着在德国帝国里，福音的自由宣告遭到不能说、不能写的危险，而且青少年的基督信仰教育得不到保证。他们更确切地表明：在今日的德国，福音宣讲的机会比以前相对

<sup>①</sup> 《1934年7月4日书信》，摘自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435页。

增加了许多。”<sup>①</sup>

在这一期间，德国是一个具有新闻检查、集会禁令和上千政治犯的警察国家，公开聚会就会惊动警察。人们期望未来能实行一般的兵役义务。迪特里希在法诺反复说道：“希特勒代表战争！”这是当政权转移至纳粹手中，朋霍费尔家族就开始担心的事。

“牧师先生，如果发生战争，您将会怎么做呢？”一位瑞典会议参加者在铎南一个讨论场合里提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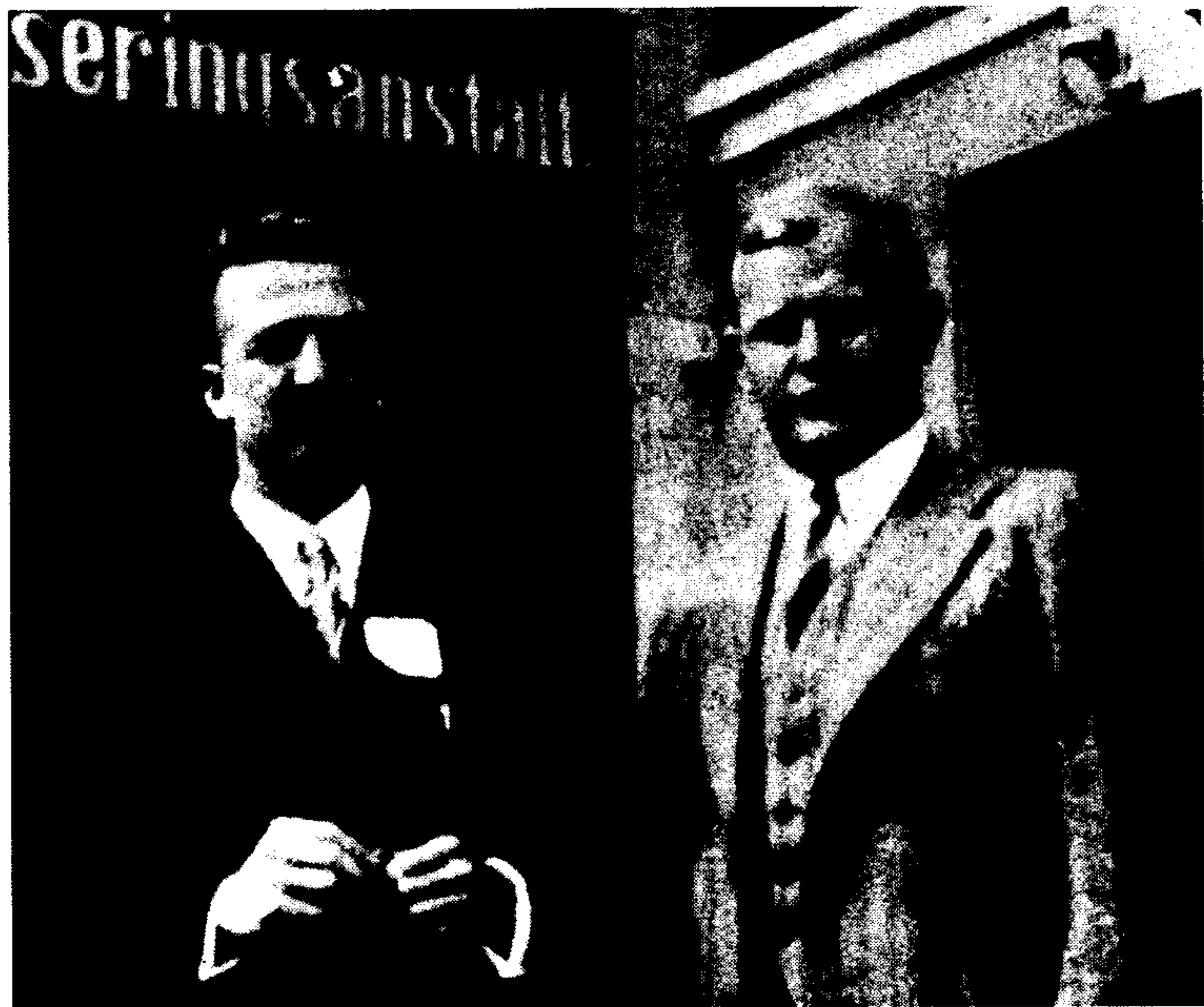
“我将祈求上帝给我力量不拿起武器。”迪特里希回答说<sup>②</sup>。

让·拉谢勒也在与会的代表当中，他对于这位当年协和神学院的同学在1934年8月28日早晨礼拜的讲道，尤感欣慰。“怎么样可以求得和平？通过政治契约的系统？或者通过国际资金在不同国家的投资？还是通过多边的武装扩充，以达到和平安全的目的？不！以上这一切都基于一个理由而不可行，因为和平与安全在这里被完全混淆了。在安全的路上没有通往和平的路……我再说一次：什么是和平？谁能呼喊和平，使世界听到并强迫世界听到？只有那个伟大的、由神圣基督教会组成的普世性宗教会议可以如此说：当世界听见‘和平’

<sup>①</sup> 《1934年7月4日书信》，摘自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444页。

<sup>②</sup> 艾伯哈特·贝特格、蕾娜特·贝特格、克里斯蒂安·格雷默斯编：《朋霍费尔》，第133页。





朋霍费尔（右）与法国友人让·拉谢勒在法诺岛普世教会研讨会上，1934年

一词，必定咬牙切齿，但民众却会非常高兴。因为这个基督的教会以基督之名，将他们儿子手中的武器拿走，并禁止他们参与战争，且向这个发狂的世界大声宣告基督的和平。”<sup>①</sup>

50年以后，在欧洲新的中程导弹设定之后，两边国家的和平反战运动重新想起了这段话，并且要求一个普世的和平宗教会议。当时迪特里希像是一个“在旷野呼

<sup>①</sup> 艾伯哈特·贝特格、蕾娜特·贝特格、克里斯蒂安·格雷默斯编：《朋霍费尔》，第133页。

喊的人”，也像一个在自己国家里被轻视的先知。让·拉谢勒完全赞同他的演讲，他的德国朋友们则很难理解这种和平主义的论调，而那些帝国主义者开始将他当成目标。

1934年9月，迪特里希又前往伦敦，在返回德国前他要做成两件事：他要使伦敦的教会团契从帝国政权中脱离出去，他想去拜访印度的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

第一个计划成功了，即使讨论和协商持续的时间比他想象的更久，但至少有两个团契（西德纳姆和圣保罗）拒绝承认帝国教会。1935年1月4日，教会的议会一致通过脱离帝国教会的决议。但印度之旅，在那时已显得为时太晚。

1934年11月初，甘地的邀请来了，为此迪特里希曾花费了不少心力。甘地在邀请信中写道：“鉴于您想参加我的日常生活的愿望，我想对您说：您也可以住在我这儿，因为我现在不在监狱里了……”<sup>①</sup>

在当时的德国新教徒中，大多数人尚未准备好并且也不能用一种超越国家和宗教的界限的眼光来看事情。迪特里希的旅行计划在他们看来显得十分奇怪，他到底想在印度得到什么？

<sup>①</sup> 艾伯哈特·贝特格、蕾娜特·贝特格、克里斯蒂安·格雷默斯编：《朋霍费尔》，第137页。

越成为他与甘地联结在一起的根本原因；甘地这位虔诚的印度教导师，后来曾一度将登山宝训当作自己教导的核心。

印度之旅无法成行，迪特里希一直觉得十分遗憾，于是他充分利用在英国停留的时间，准备家乡期待他的工作所需的基本原则和计划。在一本新书的第一章中，他概述了“追随基督”应成为登山宝训的新解释及其实现它的途径。他与朋友和同事讨论这件事，他用一种对许多人而言很不寻常的严厉态度，询问他们“信息在今日的意义”；然后大声宣告他们的戒律和义务。

“如果想把迪特里希带进讨论，只要提及离婚及和平主义的话题就行了。他反对离婚和支持和平主义的立场是如此的明确和坚定，以至于讨论很快就会进入结论，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意见与他相反的缘故。”<sup>①</sup> 劳伦斯·毕·怀特邦（Lawrence B. Whitburn）向他的太太如此叙述道。迪特里希曾是他们的常客。

登山宝训是基督教原始团契的基本原则，反映了耶稣呼召人们尝试去实现另一种生活形式：非暴力、爱仇敌、公义，完成人与人之间的团契关系，如友情和婚姻，但并不是按照“字句”，而是根据上帝戒律的精义。迪特里希从小就是一个“比较认真”的人，他觉得登山

<sup>①</sup> 《劳伦斯·毕·怀特邦的话》，摘自齐默尔曼编：《与朋霍费尔相遇》，第64页。

1934年夏天，迪特里希曾在伦敦听过麦德琳·斯莱德（Madeline Slade）的一次演讲，她是英国海军上将的女儿。在印度期间她自称为米拉·拜（Mira Bai），作为甘地的女同事，她曾在那里发现一个另类的生活方式。甘地和他的追随者过着一种无财产且与世无争的生活，并从中自由发展出非暴力的抗议方式，使得英国的殖民统治难以为继。迪特里希想到印度去实地学习甘地的方法。他当时的想法是，这种抗议方式也可以用在反对纳粹政治上。此外，对异地的向往、对陌生世界的渴望再次攫住了他；他完全不同于教会里的大部分同事和神学家，他认为，人们也可以从其他文化和宗教中学到东西。

对迪特里希大部分的理解和支持，是他祖母给予的。他祖母以前就鼓励他勇敢地进行印度之旅。这位92岁的老人是一个有趣且大胆的人，她不自觉地实践着甘地的非暴力反抗运动。1933年4月，她穿过冲锋队的警戒线，进入一家犹太商店，说：“我爱在哪里买东西，就在哪里买东西！”也只有用这种“文明的不服从”策略，在当时还可能阻碍独裁的路——只要有足够的人准备好这么做。

迪特里希要为自己和教会学习非暴力抗议和为此必须忍受的痛苦做准备。对他而言，那是一块试金石，试验人们是否对登山宝训的信息严肃对待。这个信息越来



宝训道出了自己的心意。他绝不是行事不彻底的人，似乎这也是他一生中很少真正与人有紧密关系的原因。短暂的情爱关系会导致他生活不安，这对他而言是无法想象的。

对迪特里希而言，一个生命历程在这段时间展开，如他此后所说，在其中他尝试“过一种神圣的生活”<sup>①</sup>。这一思想不是新的，因为他以前已经作出过努力，要以“圣徒的团契”这个与俗世有别的基督团契——的形式生存这个世界上。但是现在他必须更激进地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团契的传统存在形式，也就是教会——即圣徒团契生存的地方——已四分五裂了，所以他应该去帮助、发现和建立新的形式。但此事怎么进行？这个教会的成员并不追求新的形式，也不觉得有此必要。

对迪特里希来说，这是一件关系到整体的事，必须要拒绝不彻底的决心、虚假的顾虑和懒惰的妥协。但这意味着在做出“非此即彼”的抉择时，他要与中产阶级的安全感分离，要断绝许多的人际关系，如果这些关系会危及他全身心地追求公义，或是阻碍他自愿进入受迫害的环境的话。迪特里希利用在伦敦的时间，似乎已经在心里决定将中产阶级生活抛诸脑后了。在这方面，他真的是一个“圣者”，一个虽处在社会及教会的外围，却已经准备好随时接受上帝呼召的人。

<sup>①</sup> 朋霍费尔：《反抗与顺服》，第183页。

尽管如此，若把迪特里希的这一步当成虚己和舍弃自我的修道之路，就是误解他了，事实上，他是更进一步地接近了他自己。他开始去理解《圣经》的每一段辩论，按照这样的方式，他赢回了原本失去的东西。在他从伦敦起程之前，他写信给莎宾娜及格哈德·莱布贺兹：“我很不想离开这里，但这大部分是因为过分依赖中产阶级的安全感，我可不能让这种感觉继续滋长了，否则生活就会变得毫无价值，并且再也没有乐趣。所以，我们很快就可以再见了！”<sup>①</sup>

<sup>①</sup> 莱布贺兹·朋霍费尔，《过去》，第103页。



## 第十二章

## 蓄意脱离认信教会即脱离拯救！

1935 — 1936

1935年4月26日，“认信教会”在波罗的海边的青格斯特（Zingst）开始了第一个传道人讲习班。这是旧普鲁士联盟基督教会兄弟会为来自波美拉尼亚省（Pommern）的助理牧师设置的。两个月之后，这个班搬进了最后的住所，他们所使用的房子在靠近斯德丁（Stettin）的芬根瓦（Finkenwald），是一所被纳粹解散的私立学校。这个课程的负责人比学生大不了几岁：迪特里希·朋霍费尔，29岁，是大学讲师和“认信教会”的牧师，由兄弟会聘任，经济来源是自由捐赠，薪水360帝国马克。这一薪金在当时的公务员中是很低的。

“认信教会”是一个与支持纳粹的“帝国教会”相对抗的“非常时期”的教会，以成员的会费及捐赠维持其经济。支持“认信教会”的人，会得到一张会员证

明，这就是所谓的“红卡”（rote Karte）。迪特里希的母亲不怎么同意传统教会，但是她对这样一个持不同政见的新的教会却很容易接受。她为自己购置了一张红卡，并且也感染了整个家庭。

芬根瓦的第一个教牧讲习课不只与书本有关，也与锯子、槌子、刷子和颜料有关。那些年轻的神学家拒绝服从帝国教会的领导，必须建立自己的另类教会。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曾在某一方面经验过德国基督教会，并且知道他们要离弃的是哪一种“教会”。

比如说，来自威斯特法伦（Westfalen）的旁听生沃纳·科克（Werner Koch），在来到芬根瓦之前，就经验过“帝国教会”主教所开的“教会青少年工作”进修课。那时，在45位助理牧师当中，有40位是穿着纳粹冲锋队或党卫队（SS）的制服出现的。旗帜、口号、希特勒的问候语，把他们所受的纳粹训练暴露无遗。

沃纳·科克还记得：“我们得知有高层人士来访，图林根（Thuringer）基督教会的最高教会顾问莱弗勒（Leffler）就要来对我们训话。他的论点是：德国经历了一个新的圣灵降临节，当希特勒来的时候，天空中出现了旋风，缀有纳粹标志的旗帜，在我们面前飘动着，那就是圣灵，他的火赋予我们生命，并将我们焊接成一个从未被见识过的团契，一个伟大美好的民族团契，没有类别与阶级之分。第一批体验圣灵降临的年轻人，和





今日感动德意志民族的热忱，都是来自我们尊为圣者的同一个灵的工作。

“这样的论调持续将近一个小时，接着才真正进入主题。我登记为第一个发言的人，我声明：‘这里没有什么好讨论的。我只有一件事要说：我刚才所听到的，都是违背基督信仰的三个信条的。我觉得，我与莱弗勒先生不在同一个教会里。’”

那个最高教会顾问张着嘴、大声喘息。他说：“这样的教条主义（Dogmatismus）以前还没碰到过，何况是由一个年轻人提出的！”<sup>①</sup>

因此，助理牧师科克开始与德国基督专业教育进行小型而个人的“教会争战”（Kirchenkampf）。当“认信教会”针对“牧师阶级的更新”开课时，他凭着自己的眼光知道，这样的更新是迫切需要的。

第一次的芬根瓦课程由 23 个神学生组成，他们首先得把住处翻新。在那封写得不怎么有技巧的募款信上说：“我们想陆续搬到斯德丁的芬根瓦去。在那里有一个破旧的农舍是空的，房子是给我们大家使用的。真的很空，你可以想象：只有一些床和柜子……”<sup>②</sup>

反响倒是很热烈。团契、同情者和资助者赠送了家具、书籍、金钱和一箱箱的蔬菜水果。用这样的方式我

<sup>①</sup> 维尔纳·科赫：《我们应该继续观察 K 吗——抗议中的生活》，斯图加特，1982 年，第 78—79 页。

<sup>②</sup> 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 489 页。

们克服了困难，一共五期的课程得以完成，并且他们学到一个经验：在必要时，就算没有国家的支持和教会税，也可以过得下去。

朋霍费尔再一次看到了他的任务，不只是传授神学专业的知识。在芬根瓦，在传授生活和教义知识方面是高质量的，这不只是涉及其他教会的教义，也涉及一种新的生活风格的发展。那些在著名的反对派神学家迪特里希·朋霍费尔门下接受专业教育的候选人，没有一个认为他们可以在国家教会里成为牧师，或是享有国家教会优越的位置。而且，因为那时他们并不知道，“千年”的纳粹帝国将只有 12 年的寿命。他们必须对他们个人的未来生活有一个清楚的规划。

由此，教牧人员讲习班变成了一个可经验自我的地方。而那位校长——喜欢被称作“牧师先生”或“朋霍费尔弟兄”的人，将自己的任务视为：不只是教授知识，也要引导一个由各种独特的成年人所组成的团契，在紧密的空间里共同生活。

从英国回来之前，迪特里希拜访过不少修道院和共同生活团体。他尝试将一些心得应用在课程上：他推动早祷、晚祷、默想和安静时间，禁止大家谈论同修弟兄缺席的事情。

这样的规范对团体的紧密生活有很大帮助。他们共有一个大寝室、几间书房，以及共享的餐厅、客厅和演



觉上最满足的时候。”<sup>①</sup> 在芬根瓦的第一个学期后他这样写道。

另一方面，他终于超越了市民阶级的财产思想，抛弃了对安全感的需求。迪特里希将他所拥有的和觉得重要的东西，完全贡献给了“他的”讲习班，包括他的图书馆、那架 Bechstein 三脚钢琴、从美国带回来的福音歌曲唱片、来自西班牙的铜制古典火钵。他也不要其他任何特权，除了一间自己的房间以及不受打扰的权利。这些做法不但受到了肯定，而且也赢得了那些助理牧师对课程和老师的高度认同。他们需要这种休戚相关的感觉，因为第一次考验已经迎面而来。

1935 年夏天，纳粹政权改变了他们的教会政策。希特勒向“认信教会”示好，只要这个教会不与“德国基督徒”中的极端分子往来，并且不与帝国主教唱对台戏。教会内部的争端终究不应制造出国家的敌人。许多“认信教会”的代表也想与国家和解，这是众所皆知的事。希特勒的“安抚原则”（Befriedungskonzept）正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他任命有国家主义思想倾向的基督徒伪君子汉斯·克尔（Hans Kerrl）为教会部长，这个人则委托一个普遍受到尊敬的总教区牧师左尔纳（Zoellner）建立教会决策会（Kirchenausschüsse），其中以温和的“德国基督徒”、“认信教会”的代表和中立派的人

<sup>①</sup> 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 481 页。

奏房间，大部分的神学生对这种不寻常又过分的生活纪律要求十分不满，他们还不习惯用思考之外的方式去追求神学。迪特里希除了反对理性之外什么都尝试，他强迫学生在默想中感受他们的生命和灵魂。对一些学生而言，这是恐怖而神秘的，另一些人则觉得十分尴尬。他们觉得这是“天主教化”的，因此感到反胃，开始取笑这位校长先生的“东方神秘气质”。但是很明显地，朋霍费尔却有完成这些灵修，或其他一些在当时德国的助理牧师看来是有点疯狂的事。然而，当朋霍费尔提出建议，将难消化的德国午餐改成清爽的简餐，而将主要的用餐时间挪到晚上进行时，学员还是抗议到底了<sup>①</sup>。

这个讲习班的领导人在各方面都并不恪守传统。天气好的时候，他会取消课程，与学生一起骑车到海边。迪特里希一直是一个出色的运动家，而且玩手球的时候跑得比学生还快。他还举办各种讨论和文学朗读。他深深地确信，只有在一个成功的生活形式中，反对的力量才有可能成长，而这正是那些未来的牧师们面对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时所需要的。

对他自己而言，这个实验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它稍微能实际地消除他在《圣徒的团契》里所预期的孤独感。“1935 年夏天对我而言，是在工作和个人感

<sup>①</sup> 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 492 页。



为主。

尽管在呼吁“与教会委员会合作”的口号上，已经表示赞同“以种族、血缘和土地为基础的国家社会民族化（nationalsozialistischen）”，但是大部分“认信教会”的地方教会已经准备好与其合作。他们认为，自己对抗“德国基督徒”已经足够尽力，现在不想再当反对派的教会了。“认信教会”的人不再自称为“认信教会”，而称“认信运动”（Bekennnisbewegung）了；若谁还坚持这是一个“教会”，谁就会被当做少数的极端分子；人们也剥夺了他们自称为“认信教会”的权力，并且挑衅地将他们称为“信仰前线”（Bekennnisfront）。

旧普鲁士联盟的福音教会领导者，现在终于被贴上“仇视国家”的污名，而其所举办的芬根瓦讲习会，也在1935年12月2日在教会部长“对福音教会的安全”的命令中，被解释为是非法的。

芬根瓦的人在当天也从《斯德丁晚报》中获知了这个消息。在这个星期一晚上，迪特里希把他班上的学生聚集在一起，向他们描述了目前的形势，其中有一个学生在几天后的一封信里这么描述道：“所有我们在这边做的事都是违法且与国家法律敌对的。在报禁和代祷信（Rundbrief）被禁之后，我们连复印的权利也被禁止了……教会决策会像一面西班牙斗牛墙，在墙后教会将被

刺杀而死。”<sup>①</sup> 另有一封兄弟会的信则写道：“我们无法给你们任何保证：保证你们会被聘请、会得到薪水、会被任何一个国家单位承认。你们在未来的路上可能变得非常艰辛……”<sup>②</sup>

迪特里希让学生自己决定自己的去留。至于他自己，只要有一个学生愿意留下，他就要留下来。

所有的人都决心留下来，连下一期的芬根瓦课程的名额也都告满。然而关于未来个人命运的问题却变得更加紧迫，而关于此的讨论大都涉及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教会，什么不是教会？教会决策会声称，“民众教会”（Volkskirche）将再度建立，他们将为上讲道课程的神学学生提供“国家的认证”和牧师职位，只要他们接受一次由教会当局所举办的考试。

这意味着每个未来的牧师都要单独面对这个决定。因为即使是1936年2月在巴特·奥尹豪森（Bad Oeynhausen）的第三次及最后一次宗教会议，对此也没有一个清楚的立场。相反的，在准备妥协派与过去“认信教会”的少数重要人物之间，在此问题上终于产生了意见分歧。后者指的是旧普鲁士联盟的兄弟会以及奥登堡、不来梅及拿骚—黑森（Nassau-Hessen）各区的兄弟会，他们选出了一个暂时的教会领导，并且选择了一条不享

① 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566页。

② 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566页。





负责任的意见表达而已……”<sup>①</sup> 有些人认为，在错误的教会里，牧师还是可以做出又好又正确的事。对此有人则反驳说：“当人上错了火车，即使自己朝相反的方向奔跑，也是徒劳的。”<sup>②</sup>

“朋霍费尔具有我们教会和基督徒特别缺乏的东西，”阿尔布雷希特·舍恩赫尔（Albrecht Schonherr，朋霍费尔的学生，后来成为东德教会联盟首席主教）说，“他要他所想的。而他的想法是尖锐且坚定的。”<sup>③</sup>

然而，不是所有芬根瓦课程的参与者都将极端的反对立场坚持到底，因此不断有人回到“帝国教会”方面去，他们受到教会决策会的认证和聘请。这大部分是因为社会和家庭的压力，特别是那些家庭背景很好的人。迪特里希虽不认同他们的做法，但却可以理解他们。因为他对自己的特权相当了解：利用他的社会关系和家庭背景，他无论如何都可以找到工作，但对大部分“非法的”助理牧师而言，情况却并非如此。

有一次，迪特里希对妹妹苏珊娜说：他也想经验一次“安全感的失落”，否则便不能真正了解其他人的感觉。现在他尝试至少去参与学生的“不安全感”，并且

① 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 595 页。

② 阿尔布雷希特·舍恩赫尔的话，摘自齐默尔曼编《与朋霍费尔相遇》第 101 页。

③ 阿尔布雷希特·舍恩赫尔的话，摘自齐默尔曼编《与朋霍费尔相遇》第 101 页。

有特权的“自由教会”路线。

真正的教会在哪里？这个问题现在愈发明显。对那些神学学生而言，情况看起来如这段话所说：“我们这些年轻的弟兄，与那些接受帝国教会职位或担任公职的人，到底有哪些不同呢？使我们与他们相互区别的，究竟是良心的决定，还是神的话语？”<sup>①</sup>

对于这个问题，“教会领导”从未作出过明确的回答。迪特里希却给予明确回答，他的论点是：教会和非教会不可能彼此有关系。如果“认信教会”不愿背叛和出卖自己，它就必须坚持巴门与达连两个教会大会的决议；而这就意味着，要明确地从帝国教会决策会分离出来，并且不接受被国家收并的任何新的尝试。在这种情况下，有一句话出现在一篇关于“教会团契”的文章中：“谁蓄意脱离‘认信教会’，谁就是脱离拯救！”<sup>②</sup> 这句话被传开了，甚至被简化成：“谁没有红卡，谁就上不了天堂！”

这就引起了极大的骚动，迪特里希被指责为传授了错误的空想的天主教教义。他自己对此倒是处之泰然——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说：“巴门宣言若不是一种对主耶稣的真实信仰，经由圣灵的工作而成，并且有建立教会和分裂教会的特性，那么就是少数神学家不需

① 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 576 页。

② 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 590 页。





用他的特权来帮助他们。他自掏腰包让一个学生从医院的三级病房移到二级病房；他为第一批在认信运动及与国家尖锐对峙中的受迫害者筹措资金；他将薪水分给那些在工作上支持他的学生。但是他个人最切身的牺牲，就是决定放弃婚姻，结束与一位女性的交往。对他来说，她曾是他生命中极为重要的一个人，在“正常的”情况下，他们是会结婚的。

关于迪特里希生活的这一面一直鲜为人知。这是因为，曾经有两位与迪特里希有较密切关系的女性，希望能在他被公开和发表的个人传记中，保留一点她们个人的隐私。

第二个原因是，在这个非常时期，本来就无法追求个人幸福。剧作家布莱希特曾经流亡丹麦3年，之后与他的太太、两个孩子及两个特别受到威胁的女性朋友和女同事，从一个国家逃亡另一个国家，以逃避希特勒的军队。针对这段期间的生活，他描述道：

我在战火中吃我的饭。我躺卧在谋杀者之间睡觉，无心关照我的爱，并且我没有耐心观看自然。时间就这样流逝，决定我在世上存留的岁月……<sup>①</sup>

迪特里希这个做事不肯半途而废的人，最后决定在

<sup>①</sup> 贝托特·布莱希特：《致后辈》，法兰克福/缅甸，1967年，第724页。

他的神学班被视为非法之后继续留下来，全心全意地为他的学生而活着。他也注意到，若他还得关照妻子和家庭，就会使那个不妥协的坚持变得更沉重。然而，他自己和那些未来的牧师，在成立地下教会时所要求的正是不妥协。他不希望成为被敲诈的对象，而且不期望这一生一直生活在一个缺乏保障的婚约关系中——没有人愿意承受这种不安全的状况。另一方面，迪特里希的想法可说是非常小资产阶级的：一个男人有稳定的生活并可以养活一个家庭时，才可以娶妻。

但是他却从未确认过，他现在告别的那位女性，是否曾对他有过如此期待。其实他们的这一段关系，与迪特里希原来想象和表达的“女性应扮演男人的助手”这一角色完全不同。这是典型的保守教会的男性观点。不同寻常的是，她是一位女性神学家，有博士学位，并且在“认信教会”里相当活跃。在那个时代，大部分男性神学家基本上并不赞同“女神学家担任教牧职位”，迪特里希很明显地不是如此。他们的友谊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神学的讨论和教会的行动。他们一起在“认信教会”的号召上签名并努力广泛传播，对于教会中关于男性和女性权力的辩论，对他们而言便是无足轻重的。“在教会争战的期间，‘认信教会’里很少反映出男性与女性的差别，大家似乎休戚与共地处在同一场战争中，



特·舍恩赫尔说。在迪特里希身上，人们看到一个言行一致的人的形象。

然而，在此过程中，迪特里希这位未来的“圣者”确实也有他的困难之处。后来他才清楚，带着这种想“成圣”的心情，他那固有的自恋再度从后门走进来，孤寂、自我怀疑和沮丧也跟随着他。过去那种上等市民阶级对与自己出身不同的人采取的疏离态度，再度困扰着他。更糟糕的是：许多学生根本不想遵守他对“圣徒团契”的要求，他们偏偏要在圣灵降临节的下午，到最近的乡村酒馆去跳舞，并且完全不理会对反感的“朋霍费尔弟兄”。

当他开始与一位学生缔结紧密的友谊时，他的困境才开始得到缓解。这段友谊陪他度过了接下来的那一年。艾伯哈特·贝特格对于常常令人感到难以接近的迪特里希而言，是一个理想的互补对象。同辈回忆说：贝特格是一个具有吸引人的生命热力的人。他并非出自有名望的资产阶级，但他可以作为校长先生与学生之间的中介人。他的性格与迪特里希不同，但在行事方式上却同样坚定。

后来，在提格监狱的牢房里，迪特里希用一种密码般的方式，在一篇未完成的小说中描述了这段友谊的开始和对他的意义：“我想说，我们两人因为彼此认识而成为凡人……最具决定性的原因，并不是我们两人都在

并且站在同一阵线上，互相支持——这是比较迫切需要的。”<sup>①</sup>

这种休戚相关的感觉克服了长期分离的艰难，因为迪特里希基本上只是“某些时候”偶尔在柏林，他们的交往基本上是通过书信进行，直到政治和教会的情势导致迪特里希作出那个决定，使得两人由此分道扬镳。他们约定将所有的来往书信销毁，以便让彼此未来都有充分自由。只有一封告别的书信被保留下来，其中迪特里希用一种少有的坦率答复了关于他自己的事：他知道有关他的那些说法，即迪特里希的论战带有自恋，通过登山宝训使人看出他的求知欲。他也清楚这个新的尝试伴随着多少的自我批判，就像一种“神圣生活”所导致。“呼召临到我。神要在这里面做什么？我不知道。在工作中，我越来越显得不顺服也不诚实。我每天都突然有这种感觉。但是这条路必须持续下去。也许它不需要多久时间……”<sup>②</sup>

接下来的时间对迪特里希而言，在芬根瓦的工作和团契，便是真实的生活内容。当他全心全意集中于对他而言是真正重要的事时，他吸引了附近的人们的注意。“这个年轻人渴慕浑然一体的生命和模范”<sup>③</sup>，阿尔布雷希

① 1989年11月30日伊丽莎白特·波恩坎博士致本文作者书信。

② 《1936年1月27日书信》，摘自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249页。

③ 舍恩赫尔的话，摘自齐默尔曼编《与朋霍费尔相遇》第99页。

## 第十三章

## 为犹太人出声者，才可高唱圣歌！

1936 — 1938

迪特里希 30 岁的生日，是与芬根瓦的朋友和学生共同度过的。他讲述了他在墨西哥、西班牙、伦敦和纽约的故事，旅游热情油然而起，他还希望他能有一个团体的异国之旅。不久之后，迪特里希就有机会进行旅行的准备了：教牧人员讲习班受到瑞典教会邀请，在 3 月 1 日至 10 日做一趟学习之旅。对于那些学员而言，在刚刚经历他们的神学课程被迫转入地下的巨大压力的考验之后，这次瑞典之行的确对他们是很大的鼓励。“我们对这种明确的表态感到惊喜，人们会因此看见我们的立场并了解我们的行为；更令我们惊讶的是，他们秉持着什么样的明确态度，使得那些（瑞典）路德宗的教授们

以半神的方式独自生活在世界上的要求失败了，而是我们在与其他人的团契生活中胜利了。”<sup>①</sup>

迪特里希与艾伯哈特一起尝试创造一种新的社会形式；他们与其他三位学生建立起一个弟兄之家——一种基督教共有财产的团体方式，其会员的义务是：在世上保持贫困、共享财产、丧失公权力、随时投入到基督所要求的事业中。迪特里希在他的著作《追随基督》(Nachfolge) 中提到：“耶稣基督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未行到尽头。基督仍继续活在追随者的生命中。”<sup>②</sup>

这个追随者并不是“孤独的英雄”，他将从与其他人的团结中得到力量，这是迪特里希从芬根瓦实验中获得的重要经验。

当第一批非法的助理牧师开始宣道工作，在不同地方广泛地组织认信团契时，迪特里希开始忙碌于密集的拜访和关怀中。没有一个致力于体现基督真实的教会，或一个将自己奉献于未知命运的人，会被孤独地遗忘。当国家施加于认信运动的压力日益增强时，艾伯哈特·贝特格在芬根瓦写了一封代祷信：“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要坚定地承诺，当认信教会之路受到的攻击变得太强时，我们永远可以向那位坚定地站在兄弟会一边的弟兄，或向芬根瓦求助。这是我们亏欠于我们弟兄的。”<sup>③</sup>

① 朋霍费尔：《提格残篇》，第 158 页。

② 朋霍费尔：《追随基督》，慕尼黑，1988 第 17 版，第 281 页。

③ 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 650 页。



朋霍费尔（三排左一）与芬根瓦教会传道人讲习班的学生，1936年

要将我们路德宗的（帝国教会）主教拒之于门外。”<sup>①</sup>

这样的支持正是芬根瓦需要的！因为在奥尹豪森的宗教会议，为了对抗坚持“认信教会”精神的“兄弟会”，而成立了一个“德国福音路德会委员会”（Rat der Evangelisch-Lutherischen Kirche in Deutschland），他们与帝国教会决策会合作，并借此想要挽回信徒，想得到国家教会的特权。芬根瓦的学生正想与这样的特权划清界限：“人们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在资产阶级的生活中当基督徒；今日我们承认基督是主，因此否认世界上的其他神明。”<sup>②</sup>

① 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577页。

② 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578页。

德国的神学家在国外将他们的立场表达得如此清楚，这使得教会的外交部和赫克尔主教得再度拟定计划。“管理教会事务的帝国和普鲁士部门以及教会外交部，警告大家提防朋霍费尔牧师，因为他的影响无益于德国人……关于他在瑞典的表现，我衷心地请求你们提供一份报告。”<sup>①</sup> 德国外交部在写给斯德哥尔摩的德国公使馆的信中这样说。他们得到了赫克尔主教的首肯，这位主教想利用朋霍费尔在瑞典的表现，摆脱那个令人不快的普世教会宠儿。

“因为反对他的声浪可能会再度升高，人们指责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是国家的敌人，因此我们决定：邦教会决策会将采取明确的措施，与他保持距离，不再将德国的神学学生交给他教导。”<sup>②</sup> 这项指控使得迪特里希无法在德国的任何大学执教，包括他常常讲课的柏林神学院。但这一出卖的行为，并不妨碍后来联邦德国的福音教会将赫克尔任命为管理遭俄军驱逐而离开东普鲁士的人的主教（Bischof für die Vertriebenen）。

迪特里希在芬根瓦的工作暂时没有被波及，在那里他可以躲过国家和教会决策会的势力。但是，当他发表有关众教会联合团契的著名文章时，“认信教会”就因他的关系受到攻击。迪特里希写信给埃尔温·苏茨说：

① 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579页。

② 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581页。



稣的诫命？他的答案是：通过不妥协的努力遵循登山宝训来生活。对他来说，这并不意味退回到基督徒的隔离社区，或远离世界现实的个人虔敬生活，而是设立一个与世不容、带有反抗意识的教会，并且去做教会该做的事。天主教神学家里摩·莱纳·佩特斯（Riemo Rainer Paters）强调，如果只从当时的政治角度去断章取义，就会误解《追随基督》的内容。“追随基督意指一个教会与政治的计划。这本书不是描写政治，而是鼓舞和推动政治的。”<sup>①</sup>

这个有反抗意识的教会受到排斥，却使芬根瓦团契的团结得以加强。那种彼此共享财产、共同生活的形式，并不意味着修道院式的与世隔离，而是要求加强内部的凝聚力，并且服务于外界。这种生活形式尤其会加强他们准备抗议的行动。团契生活本身不是目的，也不像其他修道团体那样企图逃避现实。当时的确出现过这样一些修道团体，欲通过倒退至新的礼拜仪式、宗教美学、冥想和诗歌来克服教会政策的困境。迪特里希反对他们的做法，他认为：“只有为犹太人发出呼喊的，才可以高唱圣歌！”<sup>②</sup>

在德国，并没有多少基督徒愿意为犹太人呐喊。大

<sup>①</sup> 提摩·莱纳·彼得斯：《极端主义及妥协的彼岸》，摘自艾伯哈特·贝特格对《追随基督》的后序。

<sup>②</sup> 艾伯哈特·贝特格、蕾娜特·贝特格、克里斯蒂安·格雷默斯编：《朋霍费尔》，第171页。

“因为我的一篇文章，我变成了我们这边众所辱骂的对象。最近甚至有一个路德宗的团体提议，要我辞去‘认信教会’的职务。这事以后就会显明，这就是那只兽——在启示录里出现的神的对头——将受到爱慕偶像之人的朝拜，并且披戴着被扭曲的路德宗信徒的外表……”<sup>①</sup>

芬根瓦的人渐渐成为“认信教会”里的先锋；有时教会觉得这些极端的年轻人和他们的“头目”实在是负担。但是，日渐加重的外界压力才是决定性的因素。

这便是迪特里希的名著《追随基督》出版的背景。一个拒绝路德宗立场的气氛正在形成，这个立场规定教会要宣告神施行怜悯的“纯粹福音”，以及抛弃世界的操练。“廉价的恩典是教会的死敌……廉价的货品，被贱价抛售的宽恕……是不用付代价的恩典、不求代价的恩典……在这样的教会中，世界的罪恶找到了掩护。这正是它不感到后悔并且不愿从其中脱离的罪恶……因为恩典可以承担一切，因此一切可以照旧进行……没有什么比将路德的行动予以误读更加致命的了，人们误解路德所发现的纯正恩典福音，可以向世界宣告说：人不必在这个世界上顺服耶稣的诫命。”<sup>②</sup>

迪特里希借此开始论述他的主题：应该怎样顺服耶

<sup>①</sup> 《1936年10月24日书信》，摘自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591—560页。

<sup>②</sup> 朋霍费尔：《追随基督》，第13—14页。

题的立场”<sup>①</sup>，虽然他们为犹太人的宣教和洗礼提出过辩护，但是他们也认为，镇压国家民族之“仇敌”及“害虫”的犹太政策是有道理的。更明显的是，在帝国教会委员会统一后，有些“温和”的基督徒便作出立场声明：“我们福音教会没有犹太人，比任何其他教会都还干净。”<sup>②</sup> 符藤堡邦主教乌姆 1937 年在斯图加特的奉献堂（Stuttgarter Stiftskirche）如此宣告。

因此，教会争战的前线冲突再度升温，那些信仰前卫的激进人士现在不只是在社会上，甚至在他们的教会中也处于劣势地位。但也有不少独立的基督徒，在没有教会领导和祝福的情况下，仍然凭良知办事，分担了他们的任务。当他们隐藏犹太朋友、支持受政治迫害的人，或者在崇拜里为被捕的牧师祷告时，他们的行动完全得不到背后的支持或教会的保护。而这个激进的宗教运动，也渐渐成为国家镇压的目标。

“认信教会”对国家的镇压反抗甚弱，他们也没有尽力去反对迫害犹太人的事。柏林的策伦多夫区的“内在宣教会”<sup>③</sup> 主管马嘉·穆塞尔（Marga Meusel）提醒人们，应与“非雅利安”的基督徒团结共处，她徒劳地呼吁：“教会怎么有办法一再欢乐地做出支持纳粹国家

① 恩斯特·克雷，纪录片《“纯犹太人”——新教徒与追捕犹太人》，1989年9月20日纪录于FR之内（第218号）。

② 同上。

③ “内在宣教会”是当时德国的基督教社工联合会。——译者

部分犹太裔牧师都准备离开他们的现有职位，其中一位是恩斯特·弗莱陶（Ernst Flatow）。莱茵省福音教会监理会在评定他的状况时说：“弗莱陶在外表和本质上，尤其是他的眼睛，看起来具有犹太种族特有的外表特征，因此不可以担任教会的工作。”<sup>①</sup> 1943年，他在集中营里失去踪迹。

纳粹从一开始就毫不犹豫地进行对德国犹太人的作战计划。1935年，《纽伦堡种族法案》（Nurnberger Rassegesetze）使得犹太人变成没有权利的公民，在电影院、游泳池、餐厅和大学里，四处挂着“不欢迎犹太人”的牌子；“异族婚姻”被禁止，雅利安人和犹太人之间的爱情会被拆散。迪特里希的双胞胎妹妹莎宾娜嫁给了一个犹太人，她叙述说：“有一段时间，每一次的门铃响声都会使我神经绷紧，因为将近晚上时常会有犹太人‘被访’，据说其中有些是身着睡衣被驱赶到街头，有些是被接走的……人们根本就像失去法律保护一样。”<sup>②</sup>

同时，比勒费尔德（Bielefeld）的国家警察局的报告指出，认信教会的领导人基本上“赞同国家对犹太问

① 汉斯·普罗林豪尔：《出自活人之地——十字架及卍字架下的悲惨故事》，新教会—维鲁因，1983年，第182页。

② 莱布贺兹·朋霍费尔：《过去》，第107页。

爆炸。

没有人知道那份秘密文件是怎么流到国外的。但是每一个在宗教运动里的人，都知道公开这份文件的后果：整个教会马上会被牵扯上“叛国”的罪名。“路德教会委员会”与一直不妥协的兄弟会终于决裂；而兄弟会的人在准备反抗的过程中，除了害怕被怀疑为一群“没有祖国的臭小子”之外，什么都不怕。他们匆忙地澄清自己与外国新闻界得到的专题报告的关系。

怀疑马上落到一个人身上，只有他保留有两份文件副本。弗里德里克·韦斯勒（Friedrich Weisler），他是一个学法律的博士生，并且是犹太出身的福音教会基督徒。纳粹曾将以前的地方法院主管驱逐。紧急教会执委会便将他聘任为法律顾问，他现在则是临时教会领导组织的文事处主任，对纳粹而言，他正是最理想的替罪羊。因为结果证实，他至少间接地牵涉这件事，即使他是自己人，也无法再保住他。韦斯勒在被监禁之后，临时教会领导组织将他开除，真的把他当罪犯看待了。

事情的真相后来渐渐明朗。迪特里希的两个学生后来将整个事件慢慢查清：真正的肇事者是助理牧师威尔纳·科克（Werner Koch），他长久以来已经和牧师恩斯特·蒂利希（Ernst Tillich）一起接管了“认信运动”的非正式新闻工作，他利用韦斯勒将文件借给他翻阅的一个晚上，自行将这篇文章抄写了下来。事实上，他只

的信仰宣告呢？这种宣告是政治性的，教会这样做就是敌视部分教友的生命。”<sup>①</sup>

只有“认信教会”里那些还紧紧攀住紧急教会同盟的激进派，决定要表白立场。这将是唯一正式的教会宣告，他们控告纳粹国家损害人权。这篇宣言将带来教会争战中第一个死亡事件。

在宣言的第二稿上，迪特里希·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的笔迹清楚可见。他除了谴责德国基督徒在公共生活失去见证外，还论及法律的不确定、国家专制和反犹太主义：“当基督徒被压迫在纳粹的世界观下，被强迫接受反犹太主义、被逼着仇恨犹太人的时候，他们能以基督‘要爱邻舍如同自己’的诫命，与之相对抗。”他的语气非常小心，整篇文章像是一篇专题报告，并且应该只呈给希特勒。“我们在这篇文章里要告诉‘领袖’的事情，都是就我们的职责而言必须告知的。而教会是在神的手中。”

众人都想先看看“领袖”的反应，再将专题报告的一部分通过讲坛向大众宣告。但希特勒一直没有作出反应，而临时教会的领导也不想将他们与国家的冲突由自己一方开始扩大。直到1936年7月23日，这篇神学文献才在《巴塞尔新闻报》发表，其效果犹如炸弹在教会里

<sup>①</sup> 恩斯特·克雷，纪录片《“纯犹太人”——新教徒与追捕犹太人》，1989年9月20日纪录于FR之内（第218号）。



被准许拟出一份短短的公报，然后就得将之归还。当这份文献快被遗忘时，蒂利希却将原文一字一句都公布了出来。三个月之后，韦斯勒、蒂利希和科克都被拘捕，1937年2月被送进了萨赫森豪森（Sachsenhausen）的集中营。

一个星期后，弗里德里克·韦斯勒就死了。身为一个“纯正的犹太人”，他一开始就与其他两个人分开关押，并且是被送进一个恶名昭彰的监狱里。被送到那里的人，很少有人能活着出来。韦斯勒遭受纳粹党卫队员虐待酷刑达七天之久，最后死于区域领导蔡德勒（Zeidler）的长靴之下。第一个为认信教会牺牲的，就是这个犹太人。

今天我们很难去论断“认信教会”的矛盾政策。他们徘徊于对国家的忠诚与抗议的性质之间，但他们也有自己追求的目标：在极权统治下为教会争取生存空间。如果把他们的情况理想化，就像那些不加分辨的批评一样不恰当。当时除了在“韦斯勒事件”上教会完全失败之外，他们还是有团结之声与抗议行动的。

威尔纳·科克的未婚妻从柏林给她父母的信中写道：“韦斯勒的追思礼拜是由牧师汉斯·阿思穆森（Hans Asmussen）带领的。此前盖世太保曾问道：‘你们想要示威抗议吗？’在很多穿着长袍的牧师主持葬礼之后，坟墓马上就被拍照。党卫队的人看守墓地达14

日之久（他们想避免人开棺验尸，以便遮掩真正的死因）。“认信教会”的牧师们在讲道时一直宣称，韦斯勒在2月13日健康地走进集中营，却于19日死在那里。大家应该为他的太太和两个小孩代祷……请不要销毁这封信——但愿我们很快就可以从威尔纳那里得到消息。”<sup>①</sup>

在这期间，威尔纳正在萨赫森豪森的刑事队里为自己的生存而战。集中营是一个完全不讲法律的地方，据称这里是为了“再教育”，但实际上是“通过工作毁掉一个人”。单单在萨赫森豪森，就有上千人因为生病、营养不良同时又负担沉重的体力劳动而病倒。党卫队专横的刑讯和谋杀，更使无数人惨遭杀害。威尔纳·科克回忆说：“在移动到集中营大门时，我听到两个党卫队的人在我后面耳语：‘今天轮到那个教士了！’当我们几乎到达那个工作位置的时候，嘶吼声已经开始：‘牧师，这头懒惰的猪！必须让他好好休息一下。卧倒！把头压在地上！’他们用眼光示意两个穿绿衣服的罪犯过来，然后命令他们把大量的沙土铲到我头上。这些绿衣人是刑事罪犯，他们的囚服上绣有绿色的标志。我心里只想：‘原来人死的时候是这个样子。’我尝试着不大声喊叫、不挣扎，也完全不祷告。我就任凭那些事情在我身

<sup>①</sup> 科克：《我们应该继续观察K吗？》，第182—183页。



在我信任的朋友中，再没有人像迪特里希的问话这样具有明确的目的的了。在我的每个回答之后，他都会陷入沉默，有时这样的沉默达几分钟之久，然后他才再提出另一个问题。我感觉，这些事情在他心里造成了很大的波动。我知道，他在用尽心力尝试想象：如果他自己处在同样的情况下，他会怎样做。他也确信，他将会遭遇这种情况！<sup>①</sup>

1938年12月，形势对教会中有反抗意识的人愈来愈不利。长久以来，不再只是安置毕业生的事令人头痛。有27个在芬根瓦就读过的学员，都曾经或长或短地被关进监狱里，因为他们在宗教团契里讲道时，都做了批判性的宣告。

1937年夏天，反对派教会的领导中心被击溃。马丁·尼默勒被捕；他逃过了被关进萨赫森豪森集中营的劫难，而被严格地单独拘禁起来，成为希特勒的“个人囚犯”。他后来以自我批判的方式，描写他和他的教会在“第三帝国”开始兴起的前几年的行为：“当他们拘捕共产党员时，我保持沉默，反正我不是共产党员。当他们捉拿工会会员时，我没有抗议，因为我也不是工会会员。当我自己也成为被缉捕的一员时，也就再也没有可以为我抗议的人了。”

<sup>①</sup> 科克：《我们应该继续观察K吗？》，第246页。

上发生……”<sup>①</sup> 威尔纳·科克好像经过一场梦魇一样。有一个党卫队的冲锋队长突然在最后一刻跑进来，他们接到命令不能伤害我们这些牧师，因为“韦斯勒事件”引起了很大的骚动。

威尔纳·科克有将近两年的时间是在萨赫森豪森度过的。能够逃过这一劫，他得要感谢他的共产党难友的团结一致，他们在被囚禁的那些年间，在集中营里成立一些非法的救济组织。科克和许多“认信运动”的人一样，对左派有成见。以前几乎所有的人都很怕染“红”，并且尽量克制自己不与这些人有任何交往。而现在，这些人却变得很重要，并且他们往往正是“救命天使”，友谊由此产生，这是两边的人以前都没有想过的。威尔纳·科克可能就需要这种帮助，因为“认信教会”与他保持着距离——因此此前他在没有任何教会的授权下，就采取了政治行动。

但是芬根瓦的人并没有与他保持距离。他们帮助他和他的未婚妻，并且不只是给他们以精神支持。当他在1938年12月被释放时，迪特里希为他安排一次休养假期，住在波美拉尼亚省一位大庄园地主家里。在那漫长的开车旅途中，迪特里希一直倾听着他的朋友娓娓道来的在德国集中营里发生的一切。

<sup>①</sup> 科克：《我们应该继续观察K吗？》，第197—198页。

莎宾娜和格哈德·莱布贺兹沉重地决定要逃到英国。他们的女儿玛莉安娜回忆道：“9月9日，哥廷根的早晨阳光灿烂。突然间，母亲匆忙地走进我们的卧房，说：‘我们要去威斯巴登（Wiesbaden），你们今天不要去学校了。’然后对我们的



朋霍费尔的女婿汉斯·冯·杜南义

保姆说：‘拜托，请帮两个小孩多穿几件羊毛衣……’我马上知道，一定有什么严重的事情发生了。我父母从来都没去过威斯巴登，我们也从来没穿过两件以上的毛衣。我心想：我们要离开这里了。我们只能带走车子装得下的东西。因为在国外我们没有钱，所以过边界时能多带走的每一件毛衣，都非常重要。”<sup>①</sup>

因此，对莱布贺兹一家而言，一段辛苦的流亡生活在伦敦开始了。11月9日，德国所有的犹太教堂都被放火焚烧。在哥廷根，报纸刊登了这样一则新闻：“不能

<sup>①</sup> 莱布贺兹·朋霍费尔：《过去》，第113—114页。

事实上，“认信教会”的组织是当时唯一还存在且不受国家影响的机构。因此在1937年8月29日，纳粹政府下达对“认信教会”的禁令时，芬根瓦被盖世太保关闭。此时迪特里希递交给同样被解散的弟兄之家的弟兄们一本他刚出版的《追随基督》，并在上面献辞：“我为在芬根瓦忠实团契的两年半时间而感谢你。希望我们这条路将成为许多喜乐的追随者所走的路。”

芬根瓦的工作仍然继续着。迪特里希和他亲密的工作伙伴已经蓄势待发，他们为秘密进行的神学人教育训练设计方针，尽管这仍是违法的，并且，他们将与教会内绝大多数准备向纳粹国家靠拢的势力决裂。“认信教会”不再是一个机构，现在只剩下它的会员，并且这些人将把他们的生命当做赌注。

德国犹太人遭受的危险，以前所未有的情况继续加剧。迪特里希的女婿汉斯·冯·杜南义利用他在司法部工作的关系，警告那些在政治上和种族上被追捕的人，希望他们逃离即将对他们极为不利的环境，他发出警报说：不久之后，犹太公民的护照上将被标上“J”的字样，旅行会变得非常困难，并且边界可能会被关闭，因为希特勒在吞并奥地利之后，更加强了兼并苏台德区（sudetendeutsche Gebiete）捷克领土的企图。每一天，战争的危机都在加剧，而那些反对所谓“敌对德意志帝国的国际犹太人阴谋”的宣传，更是带来极大的威胁。



朋霍费尔与双胞胎妹妹莎宾娜在伦敦

体谅这件事的人，没有能力了解民族的心声。我们看见复仇成癮的犹太神明的庙宇，在火中烧成灰烬……鉴于最近的经验，我们的城市也不允许有任何东西令人记起这个种族的存在，他们在世界各民族中比瘟疫蔓延还可怕。”<sup>①</sup>

“认信教会”对大屠杀保持了沉默，而纳粹则称之为“帝国水晶夜”（Reichskristallnacht）。从帝国教会所得到的反正一定是掌声。迪特里希在《圣经·诗篇》里的下列两个句子下画了线：“他们就在遍地把神的会所都烧毁了”以及“再也没有先知说话了”，旁边的日期是：1938年11月9日。

两年之后，迪特里希在一份没有机会实行的教会认

<sup>①</sup> 莱布贺兹·朋霍费尔：《过去》，第122页。

罪宣言草稿中写道：“教会曾经在必须嘶喊的时候封缄其口……教会曾经看着惨无人道的暴力蛮横地施行，无数的无辜者、受压迫者承受着身体和灵魂上的痛苦；曾经看着仇恨与谋杀横行，而没有发出她的声音，没有找出可以赶紧帮助他们的方法。教会是有罪的，她愧对耶稣基督里那些孱弱又无自卫能力的弟兄的生命。”<sup>①</sup>



<sup>①</sup> 迪特里希·朋霍费尔：《伦理学》，慕尼黑，1988第12版，第121—122页。

## 第十四章

## 趁冬天未到时前来！

1939

协和神学院有一个特别的房间，给来自国内外的客座讲师居住，它被称为“先知室”（the prophet's chamber）。1939年，先后有四个神学家住过这里，他们的国家在战争中是互相武装敌对的：日本、美国、加拿大和德国。

这个德国人就是迪特里希·朋霍费尔。他在先知室度过了一生中最困难、最受折磨的一个星期。1939年6月，他搬进那里，打算在新学期中履行教学的契约。但7月份一开始他就再度收拾起行李，准备搭乘开战前的最后一艘船回德国去。后来有人在先知室里发现一大堆烟蒂及无法辨读的笔记，另外也可以从一本记录这个星期的日记里得知，迪特里希是如何在与折磨自己的思想和感觉争战。

关于内心所受到的折磨，他无法告诉其他人。对那些美国朋友而言，事情很简单，他们很高兴四面楚歌的迪特里希能及时从德国逃出来。他们甚至安排好了一切，使他可以在美国生活和工作一段时间。许多其他的政治或种族受迫害者，苦苦地等待着一张签证和居留许可，却一直无法得到，所以没有人了解，为什么迪特里希偏偏不想待在这个“自由世界”，而想再次回到德国去。所以他必须解决他内心的这个冲突，并且自己做出决定。

他刚对过去三年德国“教会争战”<sup>①</sup>做出总结，其结论是：应该离开祖国。这才是理智的决定，因为不只是他个人的情况越来越危急。自1933年以来，他的激进信仰对“认信教会”而言，一直是一个危险的因素。一些在“认信教会”里的领导人物将因他的离去而松一口气，因为那个令人不快的反对者终于消失了。

1939年4月20日，“领袖（希特勒）的生日”被铺天盖地加以庆祝，连教会也发出了忠诚顺服的宣言。甚至代表“认信教会”诉求的“年轻的教会”，也向“领袖的50岁诞辰”致意：“领袖可以通过自己强大的力量获得成功，他可以用他内在的眼睛在旧世界里看见新气象，并强迫其实现；很明显地，历史篇章有少数几页是预留给新时代新人中的最后一位伟人的。德国在民族世

<sup>①</sup> 指“认信教会”与国家教会之间的对抗。——译者



界的使命，被一只强壮坚实的手重新置于历史的天平上……我们请求上帝，赐福给领袖。”

一个特别的生日礼物，早在一年前就由教会部聘任的教会文事处主任威纳想出：所有福音教会的牧师都应该向希特勒宣誓表示忠诚。在官方的法律和命令中记载：“鉴于只有对领袖、民族和国家保持忠诚始终不渝的公务人员，才可以在教会工作，将有如下规定：欲从事宗教工作的人，必须经由以下的誓言加强其忠诚之义务：‘我发誓：我将效忠和顺服德意志帝国和民族之领袖阿道夫·希特勒……’”

主教萨泽（Sasse）从“德国基督徒”的大本营图林根发言道：“在伟大的历史时刻里，图林根福音教会的全体牧师都顺从一个内部的命令，心悦诚服地向领袖和国家宣誓忠诚……一个上帝、一个信仰的顺服。愿您平安，我的领袖！”<sup>①</sup>同时，在瓦特堡上的十字架，也被一个巨大闪亮的“卍”符号取代。

兄弟会和“认信教会”的牧师对这种赞美纳粹政权的姿态深感不以为然，但是他们没有力量去反对政府对教会“效忠誓愿”的要求，甚至后来它还明文规定：“拒绝宣誓效忠的人要予以开除。”其企图非常明显：这个条文可以将“认信教会”里反叛的余党过滤出来，将其隔离并粉碎。

<sup>①</sup> 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 676 页。

例外的是，此次这些非法的助理牧师却很“幸运”。他们反正不属于教会机构，就像他们的老师迪特里希·朋霍费尔一样。他们当然拒绝宣誓，因此引起了其同事对他们的嫌恶。

“认信教会”的领导组织实际上陷入了困难中。在神学上，众人对拒绝宣誓的认识一致，但是在财政方面却介入了教会政策。兄弟会紧急教会执政会的财政截至当时只是在苦撑着，因为担任公务的“认信教会”牧师仍继续由教会机构支付薪金，解雇公职牧师的社会后果，不是兄弟会教会经济上可以负担的。因此，他们让大家自由决定是否宣誓。

卡尔·巴特在巴塞尔写道：“这事可能、应该、必定失败吗？从以前到现在，难道真的在你们当中没有人可以走向单纯的正道上吗？难道没有人挑战你们要你们不要将‘认信教会’的诚信用这种可怕的方式做赌注吗？”<sup>①</sup>

迪特里希与卡尔·巴特一样愤怒。对他而言，让大家自由决定是否宣誓，不啻是对那些年轻的非法牧师当头棒喝，因为他们刚才痛下决心，拒绝“正式牧师”的职务。他们与少数其他牧师和兄弟会建立了“认信教会”中最后一个“坚硬核心”，因为他们尊重达连认信教会大会的决议，坚持一个独立于国家的紧急教会执政

<sup>①</sup> 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 679 页。



杜阿德·布洛克 (Eduard Block) 的助理牧师职位掩护下，他在施劳威 (Schlawe) 再度开始讲课。这些助理牧师跟着信仰忠贞的牧师工作，并且偷偷地在相当原始的条件下“聚集起来”，在西古茨霍夫 (Sigurdshof) ——波罗的海岸边的一个空旷庄园——接受训练教育。煤炭、煤油和伙食常常只有两天的储备。通常迪特里希会固定去柏林，以便提供“聚集的助理牧师们”所需的最新资料和粮食。虽然有这么多的限制，但在助理牧师们的回忆里，却是一种“宽裕的生活风格”，有溜冰、滑雪、文学，以及当煤油用尽时，在烛光下的游戏和音乐。但是这一切，当然不再与富裕的牧师生涯有太多关系。他们的父母都质疑，事情是否一定要发展成这个样子？迪特里希自己的双亲也不例外。莎宾娜和她的家人都已经离开这个国家，这难道还不够吗？连教会都早已准备妥协，迪特里希现在还有必要用这种方式招惹是非吗？卡尔—弗里德里克以前在政治上比小弟迪特里希还要极端，现在却警告他要顾及家人。迪特里希写信回答他说：“我很抱歉，让妈妈为此担心，且其他人也被牵连进这种不安中。让我……可以这么做，就像上百人所做的那样，我们就不会再忧虑了。教会的事情若没有牺牲是无法继续下去的……为什么人们要改变我们的想法？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要争着进监狱，但是如果事情来临，无论如何，希望那将是一个喜乐，因为值

会，以及不妥协地与“德国基督徒”分离，因此也被称为“达连人” (Dahlemiten)。他们备受批评，人们说他们迂腐，且缺乏外交能力，嘲弄他们“殉道成癖” (Martyrersucht)。迪特里希是其中最不愿妥协的人，因此遭受到双倍的攻击。如果那些受他影响而继续走非法路线的年轻神学家，在妥协之下可能有不同的选择，是不是该有人为此负责呢？并且他要求“认信教会”独立，是否破坏了既有的资源，而这些资源是人们在秩序井然的教会机构里，仍旧可以努力维护的？

迪特里希在一封写给以前芬根瓦人的代祷信中，对此进行了回答：“只为自己着想的人，是在欺骗教会团契……有人利用这样的演讲想要使我们恐惧忧虑——我们应该至少要极力拯救目前剩下的资源。我们被分化、捉拿、封锁得已经足够了——对此种论点我们必须反驳，我们对这些资源没有任何期望……我们并不将我们的心寄托在那些机构或组织上，也不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坚定相信的是：上帝将会用他奇妙的方式拯救他的话，以及用他的话拯救我们。这是我们唯一打算要坚持的资源。”<sup>①</sup>

这是一个大胆的表达。对此事认真坚持的人，会处在一个没有经济力支持的地下教会里。迪特里希对这一点十分清楚，他继续筹办非法教育训练。在区域牧师艾

<sup>①</sup> 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 690—691 页。





得做的。下个星期，我们就要再次开始了。”<sup>①</sup>

他也用同样的话请求他的学生对“这件事情”保持忠实。他写给他们的信中说，要学习再度用主祷文的第一句话祷告：“愿人称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在你之处，我们学习忘记并且少注意自己和自己的处境。如果我们一直这么重视自己的话，我们如何还能坚持得住呢？”<sup>②</sup>

迪特里希来到纽约的时候，他不能不去想这些事。现在，他处在安全的境地。“认信教会”里没有人想要留住他，但他不会就此放手，或不理会那些他过去时常鼓励要反抗的年轻神学家。从在船上起，他就写信给艾伯哈特·贝特格。1939年6月8日，他写下读经感言：“依正道行走，这是我所恳求于你们的。我家中的弟兄啊！请带着批判的眼光纪念我，我的思绪漂游在想念你们与瞻望未来之间。向所有弟兄们问好，他们现在正在进行晚祷。”<sup>③</sup>

在纽约时，他在日记中写道：“唯一的缺憾是：我想念德国和那些弟兄……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在这里……我们以前为德国弟兄们所做的那个短短的祷告，几乎将

① 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672页。

② 《1937年6月24日连环信》，摘自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657页。

③ 《1937年6月24日连环信》，摘自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731页。



朋霍费尔（中）在前往纽约的船上，1939年5月

我包围……每当想到弟兄们和宝贵的时间，这样一个无关紧要的工作实在叫人再也无法承受。对这个错误决定的自责再度迎面而来，令人几乎喘不过气来。”<sup>①</sup>

迪特里希在纽约街头狂奔数小时之久。“但愿我对自己道路的怀疑能被克服。”刚开始，美国方面的邀请看起来就像上天的旨意。迪特里希当时的处境不只在教会政策方面相当危险，鉴于战争爆发的危险，他在审慎考虑下拒绝加入希特勒的军队，因而引起了冲突，这个冲突似乎不是家庭或“认信教会”可以化解的。

事实上，在开战前就有两个拒绝战事的人，他们是

① 《1937年6月24日连环信》，摘自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657页。

将不只是为我们而战，他也是为耶稣的教会而战，因为教会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笼罩下，只会做出可笑和毁灭的事。”<sup>①</sup>

“认信教会”的领导阶层马上就与他们过去的教会之父卡尔·巴特保持距离，反对他“伤害祖国、具有民主意识形态的政治神学”。但这是于事无补的。

路德教会委员会（Lutherrat）成员，特别是著名的邦主教麦塞、乌姆及马拉仁斯写下签名的公开信，声称自己与抗议事件完全无关。德国通讯社报道：“帝国教会事务部以扣押全部薪水为手段，来处分违反机关纪律的人员，并予以革职处分。”

在这种情况下，“认信教会”最怕的就是在他们的领导成员中，有人拒绝当兵。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参与伟大德意志国家的美梦就会完全破碎。迪特里希了解这种情况，当他的同期学生收到征兵体检结果报告时，他尝试寻找到一条出路。由于父亲的关系，他又幸免于征召入伍。美国的邀请来得正是时候，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但是现在，迪特里希在美国却过得不快乐。“我一直以为，一个像我这种年纪、曾在国外居住多年的人，

<sup>①</sup> 《1937年6月24日连环信》，摘自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683页。

活跃的福音派基督徒，也就是“和解联盟”的赫曼·史托尔（Hermann Stohr）及马丁·高格（Martin Gauger）。这两个人都被处死了，也没有哪个教会领导愿意为他们的赦免申请书签名。相反的，许多“认信教会”的牧师却签名志愿从军，他们终于可以证明，连“认信教会”也有民族主义的思想倾向了。

唯一一次发出不同声音的尝试，是在1938年再度由临时教会领导作出的。他们举行了一次祷告礼拜，拒绝所有将战争英雄化的民族主义论调，并将战争称作神的审判。他们要求团契为和平的来临祈求，这在开战前一年就被纳粹看成是一项罪行。在黑衫军党卫队的一份报纸的第一页这样写道：“这种祷告跟信仰一点关系也没有；这是叛国的政治宣告，并且是在命运存亡关头，对民族团结一致的破坏行动。国家有义务为了民族的安全，将这些罪犯剔除。”

这个对手再度击中了福音教派基督徒的敏感问题：在“伟大的时代”里，政治化牧师的态度最令人觉得恐怖和无法了解。在这个时代里，他们称奥地利和捷克的德国人为“终于回到帝国的家中”……

当卡尔·巴特的一封信被公开时，临时教会领导简直感到完全孤立又不知所措，因为巴特在写给捷克神学家贺罗马得加（Hromadka）的信中，鼓吹捷克人当起来反抗威胁和占领：“每个起来战斗和受苦的捷克士兵，



不可能还会为如此痛苦的乡愁所折磨。”<sup>①</sup>

真正使迪特里希痛苦的，不是那种祖国情怀的乡愁。他感觉到自己不属于他所在的地方，就某种广泛的存在意义而言。自从他将生命的意义定义为“基督的追随者”之后，基督说的话对他而言，就不再是无关紧要的。

我们只要去找他在的地方。当我们不在他的地方时，我们就可能什么也不是。无论你们在那边，或我在美国工作，我们都是在他在的地方。他带我们同行。或者我已经从他在的地方偏离出来了？哪里是他为我而在的地方？<sup>②</sup>

最后一个句子清楚地显示：迪特里希并不是在拟造一个基督徒追随基督时，“应守”和“不应守”的规则。他并不认为：一个人若想离开追随的行列，就是不符合基督的精神。他只注意到自己无法离开追随的行列。在纽约，虽然他处在安全之地，但他却失去了构成他生命的所有东西。1939年6月20日，他决定返回德国。

在6月26日那天的经文当中，提到保罗要求派一位同工到他那里去：“要趁冬天未到时前来我这里！”

<sup>①</sup> 《1937年6月24日连环信》，摘自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733页。

<sup>②</sup> 《1937年6月24日连环信》，摘自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731页。

“这句话整天萦绕在我的脑海里，”迪特里希在他的日记里写道，“我们就像军人一样，暂时从战场上退下来度假，即使知道前面等待他的是什么，依然再度被迫回到战场。我们再也无法离开战场。不是因为被强迫，也不是因为我们被（上帝?!）需要，而是因为我们的生命就在那里。若我们不回到那里，我们的生命将萎缩灭绝。这不是虔信，而是一种生命活力。上帝不只通过虔诚的方式激动人，他也通过这种生命活力的方式使人动情。‘要在冬天之前来’，我牢牢记住这些话。这并不是误用经文。”<sup>①</sup>

7月7日，迪特里希搭船归去。昔日在协和的老朋友保罗·雷曼在前一天赶回纽约，他尽力试图改变这位老友的想法。一直陪伴他上船，一路上仍盼望可以挽留住他。

“前一天，保罗还尝试把我留下来。但是他没有成功，十一点半辞别。”迪特里希写道，“我一上船，心中那些对未来的困惑便得以停息。”<sup>②</sup>

<sup>①</sup> 《1937年6月24日连环信》，摘自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737页。

<sup>②</sup> 《文集汇编I》，第314页。



## 第十五章

# 邪恶的假面舞会

1940 — 1943

力阻  
狂  
轮

朋霍费尔传

158

1941年6月17日，迪特里希与他的朋友艾伯哈特·贝特格坐在波罗的海的梅孟尔（Memel）附近的一个户外咖啡座。他受那边的教会团契邀请在牧师会议上发言，当天晚上他还要带领崇拜。贝特格回忆道：“当我们在享受阳光的时候，忽然传来当地广播轰隆的军号声，有特别的通知传来：法国已经投降了……人们围绕着桌子不知怎样表达自己的情绪；他们跳跃着，有些人干脆站到椅子上。他们伸出手臂唱着‘德国、德国，威冠天下……’连我们都跟着站了起来。朋霍费尔举起手臂，摆出标准的希特勒敬礼手势，而我则精神恍惚地站在一旁。‘把你的手举高！你疯了吗？’他小声对我说，‘我们现在必须为其他的事受苦，而不是为了这个



朋霍费尔（右）与好友贝特格，1938年

敬礼手势！”<sup>①</sup>

芬根瓦的人一定会感到很惊讶，如果他们看到以前的老师变成这个样子。到目前为止，反抗行动都是以消极的小事来进行的，例如拒绝希特勒的敬礼手势，对他们来说这是事关名誉的事。迪特里希是怎么了？他改变态度了？

旧普鲁士兄弟会的会员也都会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三个星期后，朋霍费尔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对于教会的反抗行动而言，纳粹明显的历史性胜利意味着什么？后来成为柏林布兰登堡主教和联邦德国和平运动成员的库尔特·舍尔夫（Kurt Scharf）报告说：“当

<sup>①</sup> 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765页。

第十五章

邪恶的假面舞会

159

基于这些挑衅的问题，迪特里希清楚地知道，现在还能做的反抗，只有那些不太可能成功的行动。他自己很早以前就有所决定，他做的那些看来像是改变主意的事，其实都是伪装的。迪特里希已经开始从事地下活动，这些事一点儿不能让兄弟会的人知道。连兄弟会里最极端的人，现在也都断然拒绝参与反对国家领导的阴谋行动。迪特里希不能也不愿意让几乎已经停摆的“认信教会”，承受这种双重生活的负担。这一条政治密谋的路，他要在没有教会的陪伴下独行。

现在越来越常见面和说话的对象兼朋友，就是汉斯·冯·杜南义，也就是他姐姐克莉丝汀的先生。这位中年的检察官杜南义当时已经成就斐然。威玛共和国的最后几年，他在帝国司法部从事司法部长的个人顾问工作。1933年他被聘用，虽然他既不是纳粹党员，也不是纳粹侦情局（NS-Rechtswahrerbund）的成员。

他利用他的职位警告被迫受害者，并向不知情的



朋霍费尔姐姐克莉斯特尔·杜南义

时坐在我旁边的海因里希·沃格尔（Heinrich Vogel），在朋霍费尔咄咄逼人的谈论时，小声地笑着向我说：“你看那边，我们的弟兄朋霍费尔似乎相信希特勒会打赢这场仗。”<sup>①</sup>

事实上，截至当时，所有纳粹的反对者，从牧师到将军，都相信并希望这场战争会导致纳粹政权的危机，因而带来一场可能的改革。现在的形势却恰恰相反，希特勒被当做“历代以来最伟大的战场英雄”而被赞扬着。现在去攻讦他，就像是为反对运动自掘坟墓。

迪特里希问自己：当反对者在一个恶名昭彰但成就斐然的政权下处于守势时，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在这段期间他写道：“那些丰硕的成就所创造的事实是无法抹杀的；而它所破坏的也是无法再恢复的……控告者随着时光的流逝越来越沉默，成就却保留下来并确定了历史。”<sup>②</sup>

他讶异地面对着这个事实，整个德意志民族的大部分人都在为国家的成就欢呼，并且享受侵略政策的成果，而不去问谁为此付出了代价。在教会里，每次希特勒军队胜利后，都会举行感恩礼拜；士兵的腰带就像皇帝时代一样，刻着“上帝与我们同在”。现在还有谁会宣称，上帝是与失败者同在呢？

① 库尔特·舍尔夫：《反抗与和解》，斯图加特，1987年，第130页。

② 朋霍费尔：《伦理学》，第80—81页。

的秘密计划和目标传达给西方各国知道。这真的是叛国罪，从外表来看，这确实很像通敌行为。

卡尔·巴特对这些事情感到担忧，他并不知道内情。一方面，迪特里希一直都还是“认信教会”里的人，是被国家盯梢、不准教书、演讲和写作的人；另一方面，他因在反间谍机关里工作，正式被免除兵役义务，凭着军方外事人员（Devisen）的护照在欧洲各地旅行，并受德国兵役单位委托，到处进行会谈。该单位论述道：“我们也和犹太人和共产党一起工作，为什么不可以和教会牧师一起工作呢？”

在30年代，所谓的界限十分清楚。然而现在，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却变得难以区分。但迪特里希心里对此非常清楚。“亲爱的教授先生，”他写信到巴塞尔给巴特，“在一个许多事情都得仰赖信任的时代里，当人们不再彼此信任时，所有一切就都结束了。”<sup>①</sup>迪特里希一直向卡尔·巴特隐藏着他真实的角色。这理所当然是“超级秘密”。他在普世的公开场合牺牲自己的名声，以便达成有效打击纳粹政权的目的，也就是进行政治和军事的秘密策划。

不难理解，这个角色对习惯直线思考和不妥协的迪特里希来说非常吃力。这与他以前想过的“神圣生活”

<sup>①</sup> 艾伯哈特·贝特格、蕾娜特·贝特格、克里斯蒂安·格雷默斯编：《朋霍费尔》，第191页。

人解释其中的缘由。早在1933年，他就制作了一份秘密卡片，记录纳粹的罪行。在这一个“毒药柜子”（Giftschrank）里，有历年来“内行人”理解的滥权、腐化和践踏人权的罪行记录。杜南义想借此达成两件事：他希望德国军队可以取得推翻纳粹政权的政变的胜利，然后纳粹的领导团队被公开起诉，好使整个民族看清楚纳粹主义者的真实面目。盖世太保后来判决：杜南义是“策动谋杀领袖运动的主谋和精神领袖”。



朋霍费尔的姐夫杜南义

1941年，杜南义在反间谍机关的政策评论部工作，属于国防军最高指挥中心的间谍和反间谍活动的部门。他的上司是威廉·卡那里斯上校（Oberst Wilhelm Canaris），这位反间谍机关的领导人在战时为希特勒工作，但同时也与他进行斗争。在卡那里斯手下工作的人，没有一个人能不扮演这种双重角色，包括迪特里希也是这样，他在姐夫的促使下，在反间谍机关从事信使的工作。他要利用自己与世界各国的联系，将德国抵抗运动



一点也不相像。即使是自己对反抗行动的贡献，也与他之前想象的不同。从纽约回家的路上，他收到保罗·施耐德（Paul Schneider）在布亨沃尔德（Buchenwald）集中营的死讯。施耐德在布亨沃尔德的监狱里受了几个月的折磨后身亡，因为他对纳粹而言，既不是唯一受监禁的牧师，也不是什么特别的囚犯，纳粹政权自以为对教会已经够客气了。长久以来，迪特里希把“反抗至死”当做反抗行动最适合的方式。现在一切都完全不同了，真诚的信仰者加入了这场阴谋，原本渴望有神圣光环的他，如今却手染罪污。

现在连神学都不可避免地变成控制机关和现实生活的翻版。迪特里希的“实践神学”没有比这个时期更清楚了。他开始在执行信使任务的空闲期间，着手草拟符合基督教义的《伦理学》。这本书并没有完成，它主要是一些断简残篇，是未臻完美的尝试。他想通过神学的观点，思考一些新的经验和问题。其中不断出现的一个疑问是：让自己摆脱政治上的冲突，是否比让自己介入政治行为的罪恶更大？这种行为在冲突产生时不能避免罪责。“耶稣的追随者，”他这么想，“也可能出于博爱而犯罪。”

因为对耶稣而言，重要的并非新的伦理理想如何实现，也不是为了善良本身，他所为的只是对真实人类的爱，因此他可以走入人类罪恶的团体里……耶稣从自己

无私的爱和他的无罪中走出，而进入人类的罪中，将其罪揽在自己身上……想要脱离罪责的人，是在脱离担负罪愆者耶稣基督拯救的奥秘，他将无分于神的称义。他重视个人的无辜甚于该为人类负的责任，而看不到他正因此犯下无法拯救的罪……<sup>①</sup>

迪特里希谆谆地教诲他的教会，在政治冲突中所宣称的中立已不再是中立，因为他们坐视现存的暴力和充斥的不公义，没有积极为此抗争——而这种抗争可能得利用暴力。他很清楚自己在伦理方面的严肃作风，现在很难实行，其中有太多部分基本上只是他的完美理想。现在要决定的事情在于：哪一种罪更大？姑息希特勒专制或者消灭它？具体地说，凡不准备谋杀希特勒的人，不管他愿意与否，都将与大屠杀的罪有关系。

到目前为止，迪特里希已经准备向人们解释这项谋杀希特勒的行动，然而他得提早从教会里退出。他绝不怀疑任何一种暴力的使用都是罪，但他坚持基督徒在一种情况下，可以因为出于对邻舍的爱，而必须承受这个罪责。

与此同时，激烈地讨论这个问题的并不是教会，而是一大批反对希特勒政权的基督徒。

汉斯·肖勒（Hans Scholl）是慕尼黑的医学学生，

<sup>①</sup> 朋霍费尔：《伦理学》，第255—256页。

话。由于过往的经验，我们变得对人猜疑，并且必须隐瞒真相、对实情有所保留；我们由于那些难以承受的冲突变得懦弱，或者甚至可能玩世不恭。我们还有用吗？”<sup>①</sup>

很少有人可以像朋霍费尔一样，在当初那种极端的政治环境里，提出承担罪责的疑问并反映得如此确切。他代表许多被他们的教会抛弃的持不同政见的基督徒，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对以后的普世教会，以及在南非和拉丁美洲的解放教会和解放运动，他也是唯一有影响的德国新教神学家。相反的，1953年在佛罗森堡（Flossenbürg）集中营的朋霍费尔追思会中，邦主教麦塞却示威性地缺席。主教认为，朋霍费尔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而不是教会的殉教者。这种代表国家行为的立场一直持续着，并且在纳粹时代深得路德宗主教们的青睐。

其实，用心的人应该早就看出，这个国家本身具有犯罪的特质。1942年，关于“犹太问题”的“最后解决方案”在柏林万湖（Berlin-Wannsee）的会议上通过，这个方案对欧洲犹太人的谋杀甚于以往百万倍。同时，军事命令也被颁布，德国国防军被授权肃清在苏维埃共和国的公民政治反对者，并且表明苏维埃的普通市民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人。单单就驻军和剿灭政策而言，至少

<sup>①</sup> 朋霍费尔：《反抗与顺服》，第25页。

他在一座巴伐利亚的修道院图书馆，研读中古神学对谋杀暴君的态度。持不同政见的学生团体“白色玫瑰”（Weisse Rose）截至当时都在撰写和分发传单，现在他们尝试与其他持不同政见团体取得联系，并讨论参与颠覆行动的可能性，联络人就是迪特里希和他的三哥克劳斯·朋霍费尔。但这项计划并没能实现，因为在一次散发传单的行动中，这个慕尼黑团体被警察一网打尽，其成员很快就被判决处死。即使在这场争战之后，也还有大学校牧对汉斯及其妹妹苏菲·肖勒（Sophie Scholl）和他们的朋友的追思礼拜保持距离，这意味着“教会与国家的敌人和颠覆者没有任何关系”。

持不同政见的基督徒心中有一个想法，无论他们准备接受哪一项罪责，全部责任都必须完全由自己承担。“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我们就必须犯罪。”<sup>①</sup>来自卡尔·巴特在柏林谈话圈里的格特鲁德·史多文（Gertrud Stolwen）如是说。她属于一个持不同政见团体，帮助柏林的犹太人潜逃——利用假护照或偷来的粮票。她最常投靠的“认信教会”联络人就是迪特里希·朋霍费尔。

1942年底，迪特里希为自己和国防军里的同谋写了一份告白书：“我们是丑恶事迹的沉默证人，我们饱经世故，我们是装腔作势的高手，并且懂得说含义模糊的

<sup>①</sup> 格特鲁德·史多文的电视访问。



变军事领导人的态度的尝试都失败了；而没有这些尝试，政变将没有希望。他们提及在对国家领袖之外的另类忠诚，虽然杜南义的“毒药柜子”就含有足够的理由以推翻这个忠诚的宣言。克劳斯·朋霍费尔负责市民持不同政见团体之间的联络，他藐视那些高阶的军人：他们的裤管绣有红色的条纹，但是却没有市民的勇气。“那是什么？红色的喙，红色的脚，并且双足立于沼泽中？原来是德国将军。”<sup>①</sup>

这并不意味着在军队中没有反对希特勒的人。自1938年以来，就一直不断有新的政治谋杀和颠覆计划，并且到处都有杜南义的影子，后来还有克劳斯和迪特里希·朋霍费尔加入。迪特里希的家渐渐成为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中心之一，连大姐乌苏拉的丈夫鲁迪格·施莱歇尔也在这期间加入了其中。他们常常聚集在卡尔和葆拉·朋霍费尔或隔壁鲁迪格和乌苏拉的家中，有很多谈话必须用枕头把电话盖住，也常常要确认是否有仆人在门旁偷听。所有朋霍费尔家的人在这段期间都很清楚，现在没有一个人可以摆脱社会的责任。

1943年3月12日，艾伯哈特·贝特格开着卡尔·朋霍费尔的车，载着汉斯·冯·杜南义前往柏林东车站。在杜南义的文件箱中，藏有一只特殊的英国炸弹，

<sup>①</sup> 艾米·朋霍费尔提供的消息，摘自艾伯哈特和蕾娜特·贝特格编：《不同政见运动的最后书信》，慕尼黑，1984年，第44—45页。

在苏维埃共和国就有一千万人牺牲。迪特里希非常吃惊地收到一位以前芬根瓦的朋友的来信：“在游击队出没的地区，所有的小孩和妇女，只要有提供给游击队食物的嫌疑，都被予以近距离枪决。这些人都必须解决掉，否则德国军人的生命就会遭殃……在过去三个星期，由于军事上的需要，我们必须烧毁某些乡村……”<sup>①</sup>

这些报告历历在目，因而迪特里希写道：

那个邪恶、巨大的假面舞会，将道德观念弄得团团转。邪恶利用光明、善行、历史需要、社会正义等化身，将传统伦理观念形成的未来观念全部搅乱……在充满各种可能性的混乱中要作出决定，许多人只好选择“只尽义务”的安全途径。在这里，发命令的人被当做是最有良知（das Gewisseste）的人；发命令的人要对命令负责，而不是执行的人。既然只是受义务的限制，就不会有人肯冒险去为个人行动的后果负责，但这正是唯一可正视邪恶问题，并将之克服的方法。义务之子就得在魔鬼面前服事，他仍然只会实践他的义务。<sup>②</sup>

每一个在1942年读到这份资料的持不同政见者，都知道这里指的是什么人。因为到目前为止，所有想改

<sup>①</sup> 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791页。

<sup>②</sup> 朋霍费尔：《反抗与顺服》，第10页。

发。”但是那个等待的电话却没有来。两个星期之后，盖世太保却来了。一个经年计划、做了许多费力且琐碎工作的密谋行动，于此正式告终。迪特里希在此扮演什么角色，一直到第三帝国结束后，才慢慢地被人们重新了解。

从1940年至1943年间，迪特里希曾多次造访瑞士日内瓦，在临时世界教会议会中心，向秘书长维塞特·霍夫特（Vissert Hooft）传达了德国反抗运动和西方教会代表之间的谈话。迪特里希从一开始就代表反抗运动的极端团体，表示务必要彻底推翻希特勒的政权。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希望新的德国政权的同盟兵力能保证：有一次军事喘息和政治性支持的机会，以达成尽快停战和平协约的可能。

当然，这并不是此次谈话所要传达的唯一观点。德国反抗运动本身就很不一致，对希特勒之后的情况有许多不同的看法。某些属于反对阵营的人仍然希望战胜，另外一些则希望能拯救多少就拯救多少。有一部分人想象战后的民主德国，另一部分人则想象君主立宪的德国。许多人想要与西方谈和，以便东方的战争虽然在斯大林格勒失利，仍然能够战而胜之。这就是那些与迪特里希接触的英国谈判对象，对他所传达的希望和消息采取审慎评估态度的原因。

唯一信任他的人，是他在伦敦议会的朋友乔治·贝

他与卡那里斯（Canaris）一起要将它运送到斯摩棱斯克（Smolensk）。那里是军团中心的总司令部，第一军官是亨宁·冯·特雷斯科（Henning von Tresckow），他属于谋反行动的一分子，他将把炸弹偷运到飞机上。3月13日希特勒拜访军团中心后，将搭乘这架飞机返回德国。然而，后来希特勒却平安无事地着陆在东普鲁士，那只定时炸弹的引信竟然失灵。

一星期之后，希特勒再度来临。为了庆祝烈士纪念日，军团中心展出了他们的战利品。原定半个小时给这位“领袖”参观，由冯·格斯多夫少校（Major von Gersdorff）随行，他外套口袋里藏了两枚炸弹。然而希特勒却在不到十分钟后就结束了视访。在柏林的谋反同伴徒然地等候引发暴动的信号。

艾伯哈特·贝特格在这期间也是知道内情的人，他回忆道：“在那个星期天早晨，整个家庭和所有孙儿女一起在施莱贺家里，练习为庆祝父亲老朋霍费尔75岁的生日合唱曲。迪特里希坐在钢琴前，克劳斯拉奏大提琴，鲁迪格·施莱赫拉小提琴，而汉斯·冯·杜南义属于合唱中的一部。门前停有一部杜南义的车，随时准备出发……”<sup>①</sup>杜南义不时地瞥看时钟，等待那个决定性的电话，与他无所不谈的妻子克莉斯特尔也感受到他的不安。她对姐姐乌苏拉轻声说：“事情随时都可能爆

<sup>①</sup> 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876页。

这是一个犹太市民组成的团体（原本应有七个人），他们伪装成国防军间谍，被暗中派往瑞士活动。“七公司”是成功了，然而这对国防军中的持不同政见团体而言，却开始走向终点。

1942年秋天，慕尼黑国防军分部的一个同志，在非法换取外汇（Devisengeschäften）时被当场抓获。这给了国防军的对手，即帝国安全总部（直接隶属于纳粹党，与国防军相对立）一个机会，他们仔细地侦察慕尼黑国防军分部，结果发现了“七公司”的踪迹，以及迪特里希·朋霍费尔和汉斯·冯·杜南义的名字。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但是他们两人在这之后就已经估计到被捕的可能性。没有人知道那些共谋叛乱的伙伴，在审讯之下能够坚持守口如瓶多久。

汉斯和迪特里希想尽办法拭去留下的行踪，并且制造假线索。他们捏造信件和日记簿上的记录，并小心地安置在可能被查获的房子里。颠覆的行动仍在继续进行。

很难想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生命有何感受。从迪特里希对这段期间的报告可以清楚地看出，愈是危险和死亡来临的时刻，生命的喜乐和丰盛的感觉也愈发强烈。“我们剩下的只有那条非常狭小并且有时是实在难以继续的路，每天都欣然迎接，好像它就是最后一天，并且我们仍要以信仰和负责的态度来度过它，好

尔——奇彻斯特的大主教。为了在斯德哥尔摩会见他，迪特里希取消了1942年的一次瑞士之旅。5月31日，这两位朋友意外地在西格图纳（Sigtuna）主教的客房碰面。当时迪特里希正要作一次紧急的飞行，还有一张信使证件在他的行李里，其中包括政权颠覆后的可能执政者名单。这应该意味着将有一个“不一样”的德国产生。贝尔承诺他会通知英国政府并希望得到正面响应。然而，在7月23日，贝尔拍电报给在日内瓦的维塞特·霍夫特表示：“对此深表关注，但实在抱歉无法回复。”只要德国反抗运动没有明显的表态，一般人就没有理由去分辨纳粹与德国之间的差别。

在其他两次军方委托的任务中，对朋霍费尔而言几乎“只能防止情况恶化”。1942年4月初，有两位国防军的密使来到挪威，因为那里有一场反对挪威的纳粹总理克维斯林（Quisling）的教会之战被点燃，所有牧师和主教都辞退了职务，牧师罢工的带领者艾温德·贝格拉夫（Eivind Berggrav）则被拘捕。然而，他在4月15日依照波尔曼（Bormann）的指示获释。这两位密使警告：教会之战将对德意志占领军的安全造成不必要的伤害。这两位密使就是迪特里希·朋霍费尔和赫尔穆特·摩特克伯爵（Helmut James Graf von Moltke），他们鼓舞了挪威的反抗运动。

具有深远影响的是后来的“七公司”（U7）行动，

或见解，但是现在我这里可能有一个‘枷锁’要挣脱，所以我就任其自由发展……”<sup>①</sup>

不知不觉中，迪特里希生活感受中的某些东西有了改变。以往活在安全界限中，将自己与“生活”和“爱”隔离的日子已经过去。并且，就在迪特里希的内在距离感开始消失之时，他遇见一位足以让这位难以接近的单身汉心动的女人。

玛丽亚·冯·魏德迈（Maria von Wedemeyer）当时18岁，迪特里希36岁。他们彼此认识已经很久了，从迪特里希还在芬根瓦时。当时迪特里希是牧师，而玛丽亚是一位受坚信礼的男学生的小妹。在严格的牧师朋霍费尔眼中，她是一个非常固执的小孩。玛丽亚的祖母露德·冯·克莱斯特-雷左（Ruth von Kleist-Retzow）曾经尽心尽力帮助芬根瓦的人，迪特里希曾经安排朋友住在她的庄园里，并在那儿举办过演讲和庆祝活动。甚至在政治密谋的那几年，他都曾返回位于波美拉尼亚省的那座庄园工作和休息。这位老太太非常赞赏且支持迪特里希那极端和不妥协的个性，虽然她的亲戚都觉得他太激进了。1942年夏天，玛丽亚的母亲从这位激进的老太太眼中，看出她想撮合女儿与一个大她一倍的老男人，可就没有这么高兴了。这位男士在当时什么都好，但绝对

<sup>①</sup> 《1942年6月25日书信》，摘自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810页。

像未来仍将光明……可能那个年轻又有活力的日子明天就要临到，这样我们就欢喜地交出寻求美好未来的工作，在这之前则不。”<sup>①</sup> 他在1942年的圣诞节如此记录道。

在这段期间，迪特里希撰写自己的遗书，这是一方面；他还订了婚，这是另一方面。还有很多事将会发生。那位“神圣者”迪特里希·朋霍费尔——芬根瓦那位“没有令牌和冠冕的修道院院长”<sup>②</sup>——逐渐变成一个凡人。

1942年夏天，他在写给艾伯哈特·贝特格的信中提到：“我前一阵子激烈地将重心放在世界区域的工作经验，不断地激发我的一些想法。我自己都感到惊讶，我竟然可以整天没有《圣经》而生活，并且可以如此生活……每次当我再度打开《圣经》时，对我而言都是新的，并且带给我从来没有过的幸福感觉……我知道，我只需要打开自己的书，去倾听所有要告诉我的事……但是我感觉到，在我里面那个反对所有‘宗教性’的叛逆是如何地增长……我的自然天性是非宗教性的。但是对神、对基督，我必须经常思想，真理、生命、自由和怜悯对我有重要意义。只是对我而言，这件宗教的外衣是如此令人不适。你了解吗？这些实在都不是什么新论点

<sup>①</sup> 朋霍费尔：《反抗与顺服》，第24页。

<sup>②</sup> 威廉·罗特的话，摘自齐默尔曼编《与朋霍费尔相遇》第103页。



不是一个“好对象”。她要求他们分开，但仍旧无法阻止他们的关系。他们书信来往频繁，陷入热恋当中。在春天时，玛丽亚求助于她的兄长和姐夫克劳斯·冯·俾斯麦（Klaus von Bismarck），尝试改变母亲的观点；她不想再长期等待与迪特里希会面。这两位先生表示愿意与她母亲谈论此事，然而他们带回来的却是不幸的消息——迪特里希被拘捕了。<sup>①</sup>

<sup>①</sup> 1991年4月26日，路德-爱莉丝·冯·俾斯麦致本书作者的信。

## 第十六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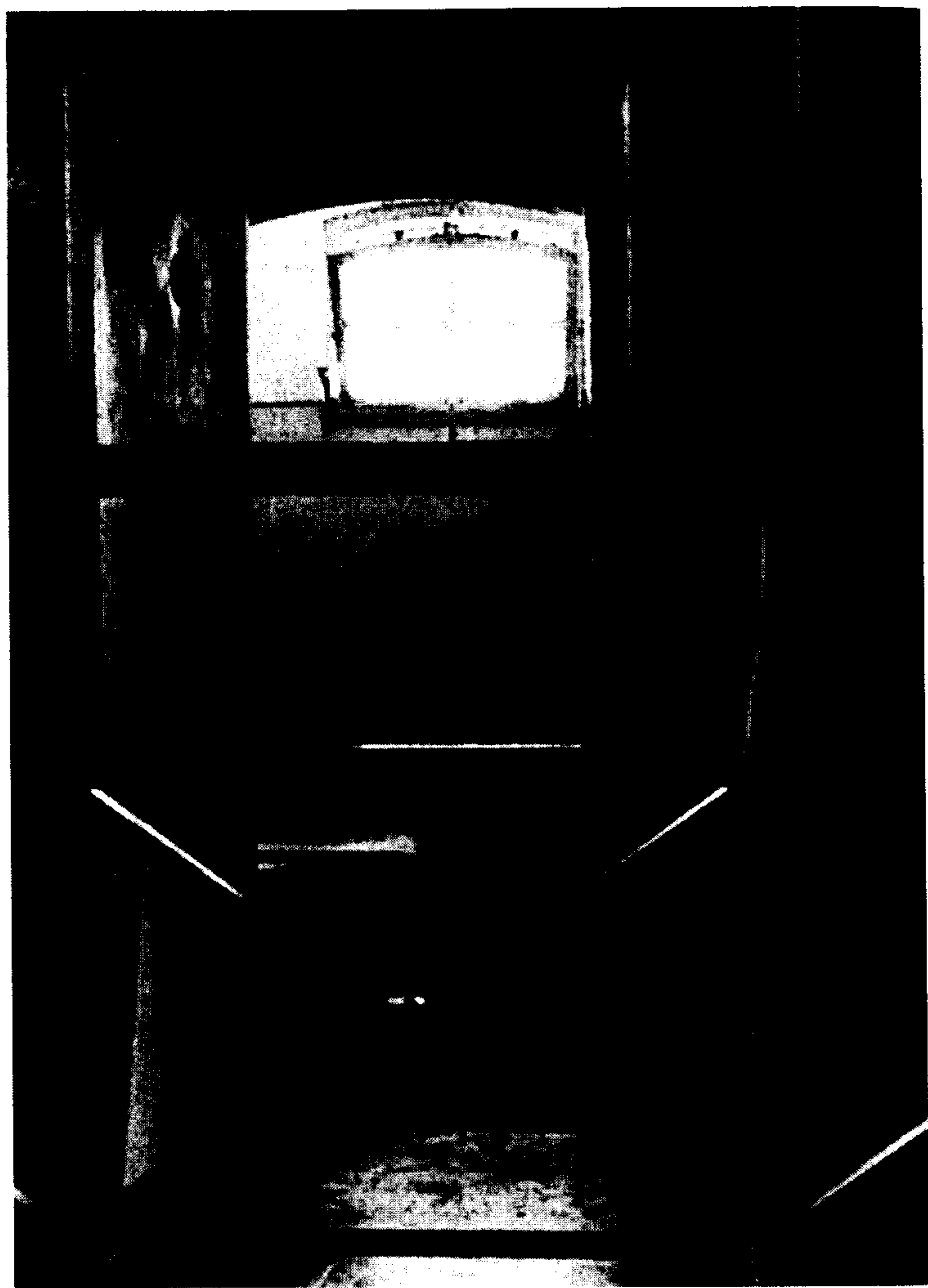
# 在生命的这端学习信仰

1943 — 1944



1943年4月5日，迪特里希从父母家中打电话给杜南义，电话中却出现了一个不认识的男人声音，于是他知道时间已经到了。他先检查书桌是否“干净”，并且接受了隔壁施莱贺家的招待，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然后与艾伯哈特·贝特格一起等候着盖世太保的出现。大概四点的时候，有人请他过去，战事法庭的调查长罗德（Roeder）和盖世太保的警察长桑德雷格（Sonderegger）正等着他。在简短的审讯之后，迪特里希被拘捕，并被带到提格军事调查监狱。

第一个晚上，我被关在一间靠近通道口的囚室里。木板床上的被子散发出一股恶心的臭味，即使天气如此寒冷，还是令人不敢使用。隔天早上，有人将一块面包丢进



朋霍费尔曾监禁其中的提格监狱牢房

狱房给我，我得从地上拾起来吃……外面第一次传来愤怒的辱骂声，之后我每天从早到晚都要听到这些声音……就是那些操着极度恶心和野蛮声调的监狱看守员所发出来的声音。<sup>①</sup>

隔日，迪特里希被移往另一间单人房。12天之久没人与他讲过话。他不能写信也收不到信；没有人告知他拘禁的原因和时间的长短。在后来的几天夜里，他听到隔壁房间传来的杂音，那是由一些日夜被铐绑的死刑犯所发出的。

4月14日，取消了接触禁令，迪特里希写了一封信给父母，这封信是他的自我克制和情感自律的最佳表现：“亲爱的父母，首先你们必须知道也要确实相信，我一切都平安……一般人所想象的那些监狱中的不适，也就是各式各样外在生活的贫乏，这些对我实在是非常的无足轻重的……”<sup>②</sup>

到底他的监狱生活实际情况如何，可以从他在便条上——前几个星期中唯一可使用的书写用品——所暗藏的提示语中窥见到。便条上列出了他所需要的生活用品，也提到：“与人、与工作、与过去、与未来、与婚姻、与神隔离……焦躁……思念……无聊……生病——

① 朋霍费尔：《反抗与顺服》，第64—65页。

② 朋霍费尔：《反抗与顺服》，第26页。



阿道夫·冯·哈纳克的侄子。这个团体有多位成员不堪酷刑而在审讯期间死去，或者自杀身亡。

迪特里希知道太多这类的事，以便让自己对此有所想象。对他而言，准备好自杀是最后仅存的一线自由。这几乎是对抗继续进行的审讯时背后的支持力量。但这是必要的，因为这不仅涉及不能说出任何人的名字，更关系到颠覆行动（即将继续进行的计划）不得被破坏，因为盖世太保和帝国安全总部尚不知详情。但是人们猜测卡那里斯的职务已经无法保住。借着朋霍费尔和杜南义的被捕，他们以为可以查出蛛丝马迹，并将保卫机关内的持不同政见团体一网打尽。不过事情进行得并不顺利，这两个人成功地混淆了所有线索。他们对这种紧急状况早就有所准备，即使他们现在身陷囹圄，所有的约定仍以秘密的途径和密谋图反的方法继续进行。

接触禁令取消后，迪特里希请人寄了很多书给他，其中一部分是要阅读的，另一部分则是用来传达消息的。当某本书被寄回，而其上有迪特里希的签名时，就代表“其中藏有信息”——每两页便有一个字母用铅笔隐约地标上点号。这些大部分有关审讯的资料，将被迪特里希的家人译码，并继续用类似的秘密途径传给杜南义（他被关在属于高阶官员的监狱里），另外也传达给还自由在外的其他秘密谋反的同伴。这种方法成功地使迪特里希和汉斯不会被人利用，或让敌人从中得利。罗德在杜南

深沉的寂寞……想自杀，并非因为罪恶感，而是因为我从根本上看来已经死亡，画上句号……在祷告中得胜。”<sup>①</sup>

有两件事令迪特里希非常痛苦：一是无力的感觉，那种“时间不再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不寻常经验；此外是一种被迫的寂寞感，也就是他才刚刚用尽内在力量走出的孤单寂寞。盖世太保的调查员都是能干的心理专家，他们马上就可以找出这些囚犯的弱点。为期数周的断绝消息和隔离，应该可以使被拘禁者软化屈服；当听审开始时，再加上威胁与严刑拷打，以及不利于其父母和未婚妻的恐吓。

迪特里希需要用所有的力量，来保持自己的神志清醒和生存意志。后来，他在同时被监禁的人面前公开表白：在某些情况下，自杀是可以理解和情有可原的，当为了保护其他人，也为了不出卖一起策划的同伴。他坦白承认自己很害怕刑讯，他知道自己很想活着，因而害怕在这些折磨前自己会站不稳立场。

调查长罗德向来以他的手段恶名昭彰。1943年初，他消灭了左派的持不同政见团体“红色乐队”（Rote Kapelle），有75人被判死刑，牺牲者中有一个人名叫阿威德·哈纳克（Arvid Harnack），是迪特里希昔日老师

<sup>①</sup> 艾伯哈特·贝特格、蕾娜特·贝特格、克里斯蒂安·格雷默斯编：《朋霍费尔》，第207页。

间。特别是，他找到了可以躲过检查而将文章和信件走私到监狱外的门路。这位友善但有时也相当专制的囚犯，博取了某些守卫的好感，他们很喜欢跟他聊天，也会帮他一些忙。经由这种方式，有些给艾伯哈特的信可以破例不被检查就传到外面去。

这些书信中的一部分被选编为《狱中书简》，该书汇集了迪特里希在狱中的文章和书信。书中以1943年11月18日为起始，包含了这位年轻的神学家令人无法喘息的观点：他正在思考一个“在成年的世界中”的“非宗教的基督教”，在其中迪特里希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主题、语言和认同。在这之前，他经历了一次个人的危机，这次危机使他可以深刻地与自己的过去对话，并且同时萌发出新的观点。

这次危机刚开始时似乎并不严重。在审讯期和第一次危机减轻之后，整个囚禁变成令人心烦躁的耐性测试。那些有影响力的朋友和有些不利的情况延缓了诉讼的时间，然而，迪特里希的自由却寄望于此诉讼。他一再得到友人的安慰：那些为了帮助迪特里希而忙于在幕后穿针引线的人，有足够的理由可以使诉讼“陷入僵局”，希望能拖延到推翻纳粹政权以后。一方面，他们害怕会有一些目前还隐秘的事被揭发；另一方面，他们也担心汉斯和迪特里希可能没有办法获得自由，而被“解放”到集中营，这样相较之下，国防军事监狱反而

义的身上完全是白费力气，而迪特里希也成功地隐藏了他的身份，他扮演了一位不具伤害性、在政治上没有经验的牧师，是一个总希望一切都好的人。尽管罗德和盖世太保的桑德雷格反复地诘问，想以重大叛国罪起诉他，但还是证据不足，无法让他们真正使用一般严刑逼供的方法——至少还不能这样对待这些被告，因为他们与一些有影响力的科学家和军人具有亲戚或朋友关系。

所有被控告的事项，迪特里希都可以从国家法律中找到依据，如豁免兵役、在国外的言论或“七公司”等。对他这种必须以说谎来掩饰自己的行为，当时的新教教会倒是还没有任何伦理上的考虑。现在迪特里希却有了自己的想法：他的文章《什么叫说出真相？》被断简残篇地从狱房里走私出来，并且被藏在朋霍费尔家的阁楼上。“我们的话不应该在原则上，而应该在具体上符合真相。一个不具体的真相，在上帝面前一点都不符合真相。所以‘说出真相’所代表的并不只是信念这种东西，它也是一种对事情的实际关系的正确认识和严肃思考的结果。一个人的生命关系越多样化，所谓的‘说出真相’对他就越具有责任和难度。”<sup>①</sup>

迪特里希在1943年写下这段话时，最初的拘捕危机和最重要的审讯已经过去。他可以阅读和书写，每十天可寄发和收取一封信，每个月可以有一小时的访客时

<sup>①</sup> 朋霍费尔：《伦理学》，第386—38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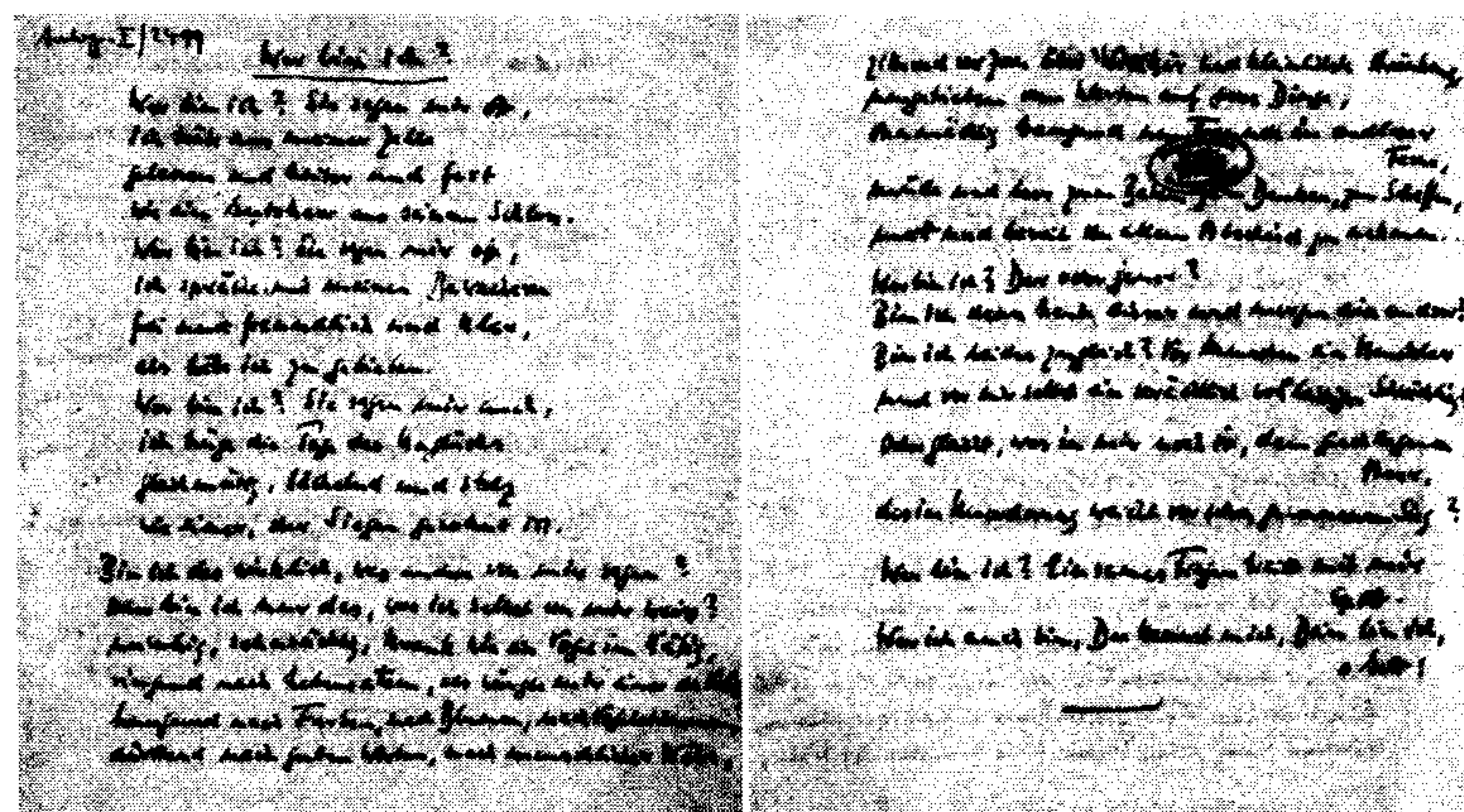
是较安全的地方。

迪特里希多少也看出了这一点，但是他就是很难忍受这种情况。那时以前，他都可以决定自己的生活；但现在却要由别人对他作出判决，他只能耐心等待，直到“时机成熟”的时刻来到。他常常感觉生命不断从身边错过。他的监狱生活是一连串等待，等待继续参与自己的生命。

但是事情却越来越糟。迪特里希感到他正陷于一种危险，内心逐渐失去可以依靠的力量。尽管他不是一个贪恋定居生活的人，并且也不后悔舍弃安全的生活，但是没有家庭、朋友和“圣徒的团契”这些坚定的根基，他就可能没有办法继续坚持这样的生活方式。那些曾经就像是家乡一样司空见惯的东西，现在却成为生活中少有的瞬间——或经由一封书信，或通过一次拜访。然而每次的离别，又都像是将他与他自己所出于和所属于的世界，一点一点地继续撕裂。

在这个危机中，在这段“时间的空白”里，迪特里希尝试创造性地重新整理过去。有一段时间，他回到自己的孩提世界中，开始写作有关一种（或说是他的）市民化家庭的戏剧和小说。他自己报告说，据他观察，两种尝试都几乎是流于琐碎和无聊。

如果由他自己做主，一定不会出版《提格残篇》。这些东西的确曾有治疗的功效，“对我而言，这种与过



《我是谁》手稿，194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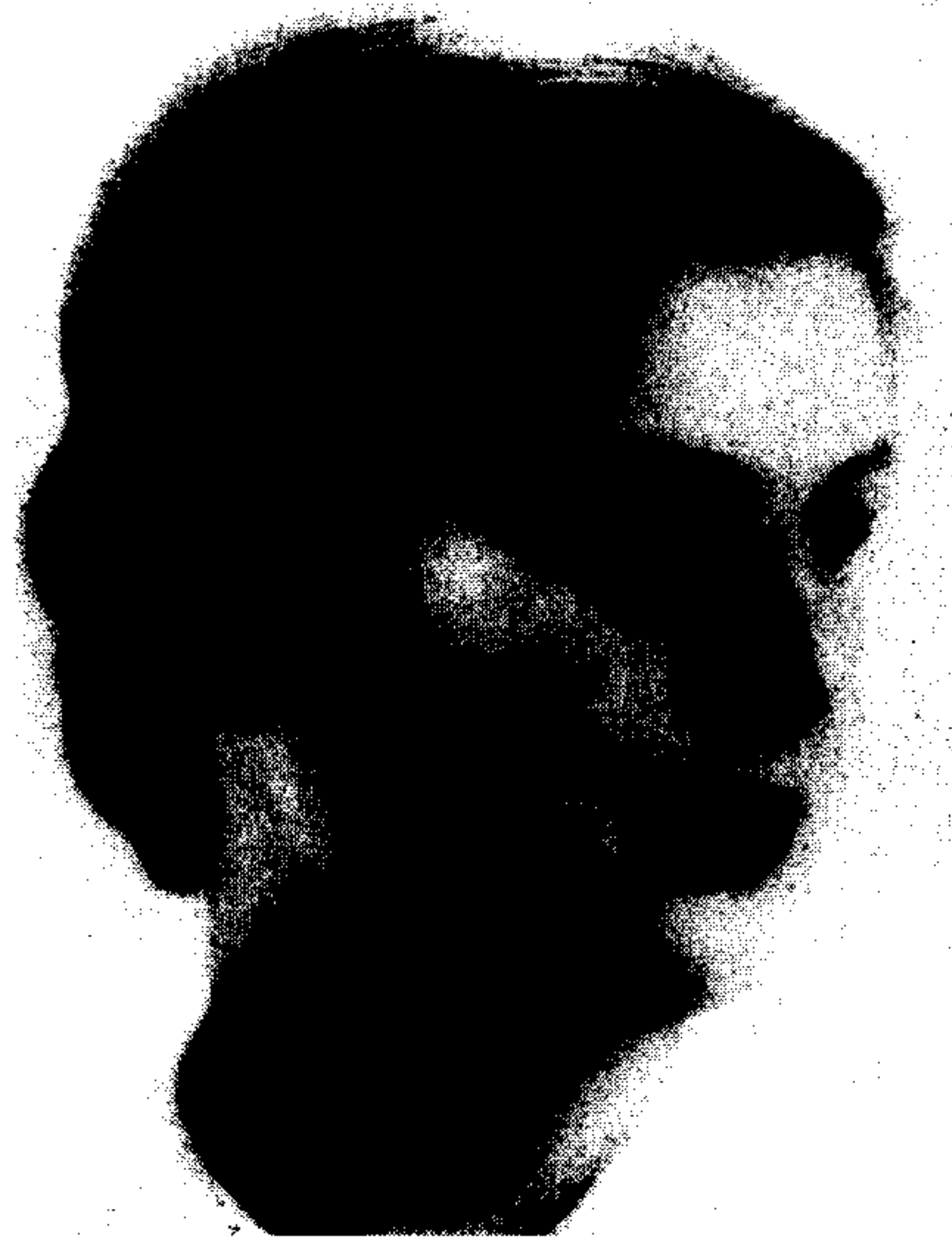
去的对话是一种尝试，可以将过去紧紧抓住并再度拥有它，特别是那种失去它们的恐惧，几乎是我在这里的生活中，每天相伴的音乐……”<sup>①</sup>

这次危机使得迪特里希暂时性地退缩，并逃避到一个神圣的过去世界里——至少美国历史学家路特·曾那（Ruth Zener）是如此认为的。但只有如此，即尝试将此次危机用创造性的方式来处理，他才可以克服它，并塑造出一种新的生活和思考的方式。

但是，起初他几乎毫无抗拒地转回到市民阶级的秩序里。“我现在的生活与我阅读的书籍完全是在19世纪。我在这个月已经欣赏了葛特赫夫（Gothelf）、史提夫特（Stifter）、茵默曼（Immermann）、冯塔纳、凯勒（Keller）

<sup>①</sup> 《1944年6月5日书信》，摘自朋霍费尔《反抗与顺服》第157页。





朋霍费尔传

朋霍费尔的未婚妻玛丽亚·冯·魏德迈 在他的小说中，那位年轻女士有着玛丽亚的影子。她并不“像我们这个时代中的任何一位女人，她们终日将时间耗在鸡尾酒派对、舞会、茶会以及崇拜电影明星上。她也不是什么提倡妇女解放的半个男人……她是一位天生的母亲，从小就经验着美好家庭生活的幸福，而这些现在都成为她自己不会失去的资产”。克利斯多夫在戏剧残篇中扮演迪特里希的角色，他报告说，他曾经在一次有关市民自由的辩论会中提到：“不应该将自由扭曲成对大众的标语，因为这样可能形成一种最可怕的奴隶制度。自由应该一直属于那极少数高贵、被拣选出来的人的财富……在人

① 《1944年6月5日书信》，摘自朋霍费尔《反抗与顺服》第43页。

的作品。”<sup>①</sup> 他复制他们的风格，勾勒出一幅过去的世界图像，在其中，那些刻画于脑海里的秩序仍然算数。迪特里希已经将自己彻底交出，但他对过去的日子却显得态度保守，不过这种日子却再也不适合他了。

群中应该要有上层和下层的区分……有一种天生的贵族，他们就是确定要来进行统治并带来自由的人，然而也有一种天生的平民，他们就是从事劳动的人。”<sup>①</sup>

这些陈述与迪特里希不久后在《狱中书简》里所发展的神学观点完全不同，在其中，新约福音有一种清楚的“由上往下”的倾向，强迫要和在下的人形成团结共识，强迫要给痛苦者以选择权。在美国神学家特·依·戴（Th. I. Day）看来，这种在新约福音与专制结构之间的矛盾很令人注目，前者是朋霍费尔想要保持的信仰，后者是他尝试要过的生活。“新约福音必须彻底把这道藩篱炸开。”<sup>②</sup>

迪特里希被他自己和他的历史困住，只好做一种批判性的更新工作，最后，他进入一种“逆转”的阶段，一种新的转向。新约福音的教科书那种“美好的信息”，从团结共识中被释放出来，这使得他再一次重新并且彻底地超越他自己阶级背景的界限。这个神学家从一群遵守秩序的人当中释放出来，这个释放也改变了他自己。

当时也有一些人帮助他，可以再度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和自己——只因为他们看待自己与看待别人不同，就像迪特里希向来的观点一样。特别是玛丽亚，这位一点都不符合迪特里希想象中保守形象的女性，她在

① 朋霍费尔：《提格残篇》，第31、32、126页。

② 特·依·戴：《基督团契对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的意义》，纽约，1975年，第630页。摘自路特·谦那著《退化和创造》第199页。

战后攻读数学，并在美国一家计算机公司就任管理职位。当时她从来也没想过，要毫不批判地赞佩这位伟大的神学家，或者让他教育她自己。正如她的姐姐路德—艾莉丝·冯·俾斯麦（Ruther-Alice von Bismarck）所记忆的，这两位不同的伴侣之间是一种解放关系。当然，玛丽亚爱上了迪特里希，所以理所当然地站在他那边；但是，她有时也站在她所爱的诗人里尔克这边，虽然迪特里希觉得里尔克“不健康”。当她与迪特里希意见相左时，她也会反对他。显然地，迪特里希也任由这一切存在，他感觉到她可以在对话中与他匹敌。甚至有人猜测，在那股要把迪特里希唤回原来位置的力量上，她占了很大的比重，就像一般人所臆测的一样。

1943年6月，玛丽亚与迪特里希在战争法庭顾问罗德在场时，又见了一次面。玛丽亚现在只能得到定时拜访和写信的许可，而迪特里希对她的认识，渐渐地由一种形象变成一个真实的人。她对他所产生的吸引力和迷恋，不只是因为她的独特性。她与他相反，从不压抑感觉。她告诉他不必在她面前一直抑制自己。“在您的家庭中，人们学会了表现自己的感觉。”迪特里希可能这么回答。<sup>①</sup>

<sup>①</sup> 1990年4月26日，路德—爱莉丝·冯·俾斯麦致本书作者的信。

在与玛丽亚的关系中，迪特里希越来越多地释放出自己的情感。但这并不能使他的情况更好，特别是，事实证明牢狱之灾不可能很快结束时，两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几乎让人无法承受。他们必须时时面对一个可怕的想法：他们的关系可能会没有结果。他们必须不断向对方靠近，却又必须同时彼此告别。

1944年5月，在玛丽亚的拜访之后，迪特里希第一次写了一首诗，其中用罕见的方式混杂了自己对玛丽亚的思念和对他们过去生活的哀悼。

你走了，我心爱的幸运和深爱的痛苦。

我怎么叫你的名呢？困顿、生命、极度的幸福、我自己的一部分、我的心、过去？

门已经关上，我听见你的脚步声渐渐远去而消逝。

还有什么与我为伴呢？喜乐？折磨？渴望？

我只知道：你走了，而一切都过去了。

你感觉得到，我现在有多么想抓住你吗……这一定会使你痛苦……

只为了想待在你的身边片刻，

你这活泼、尘世、完整的生命？<sup>①</sup>

这首诗是他宣泄伟大情感的仅存记录。迪特里希首

<sup>①</sup> 朋霍费尔：《反抗与顺服》，第210—211页。

先把它寄给了艾伯哈特·贝特格，并附上一个问题：是否他也可以这样期待玛丽亚？实际上，他想问的是：是否他可以坦白自己的感觉、思念和痛苦？

他能够在那样状况下仍不至于落入绝望的深渊，也要归功于他能将自己的感觉表达在书信中，特别是在诗中。朋霍费尔式的原则——不放纵自己任性，现在又再度表现出创造力。这是在与玛丽亚的关系中开发出来的情感，这使他可以从对她和自己的固定形象中释放出来，变得更活跃、更敢直面自己。

玛丽亚和迪特里希之间的书信直到1992年才得以出版。路德·艾丽丝·冯·俾斯麦受到其死于1977年



电影画面：朋霍费尔与玛丽亚·冯·魏德迈在幽深的峡谷中紧握双手，朋霍费尔请求玛丽亚在他被纳粹囚禁期间成为他的依靠

的姐姐的委托，将书取名为《92号囚室的新娘》。

从给艾伯哈特·贝特格的书信中可以得知，还有一些同样被捕的人，他们是一同受苦的伙伴，这些人也让迪特里希重新思考。然而，这是当迪特里希不再觉得牢狱生活与自己的生命分开时。渐渐地，他接受了提格监狱作为他的世界，并且在其中作出了崭新且令人惊讶的发现。

首先，对于那里与他有关的一些人，他开始注意他们个人的特征和清楚的轮廓。这也要归功于当时的拘禁情况有所变动。这位友善的牧师兼有名的囚犯，在那期间受到友好的对待。他有足够的书可读，有足够的饭可吃，他可以相对自由地活动，其他的囚犯和守卫都很喜欢与他聊天。在某次空袭之后，提格监狱也有死伤，他开始充当卫生兵助手，因而认识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人。这种经验使他印象深刻并懂得：那些既没有基督信仰，也没有受过市民教育的人，也可能是深思熟虑、乐于助人且聪明过人的争论对手，而他在自己的地位上、在教会内、在市民阶级中，却必须与机会主义者和为适应环境而抗争。迪特里希关于所谓“精英”和“平民”的观念顿时变得混乱。就连那些无产阶级的囚犯，虽然他们的行为对迪特里希而言是陌生的，但在当时都成为那个团契的一部分，迪特里希也属于这个团契。迪特里希不再与他们保持距离，在当时提格的苦难团契中，他

实际给予了且经验到团契的真实性。

福音与生活合一了。“这是一个具有独特价值的经历，我们经验了一次从下层观看世界历史的伟大事件，即用被阻断、被怀疑、被恶劣对待、被剥夺权力、被压榨、被讥笑的人的眼光，简短地说，就是用受苦者的眼光，来看待世界。”<sup>①</sup>再度地，迪特里希问道：耶稣的门徒到底是什么意思？答案反映出，福音书的教导与自己的实际经验一模一样。“‘你们不能同我一同做醒片时吗？’<sup>②</sup>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问道。那位敬虔的人所期待于上帝的，就是从所有一切中返回……并非那种敬虔的行为造就了基督徒，而是在世界的生活中参与了上帝的苦……耶稣所号召的并不是一个新的宗教，而是生命。”<sup>③</sup>

如此，迪特里希开始了一个伟大的主题：“我们迎向一个没有宗教的时代。人们可以就这样，如同他们现在这样，不再忠于宗教……那么现在上帝还拥有有什么空间呢？”答案极端地导向尘世世界的生命：“神就在尘世生活当中。那位与我们同在的神，就是那位与我们分离的神。”<sup>④</sup>这些话就是那位“追随者”的结论。没有追随

① 《文集汇编Ⅱ》，第441页。

② 《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6：40。——编者

③ 朋霍费尔：《反抗与顺服》，第180页以下。

④ 朋霍费尔：《反抗与顺服》，第177—178页。

者，耶稣早就死了；没有人的生活 and 行动，上帝就无法被看见。

迪特里希一再地强调，上帝不应该成为问题解答的代罪羔羊，这些问题人类必须自己处理。“虔敬的人常在人类的认知到尽头（有时只是因为懒于思考）或人类的力量被拒绝时谈到上帝，实际上，这常常是个‘有求必应’（deus ex machina）的上帝。这样的上帝总是利用人类的弱点或者人类的极限。我希望上帝……不在人的软弱上，而是在人的力量上，不在人的死亡和罪恶上，而是在生命和慈善上被论及。在极限上我宁可沉默，至于那无法解决的，就让它无法解决吧！”<sup>①</sup>

同样的观念，可以从他在一次严重的空袭后写给艾伯哈特·贝特格的信中看出：“当我们昨天晚上又仆卧在地板上时，有一个人清楚地喊着：‘喔，上帝！喔，上帝！’这个人平常是一个很草率的家伙。当时我竟然没有想到要用任何基督教的方式来鼓励或安慰他，我只知道，我当时看了看时钟，然后说：最多还会持续十分钟。这一切的发生完全不需要思考，而是自然而然的，并且是照感觉而行的，我觉得不应该将此片刻利用来做宗教性的压榨。”<sup>②</sup>紧接着他又说：“我一定不会以一个虔敬的人的身份离开这里！完全相反，我的不信与‘宗

① 朋霍费尔：《反抗与顺服》，第134—135页。

② 朋霍费尔：《反抗与顺服》，第105页。

教恐惧’在这里比在其他地方更加严重。以色列人从不敢直呼上帝之名的心思，不断地浮上我的心头，并且我越来越能了解这件事。”<sup>①</sup>

迪特里希耳中还清楚地听到那些浮泛的空话，教会领袖也借上帝之名颂扬民族和祖国。对他而言，在这种历史灾难的当下，在讲道时还总是提及罪恶和拯救的问题，实在无法令人信服：“何谓和解和拯救？何谓重生和圣灵？何谓爱仇敌、十字架和复活？何谓在基督里的生命和基督的追随者？这些都是如此的沉重和遥远，使我们几乎不敢提及……这是我们自己的罪。我们的教会在这些年只为自己的存留而奋斗，好像这才是主要的目的。这样的教会没有能力成为世界的代言人，为人们讲出和解和拯救的话语。因此，从前的话语变得没有力量而迟钝。我们的基督精神在今天也只剩下两样东西：祷告和在人群中行公义。”<sup>②</sup>

祷告和践行公义对迪特里希而言，是一体两面的事，他是那种想要生活和行动的人。“当一个人活得好像上帝不再存在，至少那位使人不去行动的上帝不再存在，他同时也要去亲近上帝，在他那里有希望涌出，并且所有生命都出自于他。”能够与一个机构联合，在其中，爱、正义与和解彻底地超然于人类支配的权限之

① 格雷默思、普法伊弗尔：《神学及传记》，第117页。  
② 朋霍费尔：《反抗与顺服》，第126页。

外，对迪特里希而言，是如今剩下的最后一个希望。“神啊！我每天早晨呼叫你的名。帮助我祷告，让我的思想集中于你，没有你我无法自己做到。”<sup>①</sup>

什么是他自己要做的？什么是必须交托给上帝的？他在《奔向自由路上的驿站》中有所描述：

行动：不是任其所爱，而是勇于执行权利；不是在可能性中漂浮，而是勇敢地抓住实际；不是逃逸在思想中，而是体现在行动中，就是自由。

受苦：奇妙的蜕变。那双强而有力的手将你束缚住。软弱、孤独，是你行动的结果。只要你愉悦地感受自由片刻，然后你就会将它交托给上帝，让他美好地完成它。<sup>②</sup>

在这种“人可以自己做点什么”的限度内，迪特里希结束了他想成为圣者的尝试。“当一个人完全放弃自己要做什么的时候，比如成为圣者、悔改的罪人或教会的人，然后他才会将自己完全投入上帝的臂膀中，他将不再以自己的痛苦为重，而是以神在世界上的痛苦为重；然后他会与基督一起在客西马尼园做醒，我想，这就是信仰……”<sup>③</sup>

① 朋霍费尔：《反抗与顺服》，第73页。  
② 朋霍费尔：《反抗与顺服》，第184—185页。  
③ 朋霍费尔：《反抗与顺服》，第183页。



这也是迪特里希个人的释放，从“必须成为特别的人”的压力中释放出来。提格的书信中越来越频繁地出现一个人，他渴望像任何一个自由的人一样，可以爱他的妻子、有自己的小孩和平静的生活。1944年5月的一个夜晚，他写信给艾伯哈特：“这个漫长且温暖的夜晚，算是第二次吧！我在这里经历了这样的夜晚，它有点困扰我……一个人这么久以来有意识地将自己每个渴望压抑下去，那当然可能产生两种结果：若不是他的内在枯竭耗尽，不然就是所有的东西都被堵塞，以至于有一天会可怕地爆炸开来；另一个可想象到的结果是，他会真的变成没有自己；这种情况没有在我的身上发生，我自己知道得最为清楚……”<sup>①</sup>

对一向与人有距离的迪特里希而言，这是相当坦白的话语。的确，在某个地方是有一个“结”被解开了。最后一张出现迪特里希的照片，就是在这一年夏天拍摄的，相片上的男子显然接受了自己完全平凡的一面。他充满希望和焦躁地等候着推翻政权的日子到来。

1944年7月20日，那则号外终于传进提格监狱的牢房里：“领袖”遇刺了。然而，在当天晚上，所有的希望就都落空了——希特勒逃过一劫，安置炸弹的史陶芬伯格上校（Oberst Stauffenberg）和共谋的同志都被枪决，第一波缉捕行动随即展开。

<sup>①</sup> 朋霍费尔：《反抗与顺服》，第156页。

福音教会在1944年7月21日宣告：“正当我们无畏生死且勇敢的军队，在困难的前方为了保卫祖国和赢得最后胜利而努力时，竟有一小撮被虚荣驱使的军官胆敢犯下恶行，计划谋杀我们的领袖。我们的领袖被拯救了，使我们的民族避免了无法形容的不幸。为此，我们要衷心地感谢上帝……”<sup>①</sup>

当天，迪特里希写给艾伯哈特一封信，这封信看来像是一封遗嘱。他预计随着反抗势力的失败，他迟早会被拖累，并且就他的情况做了说明：

我在过去的几年，不断地学习认识 and 了解基督教信仰的世俗性。不是单纯的宗教（homo religiosus），而是人才是基督，就像基督曾经为人一样……我想，我可以学习信仰，在其中我尝试去过一种神圣的生活……后来我经验到，一直到此刻我仍这么经验着，人只能在生命的这端学习信仰。<sup>②</sup>

<sup>①</sup> 艾伯哈特·贝特格、蕾娜特·贝特格、克里斯蒂安·格雷默斯编：《朋霍费尔》，第221页。

<sup>②</sup> 朋霍费尔：《反抗与顺服》，第183页。

## 第十七章

# 结束乃是开端

1944 — 1945

1944年10月5日，盖世太保特派员赫珀克顿（Huppenkothen）闯进萨赫森豪森集中营的病房里，当时汉斯·冯·杜南义被囚禁在那里，他患了白喉且双脚瘫痪。赫珀克顿把一个档案扔在他床上，说：“就在这里面，有我们两年来寻找要控告你的东西。”杜南义努力地把持住自己，他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问道：“原来如此，你们终于找到了？在哪里找到的？”<sup>①</sup>

9月底，在佐森（Zossen）的一个国防军分支机构，有人在保险柜里发现了一批秘密文件，其中有杜南义在1939年意图煽动一些德国将领发动叛变的备忘录。“佐

<sup>①</sup> 克莉斯特尔·冯·杜南义的笔记，摘自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1051页。

森档案”的出现，让人们对整个叛变的范围和时间感到震惊。这个事件引发了另一波新的缉捕行动，一些快速诉讼的案件被中断，被捕者名单很快更新，审讯变本加厉地严酷起来。汉斯写了一封秘密书信给他的妻子，这封秘密书信随着换洗的衣物被偷偷带了出去，信上写道：“他们找到了所有的东西，也包括所有不利于我的资料。”<sup>①</sup> 他拜托她偷偷送一些痢疾细菌到监狱里。

他唯一的存活机会，就是让自己无法参加审讯。这场战争就要结束，纳粹政权即将瓦解，这是当时大家心知肚明的事情。对所有被捕和被判刑的人来说，被同盟军解放是他们仅存的一线生机。

迪特里希的情况也因“佐森档案”的曝光而快速恶化，因为他到底扮演什么角色，现在都清楚了。除此之外，那些可以帮助他的人，现在也都被捕了。国防军被解散，卡那里斯被捕，他的舅舅保罗·冯·哈塞（Paul von Hase）原是柏林市的指挥官，现在已经被枪决。只有一次似乎有救援来临，而且这次是一个完全从外界来的帮助。提格监狱的一个警卫克洛伯罗赫（Knobloch）自己愿意提供机会，要与迪特里希一起逃亡。克洛伯罗赫出身于柏林北边的工人区，是希特勒的反对者，并且数月以来一直偷偷地担任帮助迪特里希与外界联络的工作。在柏林工人区的园圃区（Laubenkolonie）早就躲藏

<sup>①</sup> 艾伯哈特·贝特格、蕾娜特·贝特格编：《最后的书信》，第85页。

了许多非法居留者，为何现在不能多藏一位牧师呢？

迪特里希的家人给克洛伯罗赫一个袋子，里面装有迪特里希的工作服、金钱和生活用品。10月初时，越狱行动就要开始。然而，克劳斯·朋霍费尔却在10月1日被捕。10月2日，克洛伯罗赫传递消息给迪特里希的家人，表示迪特里希放弃越狱计划，为了不让他的兄弟和其他家人受到更多的迫害。

没有人确实知道，迪特里希在这一刻到底在想什么。他所做的决定，就像在纽约的那次一样，都是因为他不能离开他的奋斗前线，也不愿离开那些受苦的同胞。他认为，在哪里失落生命，就可以在哪里得到生命。

10月4日，鲁迪格·施莱贺被捕。不久之后，艾伯哈特·贝特格也被捕——他在那期间与施莱贺的大女儿结了婚，他也是朋霍费尔家族里被捕的人当中唯一在纳粹政权下侥幸逃过一劫的人。

1944年10月8日，迪特里希从提格监狱被带出，押进了位于阿尔布列希特王子街（Prinz-Albrecht-Strasse）恶名昭彰的帝国安全总部的地窖里。一个与他关押在一起的意大利军官葛塔诺·拉特米拉（Gaetano Latmiral）（他后来成为一名教授）报告说：迪特里希与他的每一个朋友告别，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只有他的眼睛好像散发一种异常的光彩。迪特里希在这一刻变成了圣人，在那一瞬间，他什么都没想。



朋霍费尔（右二）与狱中同囚的人，1944年

而出了阿尔布列希特王子街之后，就没有太多关于迪特里希的消息。没有人可以得到与他谈话的许可，只有两封信到达迪特里希父母的手里。其中一封里面有一首诗，是迪特里希在年底写给母亲和玛丽亚的：

良善之力信实安宁围绕我身，  
保护与安慰无限美好，  
我欲如此与你们共度时日，  
并与你们走向新的年度。  
我们那苍老的心仍旧要受折磨，  
罪恶的日子仍旧沉重地压在心头，  
主啊！拯救我们那受惊吓的灵魂，  
那是你为我们所造的。  
把那沉重的杯递给我们，

那充满痛楚的杯，痛苦满溢杯缘，  
我们将以感谢拿起这杯，不颤抖，  
从你那慈善而可敬畏的手中。  
你果真想再送给我们一次喜乐，  
借着这个世界，以及你的太阳光辉。  
然后我们要追思过去，  
我们的生命就全然属于你。  
让今日的蜡烛燃烧得温暖而灿烂，  
那是你在我们的黑暗中送来的，  
将我们再次聚集在一起吧！如果可能的话。  
我们知道，你的光是在夜里显现。  
当寂静现在深深地笼罩我们，  
就让我们听见那世界里充满的声音。  
那世界看不见地延伸在我们身边，  
充满你儿女高昂的赞美诗歌。  
良善之力奇妙安详，  
我们希冀安慰，对那可能来临的一切。  
上主黑夜早晨都与我们在，  
也必随我们度过每个新的一天。<sup>①</sup>

最后一段是现今许多基督教出版物很喜爱引用的句子，通常出现在日历和明信片上，并且大多与日落或烛

① 朋霍费尔：《反抗与顺服》，第204—205页。

光搭配出现。可惜这种田园风光并无法表达出原来诗中所要传达的心情：这个人已经达到这样的境界，他可以肯定死亡，如同肯定生命。

在生命的最后两个月中，迪特里希的存在正是处于这两种可能中，戏剧性地变动着。一直到最后关口，都有可以喘息的机会，



朋霍费尔最后一张照片，1944年摄于狱中

并有着希望。这种必须同时在生存与死亡中做好心理准备的严峻考验，大概只有一种人可以经受得起，这种人因为已经真正学会活着，所以可以死去，而且这种人因为已经接受自己的死亡，所以可以活着。

在战争开始时，迪特里希就写过，有两种“死”存在我们身上：一种是从外在来的死，另一种是从内在来的死。“只有当我们通过自己内在的死，为外在的死做好准备时，我们才可以迎见那从外而来的死；然后我们

的死便只是为了通往神完全之爱的信道。”<sup>①</sup>

这时，人民法院正在恶名昭彰的弗莱斯勒（Frelsler）主席带领下，酝酿对市民阶级反抗者进行大屠杀。将近5000人在这最后一波恐怖行动中牺牲。1945年2月2日，克劳斯·朋霍费尔和鲁迪格·施莱贺也被判处死刑。

2月3日的一次炸弹攻击，将司法机构和帝国安全总部的部分建筑夷为废墟。

迪特里希的父母也受到那次空袭警报的震惊，原本他们想送一份39岁的生日礼物到监狱里给迪特里希。他们必须因此折返，并尝试在2月7日重新送进去。这位父亲还为此写了一封典型的朋霍费尔家族的书信：“亲爱的迪特里希：我们的生日家书……因为那次空袭无法到达你的手中。我们当时坐在火车站的慢车月台上好一阵子，那并不是很舒服的；我们一切都好，没什么事发生，除了后来我们看起来像是清扫烟囱的工人之外。但是当我们后来试着去你那里时，我们开始变得非常不安，由于有些炸弹还未爆炸，所以不准一般人接近那里。连续几天，我们听说犯人都没事。希望这是真的……”<sup>②</sup>

这封信和礼物是迪特里希从家里的人那里收到的最

后一个消息。在同日下午，他就被以不明的目的移送他处。一直到下一次寄包裹的日子，玛丽亚和他的父母才知道，迪特里希已经不在柏林。没有人可以或者愿意透露，到底他被带到哪里去了。

在那期间，迪特里希与其他来自国防军的反抗成员，一起被关在布亨沃尔德集中营的大牢里。当时一起被关的还有几个很有名的外国人，如英国空军军官佩恩·贝斯特（Payne Best），以及来自莫斯科的莫洛托夫（Molotow）的侄子柯柯林（Kokorin）。迪特里希与这两个人在日后的几周里变成了好朋友。“朋霍费尔是一个很谦虚又有礼貌的人。他常常散发出一种愉悦的气息，对生活中的一些小事感到喜悦，并且单单为了活着这件事就心存感激。”<sup>①</sup>

迪特里希向柯柯林学习俄文，柯柯林则向迪特里希请教《圣经》的道理。没有人知道到底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因为各地的前线和通讯系统都已瘫痪，因此大家越来越不会想到，在第三帝国全面的衰亡中，竟还会举行一次审判。

4月初，美军的炮火声在布亨沃尔德附近已经可以听见。所以在4月3日，那些有名的囚犯和罪名较重的犯人都被送走了。他们被赶上一辆笨重又迟缓的木制煤油运输车，往南驶去。车上的囚犯们彼此谈论此车到底

<sup>①</sup> 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743页。

<sup>②</sup> 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1024页。

<sup>①</sup> 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1029页。

要开往何处去，一股恐怖的气氛弥漫开来：佛罗森堡集中营——出名的歼灭地。

的确，运输车经过了佛罗森堡。大家好不容易松了一口气，直到车子又在另一处停下来，有三个囚犯被带出去。迪特里希不在其中。他与其他人在里根斯堡（Regensburg）下车，并紧接着被送到舍恩堡（Schonberg）的一个学校里，在帕叟（Passau）北边约40公里处。这里的床比较好，而且还可以得到一盘马铃薯。佩恩·贝斯特把他的刮胡刀借给大家用，大伙都坐在窗户旁晒太阳，好像所有的危险都过去了。

4月8日是星期天，迪特里希要求带大家做一次祷告，所有的人都同意，包括柯柯林这个无神论者。迪特里希谈到每日经文：“赞美神，他因为伟大的怜悯而降世为人，为的是给我们一个活生生的希望……”他提及对未来的盼望和大家出狱重获自由后的计划。就在祷告会结束时，便有人传唤他：“犯人朋霍费尔，准备就绪，跟着一起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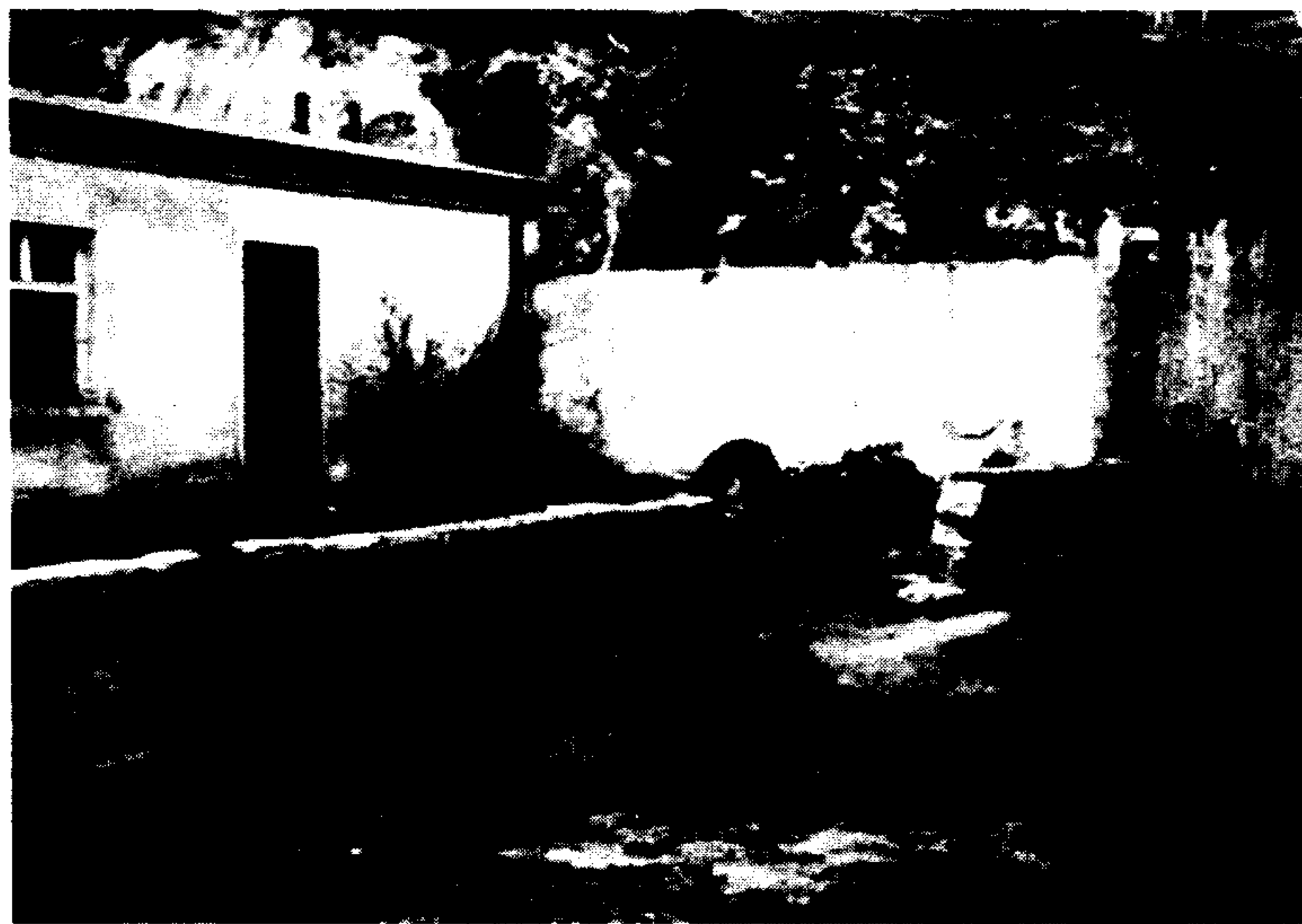
在1945年4月5日的午间会谈，希特勒决定要及早肃清国防军的侧翼团体。隔日，汉斯·冯·杜南义就在萨赫森豪森被抬上担架送入军事法庭，三天后就被拖出去处决。

1945年4月8日，几乎快要幸免于难的迪特里希·朋霍费尔被带到佛罗森堡，党卫队法官托尔贝克

（Thorbeck）作出判决：国防军的持不同政见分子，包括卡纳里斯、欧斯特（Oster）和朋霍费尔，他们因为阴谋叛国，处以死刑。

关于迪特里希最后的时间发生了什么事，就没有人知道了。他在舍恩堡留下的最后踪迹是：一本附有他的名字和地址的书，以及一个信息——他托佩恩·贝斯特传达给他的英国朋友乔治·贝尔的。佛罗森堡集中营的医生报告说：迪特里希在处决前曾经祷告过，他是安静且清醒的。

1945年4月9日清晨，迪特里希·朋霍费尔与其他五个持不同政见团体的同志，一起在佛罗森堡集中营被



佛罗森堡集中营行刑遗址，朋霍费尔1945年4月9日在此被处死（1946年摄）

处绞刑。

就在同时，玛丽亚拖着一皮箱的夏季衣物经过南德，抱着想找到迪特里希的一丝希望。每到一处，她得到的都是否定的答案，包括在佛罗森堡。整整一个月之久，都没有任何人知道迪特里希发生了什么事。他的遗体，也与其他数千人的遗体一起被烧毁。

一个月后，第三帝国终结。德国无条件投降，同盟军的军队惊诧地站在无数集中营和歼灭中心的万人冢前。

1945年7月27日，英国电视台转播了在伦敦国王大道三一堂举行的追思礼拜。这是乔治·贝尔、弗兰茨·希尔德布兰特以及朱利叶斯·里格（Julius Rieger）为迪特里希举办的。直到那一刻，迪特里希的父母才知道，他已经不在世上了。

乔治·贝尔在讲道中说：“迪特里希的行为就像是先知和使徒一样，他对神的告白是与对抗不义相连接的。因着这样的精神，让盼望有了新的生命力。”

乔治·贝尔将迪特里希·朋霍费尔最后的遗言传扬给大家：“这是结束，对我而言却是生命的开始。我相信在基督里，世界同属兄弟姐妹，没有国籍之别，而我也相信，胜利必定属于我们。”<sup>①</sup>

<sup>①</sup> 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1037页。

## 年 表

**1906年** 2月4日，迪特里希·朋霍费尔出生于布列斯劳。

**1912年** 举家迁往柏林。

**1914—1918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9年** 威玛共和政府开始。

**1923年** 高中毕业考试，之后开始在图宾根研读神学。

**1924年** 在罗马进修，夏季学期开始在柏林学习。

**1927年** 博士论文《圣徒的团契》。

**1928年** 第一次神学国家考试；开始在巴塞罗那进行教区牧师实习。

年

表



1930年 第二次神学国家考试，在柏林大学讲授：“行动与存有”；9月开始在纽约协和神学院进修。

1931年 6月回到柏林；在普伦茨劳山担任客座讲师和助理牧师、“教会友好世界联盟”的青少年部秘书。

1933年 希特勒政权崛起；朋霍费尔参与一个教会持不同政见团体的成立，反对国家一体化的企图；演讲《教会之于犹太问题》，10月接受在伦敦的牧师职位。

1934年 参与在法诺的普世教会会议。

1935年 返回德国；在斯德丁附近芬根瓦的“认信教会”主持讲道课程。

1936年 到瑞典进行课程学习旅行；教师许可被取消。

1937年 讲道课程被盖世太保结束；继续在一群实习牧师团体中非法工作。

1938年 《追随基督》出版。

1939年 前往美国旅行，接受纽约一个客座讲师职位，三星期后返回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1940年 开始在“国防军”担任持不同政见团体信使，从事密谋策划工作。

1941年 在瑞士与普世教会代表会谈；写作《伦理学》。

1942年 前往挪威旅行；与乔治·贝尔主教见面。

1943年 与玛丽亚·冯·魏德迈订婚；4月被拘

捕；在国防军柏林提格监狱写作书信和杂记，收录为《反抗和顺服》。

1944年 刺杀希特勒行动失败；“佐森档案”曝光，朋霍费尔因此被移往阿尔布列希特王子街的盖世太保监狱。

1945年 2月被送往布亨沃尔德集中营；4月撤往舍恩堡，随即送往佛罗森堡集中营；4月9日，迪特里希·朋霍费尔被处决。

